

十三、教学改革学术论文（部分）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出版时间	期刊名称	备注
1	理解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三重逻辑与制度调适路径	唐智彬	2023.1	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	CSSCI 期刊,《新华文摘》10 期全文详摘,人大复印资料《职业技术教育》《教育学文摘》转载,职业教育研究年度“十大论文”
2	论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的基本框架与现实路径	唐智彬 王池名	2021.19	教育发展研究	CSSCI 期刊
3	市域产教联合体公共价值创造的逻辑与路径	唐智彬 龚楚仪	2024.4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	CSSCI 扩展,人大复印资料《职业技术教育》2024 年 11 期转载
4	资本与能力双重缺失条件下贫困地区农村职教的发展	唐智彬	2017.1	教育与经济	CSSCI 期刊,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文摘》转载
5	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的逻辑与机制	唐智彬 石伟平	2017.3	教育与经济	CSSCI 期刊,被 Journal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 2017 第 5 期全文翻译
6	推进中国式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建设	唐智彬	2025.6	职业技术教育	
7	论技能型乡村建设	唐智彬、周梦娇、杨儒雅	2023.8	职业技术教育	
8	新工科背景下工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路径探析	张建军 林海军 汪鲁才	2023.5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9	电子技术基础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的改革与实践	汪鲁才 兰浩 林海军 杨进宝	2022.7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10	电子类课程“以赛带练”教学模式的设计	兰浩 汪鲁才 陈俊名	2015 7	职教通讯	
.....

理解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三重逻辑 及其制度调适路径

唐智彬

[摘要] 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在不同时代精神、文化情境以及思维方式下存在显著差异,理解类型属性应基于以教育经验为基础的理性结构,从国家、社会与个体三重逻辑出发,关注职业教育在促进国家发展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以适应社会分工促进社会团结、以适合的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个基本维度上的核心职能。强调类型属性,优化类型定位,关键在于以制度构建塑造一种对教育分流和教育类型认知的规范性框架,让人们获得认识真实职业教育世界和现象的思维图式,从而指导行动,赋予意义。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制度调适要着力转变知识观,在技术知识与思维模式的独立性中奠定职业教育类型制度的观念基础,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强化类型制度,并以完善的配套制度体系建设稳定类型教育的制度基础。

[关键词] 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国家逻辑; 社会逻辑; 个体逻辑; 类型制度

在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思维中,职业教育发展出了迥异的价值、形态和秩序,从而形成了差异性时代精神、社会情境以及思考方式之下的教育类型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聚焦了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难题与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迷思。目前,我国职业中等教育、职业高等教育年招生规模、在学规模等均占教育的半壁江山,职业教育每年向社会输送1000万左右毕业生,每年培训上亿人次,是事实上的“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但是,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误解与偏见始终不减,职业教育发展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劳动力市场技能人才缺口和产业高技能人才瓶颈一直未得到缓解。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在于职业教育类型属性及其制度效应尚未凸显,现代职业教育国家制度及相关制度有待完善。作为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作用的要素,制度是决定长期发展的根本因素^①,我们既要从理念层面明确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的基本定位,又要通过不断调整职业教育类型制度,完善政策内容体系和实施保障,以避免过度抽象的概念和提法,将类型定位转换为制度供给。本文基于类型学思维,从国家能力、社会团结以及个体发展三个层面出发,分析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基本逻辑,试图推动理解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优化及其制度调适问题。

唐智彬,教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职业教育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长沙41008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及其与普通教育‘双轨制’‘双通制’体系构建研究”(VJA200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美]道格拉斯·C.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147页。

一、理解职业教育的类型学思维及其制度意义

教育类型问题首先涉及的是分类。分类思维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事物和现象中把握本质、建立秩序的重要途径,并逐步发展成为各个领域的“类型学”,帮助人们从事物的深层次普遍结构和内在法则理解世界,发现事物本质特征。^①“分类所划分的不可能是概念,分类所依据的也不可能是纯粹知性的法则……决定事物分类方式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感,而不是理智。事物本性之所以在不同的社会中会发生改变,是因为它们对群体情感的影响是不同的。”^②在特定的分类系统下,关于某一事实的分类水平往往集中反映了我们对该事物的认识水平……关于教育现象的科学分类体系本身就集中体现了我们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和理解,^③教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伴生事物,历史漫长,而且现代教育复杂程度之高,不仅要将其作为一种历时性存在的社会事实进行考量,同时也要作为一种“群体情感”“全球共同利益”以及“社会契约”进行观察。因此,需要我们从教育类型定位,而非纯粹教育观念角度来认识教育现象与教育事实,进而决定教育制度与教育政策的发展方向。

由于任何异质事物的相互区别和转换,任何确切概念的在场和缺席,都必须以集体信仰或集体意识为前提;任何事物的范畴最先都是社会的范畴,任何事物的类型最先都是社会的类型,任何范畴和类型都凝结着社会关系,刻画和标识着它们的社会起源。^④从类型学视角来理解职业教育的属性,应当关注职业教育在人们的思维结构层面的现实位置与群体情感表征、在事实层面的根源和逻辑起点以及在教育实践活动层面的日常呈现等方面的具体特征,将我们对类型属性的主观认知回到职业教育实践中接受检验,^⑤确信理性结构的可靠性,凸显现实制度与日常意义。按照这一基本逻辑,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类型定位及类型制度的重要价值。

一是作为工具性手段,基于类型定位的制度为职业教育活动提供稳定而持续的发展保障。由于缺乏健全制度,在以往的发展经历中,职业教育往往因为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出现较大波动,导致社会公众产生质疑与困惑,从而影响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制度将进一步突出属性、强调类型定位和同等重要的地位,明确职业教育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教育版图与教育生态中的重要内容,这将为职业教育提供稳定发展的制度环境。

二是强调类型的职业教育制度为教育活动提供有效的合理边界。类型制度明确了职业教育的知识观、课程内容、教学活动等具体内容,提供科学清晰的内涵,帮助人们更完整、准确地理解职业教育,避免职业教育概念与活动的泛化。

三是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实践活动将优化教育类型定位,强化职业教育类型制度,并促进教育科学发展。非理性的教育选择行为将可能破坏教育生态,同时也对教育制度产生冲击,从而损害公共利益。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实践活动与教育类型制度之间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在支撑教育类型制度的过程中实现教育生态平衡。此外,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厘清形塑不同类型教育的力量,从知识观与知识类型、资源配置方式与手段、利益相关者评价以及政府权力干预等角度,奠定教育类型制度观念基础与来源。

^①汪丽君《广义建筑类型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大学建筑学院,2003年,第13页。

^②[法]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9—100页。

^③项贤明《教育现象的科学分类研究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④渠敬东《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⑤项贤明《教育现象的科学分类研究初探》。

基于类型的职业教育制度将初步从理念层面引导人们创造并遵循教育发展的共同基本行为准则,从而凸显职业教育在教育定位上的差异性和体系上的序列独立性。优化类型定位,重点应关注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功能和独特意义。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职业教育成为了受观念、价值、制度以及习俗等各种因素共同形塑的社会事实。时至今日,无论是职业教育面临发展困境抑或是逆势上扬,都不是单一结果,这也就决定了职业教育体系作为系统的复杂性特征。通过从历史与比较视野考察职业教育的事实样态不难发现,国家介入是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国家通过提供知识生产的制度,并以立法与暴力工具促进了劳动与管理之间力量的长期平衡,从而塑造不同市场经济体的生产模式,并反过来影响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与此同时,作为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职业教育也深刻影响了经济体中的产业和社会体中的民众及其生活,职业教育落后带来的技能缺失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所造成的后果与产生的成本都部分地由社会整体共同承担^①并经由社会机制传导到大众与个体,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理解类型定位,要深入分析职业教育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个人生活中产生的总体性效应,进而为完善职业教育类型制度奠定理性基础与认知框架。

二、促进国家能力形成: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国家逻辑

国家能力泛指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国家的发展能力与治理能力。其中,发展能力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社会发展、教育发展等方面的能力;治理能力则主要体现为制度化、法制化、协调化以及可持续等方面的能力与水平。^②在作为“全球共同利益”和“社会契约”的同时,教育集中地承载了国家意志,具有鲜明的国家核心价值取向,也是促进形成国家能力的关键力量。Green(1990)认为“创立国民教育体系的最主要的动因在于为国家提供训练有素的管理者、工程师和军人的需要;在于渗透主导的国家文化和灌输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以及锻造迅速壮大的民族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性,并巩固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权的需要”。^③教育制度是国家基本制度之一,在教育制度的政治功能中实践国家意志,并通过政策体系支持教育制度功能实现。在实践层面,教育以促进国家能力形成核心方式,履行自身职能。由于国家能力涵盖内容广泛,不同教育类型在促进国家能力形成过程中的功能定位是不同的,从而出现了教育的分类发展。

从国家能力角度来理解职业教育类型定位,首要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在促成国家发展能力中不可替代的功能,集中在其经济属性上;而职业教育政治性与社会性功能则通过更为隐蔽的方式来实现,体现为有效增进国家治理能力。有研究者借用“要素禀赋”理论分析了职业教育类型制度问题^④，“要素禀赋”指的是一国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这两个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的充裕与匹配水平。^⑤对一国的的发展而言,自然资源禀赋难以改变,但是人力资源水平则能通过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改善国民健康状况以及社会保障条件等来优化。其中,职业教育是改进国家发展进程中所需人力资源禀赋的关键。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发端于洋务运动,适应了我国进入工业化轨道的人才需求。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将发展职业教育作为增强党和国家能力的重要手段,如革命战争年代先后创立了数十

^①封凯栋、李君然《技能的政治经济学:三组关键命题》,《北大政治学评论》2018年第2期。

^②燕继荣《制度、政策与效能:国家治理探源——兼论中国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2期。

^③[英]P. 布朗、A. 海尔塞等《教育与社会的转型》,《国外社会学》2003年第3期。

^④赵伟、孙英《职业教育类型论》,《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11期。

^⑤[美]罗伯特·J. 凯伯《国际经济学》(第15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所职业教育性质的军工、通讯、医疗、农业等学校训练各种专门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初则确定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通过大力发展中职教育,为国家大规模建设培养急需人才,支撑起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后,通过职业教育为各行业累计培养输送2亿多高素质劳动者,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有70%以上的新增从业人员来自职业院校。^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在国家发展能力形成上贡献独特,原因在于职业教育所承载的人才培养功能,是普通教育无法简单替代的。产业兴盛与经济繁荣的人力资本基础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需要基础理论等科学人才的奠基,也需要工程人才的技术转化,更需要一线技能人才的实现。培养适应现代产业发展需求的技能人才,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高度一致。在工业革命后的欧洲近代教育史中,各个国家以立法的方式确立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如英国吸取自由市场带来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开发落后的教训,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出台《工匠学徒法》《技术教育法》《技术学校条例》等。我国1951年政务院颁行的新学制中明确指出旧学制中“技术学校没有一定制度,不能适应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要求”,因而在新学制中专门设立了与普通中学并列的中等专业学校。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两种教育制度”始终得到了合理的坚持。尤其是邓小平同志从国家经济建设全局需要强调教育系统“两条腿走路”,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类型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得到强化。在现代产业不断细分并复杂化、技能需求多样化以及能力要求综合化的背景下,从事相关产业的人才在知识需求、技能训练以及素养形成方面都产生了新的特征。因而在提升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和素质的同时,需要明确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培养大量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国家发展能力奠定基础。技术知识就其本质来说是累积渐进的:重大的创新为后来的技术发展提供了新的建筑板块,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变得有选择性,而不再随机,^②这就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职业教育体系的延续性和相对独立性,需要从国家能力建设的全局性和长期性来设置发展议程。

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③国家治理的对象从根本上来说是“人”,“寻找最好的方式来对个人和全体的行动施加影响,从而确保每个人以及集体的利益”,^④治理能力的提升与现代化,为民众提供了更为先进、理想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及手段。随着教育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所承担的关键角色越来越突出,教育活动、教育目标与教育想象力的凸显,促成了国家与社会的进步感,整合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的功能,教育所隐含的国家治理能力意蕴也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国民教育在为国家提供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军事人才的同时,传播主流民族文化、灌输民族意识,巩固主流阶层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导地位,^⑤国家治理能力正是在这些活动中得到逐步强化。

职业教育如何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一方面,随着职业教育在技能人才培养中处于越来越基础和关键的地位,“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国家政策与“技能造就美好人生”“劳动光荣、技能宝贵”“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等宣传理念互动,形成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观念基础。这种观念基础的重要性在于促使人们科学客观认识职业教育的经济社会功能,并将其转化为发展基础与治理能力。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是社会而言,只有广大民众对未来生活保持足够希望并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与生活动力,这才是最广泛、最稳固的治理基础。另一方面,治理能力来源于职业教育生产性与平民性的特征。如在职业教育发达的德国,有研究者从历史变迁视角分析发现德国职业教育先后经历了

①孙春兰《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的讲话》2021-05-02 <http://www.ccsfgz.com/info/1045/1207.htm> 2022-05-17.

②[美]内森·罗森伯格《探索黑箱——技术、经济学和历史》,王文勇、吕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7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47—548页。

④R. Nikolas *Governing the Soul: The Shaping of the Private Self*,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9.

⑤[英]安迪·格林《教育与国家形成》,王春华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37页。

为实现底层民众谋生之准备、学校学徒充分就业、社会失业人士的就业支持与福利保障以及弱势青年再就业提供服务的四个阶段,^①最新版《德国职业教育法》中专章讨论如何通过职业教育保障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利,体现了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在我国,近3000万职业教育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和城镇贫困家庭,中等职业学校上述来源的学生大约占85%的比例。^②高职自2017年起连续三年,每年毕业的300多万学生中,来自贫困地区农村生源占比为9.9%,划到每个国贫县就是300多人。高职的贫困地区农村生源的63%分布在农林类、医药卫生类、民族类、师范类等院校中,他们的培养都是面向乡村卫生院、幼儿园等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着眼于解决基层民生问题。贫困地区农村生源的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稳定在90%以上,其中近1/4留在贫困地区,^③将成为乡村发展与全面振兴的关键力量。教育部相关人士表示,总体上职业院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千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见效最快的方式。^④一个社会的治理水平和文明程度,不是取决于社会地位和阶层水平最高的群体,而是最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与发展水平,这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最重要体现。职业教育正是通过为他们提供“保障网”,奠定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

三、以适应分工促成社会共同体: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社会逻辑

早期人类历史上曾经历三次革命性的社会分工,即游牧业与农业的分离、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以及商业与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同时伴随的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野。随着人类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分工进一步发展和细化,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程度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高的熟练水平、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财富以及促进经济增长。在亚当·斯密看来,“分工是增进国民财富的源泉。”“分工可以增加社会产品、社会威力和社会享受。”^⑤实际上,分工是现代社会存在的条件,正如涂尔干所说“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功能以这种分化方式提高了生产率,而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分工的作用不仅限于改变和完善现有的社会,而是使社会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没有这些功能,社会就不可能存在。”^⑥在分工的过程中,人们实现了涂尔干所谓的“结构性依赖”,带来了范围更为广阔的社会交往,为孤立的人类个体带来广泛而频繁联系的机会,使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普遍的道德属性。^⑦分工在现代社会中的团结功能被普遍地关注到,如詹纳认为自工业化开始以来,劳动分工“就发挥了经济因素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意义”“纯粹的劳动分工是社会联系的纽带”。^⑧可以说,因为有了社会分工,“人们有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需要。他们通过一种交换的服务来保证这些需要的满足,每个人贡献出自己固有的能力来满足他人的需要,并由此从他人手中带来一种服务的报酬。这样便

① 欧阳忠明、王江雁《何以成为“缓冲器”:德国职业教育促进就业的变迁与坚守》,《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职业教育也要转型升级》,2018-12-27,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8/201812/t20181227_365023.html 2022-06-29。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高职扩招200万,如何接招落地——代表委员、专家、校长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职教内容》,2021-05-25,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005/t20200525_458556.html 2022-03-08。

④ 中国青年网《教育部:职业院校学生超70%来自农村,千万家庭实现大学生“零突破”》,2020-12-08, http://news.youth.cn/gn/202012/t20201208_12609436.htm 2022-06-29。

⑤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5—12页、239页。

⑥ [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24页。

⑦ 刘拥华《道德、政治化与抽象的世界主义基于对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及相关著作的解读》,《社会》2013年第1期。

⑧ [德]格罗·詹纳《资本主义的未来》,宋玮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在人类社会中产生一种广泛的分工,这种分工主要是构成社会的团结。^①通过职业化的社会分工,个人不断突破生活边界,打破血缘与地缘的限制,有了更广阔的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与国家、社会形成紧密连接。因为职业活动的异质性,在社会结构上,不同个体不得不相互依赖、相互支持,成为社会有机体的“器官”。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分工通过实现职业共同体而避免过度个人利己主义,培育人们的共同情感。自社会分工越来越强,人类也逐步由涂尔干所谓“机械团结”发展到“有机团结”。

社会分工的出现,首先是一种劳动专业化,其中反映了不同工作和岗位对技能类型与层次的差异。劳动分工不断变迁、演进,从而带来工作和岗位的变化,与职业和岗位相关的知识、技能也随之变化。“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②一方面,分工异化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指出,在现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人类社会还不能彻底消灭非自愿的分工,尚未达到完全自主、自由地选择职业的水平。尤其是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从生产模式与特征上看,现代工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生产进程的复杂性以及相互依赖性,因此,不同禀赋与能力的人从事不同的工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社会分工体现为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不同的职业岗位划分,并以此形成了现代社会结构的最基本特征。广泛劳动分工本身便是技术革新的前提,发明活动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因为“创造、描画和执行的技术并不能由一个人完全掌握;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必须遵循着劳动分工”。分工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它使雇主可以精确购买他所需要的技能,并且不高于各不同工序所要求的技能,^③因此这意味着知识和技能需求的分野,进而形成了不同教育需求,并体现在现代职业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作为类型教育初步确立的过程中。

社会分工深化不仅仅意味着职业种类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分化为功能明确、界限分明、规则清晰的不同社会领域。不同领域的社会分化也成为社会分工能够无限深化、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④随着时代进步,技术变革扩大市场半径,深化劳动分工,从而影响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进而推动教育做出变革。^⑤尤其是智能社会在对工作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促使社会分工产生了新的变化,其中最为核心的变化是大量重复性、常规性的工作需求减少,而创造性强、思维过程参与度高、变化多、可替代性低的工作岗位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增长极。正如世界银行在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所指出的,技术正在重塑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市场对技术可以取代的较低技能的需求量正在降低。同时,市场对高级认知技能、社会行为技能及与更高适应能力相关的技能组合的需求量在持续增加,这一方面意味着既有工作被不断取代,另一方面意味着既有工作所需技能的持续变化。^⑥社会分工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将导致劳动力技能需求层次和类别的变迁,进而反映到教育系统,促使教育体系改革回应劳动力市场的技能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提出了中等教育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多样化,中等教育结构多样化是核心,反映的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等多方面需求,也反映出人们学习需求的差异性。

时至今日,在教育的两大功能中,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和通过文化传递的方式促进社会整

①[法]莱昂·狄骥《宪法论》(第1卷),钱克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63—64页。

②[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7页。

③[美]内森·罗森伯格《探索黑箱——技术、经济学和历史》,第49页。

④宣晓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安排:从社会分工理论观瞻》,《改革》2014年第4期。

⑤赖德胜、黄金玲《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教育变革——基于劳动分工的视角》,《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⑥世界银行《201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页。

合,仍然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要求教育根据儿童日后从事职业传递不同技能的同时,培养基于共同文化的集体意识。因此,20世纪上半叶教育社会学的两个中心议题之一就是研究如何通过教育,建构公民知识,建立个人层次的身份与社会层次的结构之间的联结,以实现多元工业化社会的整合,探索教育在社会化中的作用。^①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知识与技能分类,是专门教育的原初起点,也是教育类型制度的来源。不同的教育类型,涵盖着不同的专业领域,映射相应的社会分工与社会结构。“因为正是社会结构在组织教学机构,尤其是通过学科和专业的划分来组织教学机构,此外,社会结构本身也与社会空间的结构存在着对应的关系。”^②从职业教育视角看,一是教育类型制度为促进社会分工提供准确有效的人才供给,降低劳动力市场交易成本,这一点在当前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状况下显得尤为突出。二是“职业”这一市场化活动是随着所需要的技术变化而变化的,因为经济的不同领域中技术和理性化的应用是不平衡的,^③所以要为职业内容跟上技术发展而提供适应性的教育与培训,职业教育的灵活性特征适应了职业发展性的基本特征。强化类型教育制度,关注社会分工的知识差异性,提升职业教育在人们生活各个领域的多元性和扩散性,通过不同类型社会知识的传授,从思维模式到意识情感,再到个人能力层面的差异性建构以适应不同的职业要求,从而实现社会分工中促进社会团结的基本目标。

从我国的历史经验看,传统产业工人的职业认证体系、单位制和稳定就业的“师徒制”培养体系形成了良好的职业共同体和职业社区文化。在较长一段时期里,工人阶级及其文化构成我国社会团结的重要基础。在人类日益原子化的现代社会,通过什么样的社会纽带维系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这一问题越来越尖锐。职业教育中长期的职业化学习将塑造学习者形成一种共同体意识,包括对共同的情感与理解、共同的知识、共同的文化等,反映到个体的职业意识与社会行为中,则体现为对职业本身的认同、对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的追求以及对职业共同体的维护,并在个体的基础上形成集体意识与行动,奠定促成社会团结的群体情感基础与思维习惯。以近年来非常普遍的工匠精神为例,这是一种在产业工人群体中常见的共同意识,也是职业教育实施过程中期待培养的个体气质,其重点在于个体对工作规范性、技能精确性以及工作美学的追求与内化,并外化为一系列行为特征,这些存在于工人之间共同的精神气质、行为特征与日常规范,是工人群体的共享标记和身份标志,也是凝聚工人群体、促进社会团结的重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与普通教育单一的培养方式不同,职业教育实施过程本身隐含了社会分工意蕴。无论是跨界的基本范式,还是异质性培养主体,抑或是合作的培养过程与多元培养内容,都体现的是职业和职业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并外化为一系列基于社会分工的培养行为。学校和企业职业教育体系中承担相应的职责,才能形成一个合格的人才培养程序,达成培养目标。基于社会分工的培养过程将逐步培育和生成一种分工思维与合作习惯,并延伸到工作实践中,成为影响社会分工的能力基础与意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帮助人们突破社会分工所带来知识和技能壁垒的同时,职业教育培养过程本身就是以具体的分工实践促成人们合作思维与行为习惯,从而在情感、意识和能力上共同整合各个职业群体,促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合作与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四、提供适合的教育路径: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个体逻辑

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人类财富不断累积,各个职业群体的收入不断增长,

^①王晓阳《教育社会学知识论发展——从斯宾塞到扬》,《教育研究》2021年第6期。

^②[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3页。

^③[美]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4页。

改变了工人群体的工作条件与环境,也带来社会环境与社会心态的变化,社会阶层之间差距缩小,扁平化程度越来越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对自我身份与代际身份的流动有了更高期待,身份流动更多通过教育途径来实现,并在持续教育中得到强化,这也就是民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强,对教育层次需求越来越高,对接受教育之后发展预期越来越理想化的原因。但是,反观职业教育,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诟病陷入不断窄化技能培养目标、被高等教育的扩招挤压的发展空间、被严格限制的升学通道、被反复筛选的生源等困境……一系列的因素夹杂混合,共同形塑了职业教育这一“低层次”教育的负面形象,成了一种衍生的、补充的、片段的与边缘的教育,只是获得了教育的基本形式,却没有获得教育应有的内涵^①。但是,教育发展绝不是简单地满足个体教育需求,也应关注人的整体与经济社会全面需求,在关注现实教育问题的同时,更应该对教育未来格局有充分的想象力,任何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都是不可取的。选择何种教育类型或者教育通道,首要应该以适合儿童身心发展为基本标准,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随着人类迈入智能化时代,产业形态与工作岗位对从业人员素质能力要求的变化,不管是英国的新职业主义对职业教育模式的反思,还是我国逐步探索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办学体系,都是针对工作世界出现的新趋势而进行的实践。职业教育是一种基于传递职业知识、培养复杂能力的教育,同时需要更高学制层面举办的多学制层次连续培养才能达到培养目标的教育类型。^②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不同的通道与方式,选择教育类型,只有是否适合个体需要,却不必然存在优劣之分。

在现实世界中,不同的个体和群体,由于个人禀赋与社会阶层的差异(尤其是个人禀赋),形成了不同的学习内容与学习方式。从人的特性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定义为“一个未完成式”,意味着永远处在成长的过程中。影响人的成长过程最重要变量就是教育,在适合个体的教育形式与内容中,人作为能动的个体,不断地更新自我,形成新的观念、品质以及能力,最终走向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的全面发展。

一种教育要适应学生的发展需求,应该体现集体人性、符合学生群体特征、适合个体独特个性,凸显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社会性与个性的统一,以及学生的发展是当下和未来、实然与应然、既定与生成的统一。^③职业教育与复杂职业环境紧密联系,具有典型的二重性:一方面,作为教育,职业教育本质上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另一方面,职业教育面向具体职业训练职业技能,培养具体岗位技能人才。能力特征上综合性突出,包括基本学术能力、岗位技术能力和高级职业能力(包括职业伦理和职业审美素养)等^④。从这一本质特征来看,职业教育的适应性体现在几个方面:既充分关注受教育者个体能力与气质的差异性,确保受教育者能准确认知自我,根据自身的认知能力与个性特征获得职业能力与自身素养的最大程度发展;又突出面向未来工作与生活世界的深刻变迁,培养学生发展所需的关键能力,以获得职业的方式,尊重学生生命和人格尊严,提升自我人性,重视民主原则与民主精神的养育;职业教育更将培养现代人的责任感与未来人类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获得能产生经济效益的技能知识的同时,成长为一名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⑤职业教育从内容、形式、手段、目标以及未来发展取向等方面为学生提供了一种与普通教育迥异的选择,并以适应学生个人禀赋、兴趣与能力差异的方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从而形成了学生个性与群体共性统一、尊重学生个性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统一以及为学生提供当下发展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相统一的个体教育逻辑。于个人

①徐国庆《什么是职业教育——智能化时代职业教育内涵的新探索》,《教育发展研究》2022年第1期。

②徐国庆《什么是职业教育——智能化时代职业教育内涵的新探索》。

③冯建军、刘霞《“适合的教育”:内涵、困境与路径选择》,《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④陈鹏、庞学光《培养完满的职业人——关于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构思》,《教育研究》2013年第1期。

⑤唐智彬《“适合的教育”体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江苏教育》2018年第4期。

而言,职业教育既不是次等教育,也不是补充教育,而是指向不同培养目标与培养内容定位的教育逻辑,可能发生在个人成长的中等、中等后和高等教育阶段,也包括了自己获得学历资格、工作本位学习与继续培训及职业发展,还包括适合国情、地情的多元技能发展机会^①。职业教育在职业性、选择性、终身性与包容性等方面的特征是普通教育所无法囊括与替代的,也满足了个体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内容与方式的全面适应性发展需求。

五、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制度调适策略

对教育类型的认知与确证最终都需要制度的维护与强化,因而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关键在于制度调适。由于任何分类最初都是在群体或集体相互分离的过程中出现的,都是在群体差别的基础上对各种事物、事件和事实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分类不能划归为个人能力的范围,相反,它的实质乃是集体思想。倘若我们揭示了分类系统得以形成的根源,我们也就找到了解决社会如何安排、分化如何产生、制度如何思考等问题的内在线索。^②教育类型制度也是如此。有研究者发现,我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虽然教育机会总量增加,但是教育不平等程度不降反升,学轨制(普职分流制度)对我国教育公平问题存在负面影响。^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正是我国目前并不完善的教育分流体制和教育类型制度造成的现实结果。要改变教育分流导致的教育不平等或者对某一类型教育的拒斥,并不是要将某类型教育简单取消,而是应该建立健全科学的分流制度,强化教育类型制度的调适功能,而非筛选功能。教育类型制度的功能在于建立一种集体思想(denkcollectiv),其核心要义不是强制人们去遵守教育分流的规则,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们如何认知(对教育分流和职业教育的科学认识)和习得(行动上的自主选择)的问题。^④教育类型制度最根本的目标,是要塑造一种对教育分流和教育类型的规范性框架,让人们获得某种或某些认识真实教育世界和现象的思维图式,再来指导自身的行动并为其赋予意义。制度并不是社会世界的直接反应,因为后者是多重实在构造,各种制度只能对应于不同实在之不同层面的认识诉求。^⑤基于这一基本认识,要促成教育类型制度演变成道格拉斯所谓的“一种重复稳定的观念习性”,从而形塑人们的思考模式与行为方式,转变为体现惯性的社会现象,将职业教育类型制度发展成为突破社会不平等累积性,不断促进社会公平的教育制度安排。

(一) 在技术知识与思维模式独立性中奠定职业教育类型制度的观念基础

观念是制度的基础,教育类型制度则应建立在相应的知识观念之上,职业教育有独立的技术知识基础,技术知识的独特性无法被学科知识代替,也不比学科知识地位低。这是我们讨论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的起点。

教育类型制度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知识观的冲突,也就是知识是否有高下之分,是否有秩序、等级或者价值的差异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知识的价值取向与内容实质都存在差异,通过各种社会机制传导到制度安排,并强化人们的观念与选择。“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一种典

^①UNESCO,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TVET)”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45178_2022-05-17.

^②渠敬东《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

^③吴愈晓《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1978—2009)》,《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4期。

^④F. Ludwik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⑤F. Ludwik *Cognition and Fact*,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转引自:渠敬东《制度过程中的信息机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型的知识观偏见,并形成了长期观念影响与社会后果,也支持了长期以来的教育制度。学者认为,对知识观的不同认识必将深刻影响承担相应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教育类型,独立的教育类型,也必定是以相应的知识论为基础,职业教育所教授的知识,必须体现知识类型的独立性、完整性与复杂性,需要专门教育类型来传递。

目前,理论界共识是职业教育知识基础是技术知识,它在知识逻辑、生成方式、知识内容、知识基础以及知识形态与科学知识都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同时技术知识形成的复杂性与知识来源的多元性等特征共同决定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知识基础,并体现在人才培养过程、办学形态以及管理模式等方面。^①随着传统的纯粹人文、自然科学的学术性内容与形式已经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形态的需求,强调职业性知识、功利性知识以及实用性知识的独立性,理解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是人类知识体系与经验世界中并行的双轨,个体学习的过程也需要不同的教育过程,这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部的需求,也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教育基础。从观念层面认识到职业教育知识基础的独立性,突出技能学习与技能活动的特殊性,形成一种关注与普通教育不同类型的教育思维方式和人才成长模式,在理解技能知识与技能生活中生成职业教育情感,从观念层面确立教育的类型思维,并转化为塑造职业教育类型制度与社会心态的根本力量。

(二) 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过程中强化类型制度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是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与运行的基础,驳正了“二流教育”“低层次教育”的错误观念,强化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价值观、教育权利观以及教育质量观等,奠定了“双通制”“双轨制”等分流、分类制度等的基石,形成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类型制度的互动。类型制度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逻辑起点,如果职业教育没有独立地位与独特类型,也就没有独立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此同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完善与结构健全,又将进一步强化类型制度,提升职业教育的结构性地位。

基于类型定位的制度视角来推动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一是建立职业启蒙教育以及职业初中、高等专科、本科层次以及更高层次的现代教育体系,实现内部有机衔接、螺旋递升的一体化。与此同时,从职业学校类型和层次上,建立与普通教育平行且完整的学校体系,丰富职业教育办学形式,并不断完善各层次职业学校以及与其他普通学校之间衔接与沟通机制。在此基础上,统筹设计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实现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既从培养机构设置上满足高技能人才发展需求,又从培养机制上统筹考虑人才成长规律,形成职业准备教育与职业继续教育有机衔接。

二是完善职教高考制度。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制度,^②职教高考制度将为个体提供科学合适的教育参与机制、为高层次职业教育选拔合适生源,进而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人才培养基础。因此,从国家层面建立面向类型教育的职教高考制度,总体上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从考试制度的角度完善职教招生方式、招生专业、高考科目以及招生学校等内容,实现为学生提供机会并突出教育公平的独立职教高考制度,从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三是构建符合职业教育办学需求的管理制度与治理模式。职业教育本身的“跨界”特征决定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与普通教育的本质差异,需要相应的管理制度与治理模式以适应类型发展需求。首先,应继续强化而不是弱化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或独立办学,或联合办学,或支持办学,总之,企业参与程度应该更高。其次,职业院校主管单位应强化部门特色,而非由教

^①徐国庆《确立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根本需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②徐国庆《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关键制度的职业教育高考》,《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

育部门一家管理。最近,部分地方出现将大部分高职院校的管理权限由其他部门逐步集中到教育行政部门,从而产生了对办学特色丧失的隐忧。符合职业教育办学特色的管理模式应该凸显产业、行业、企业以及部门特色。再次,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应在符合教育机构特征基础上,凸显职业院校在教育与职业、企业与学校、工作与学习、学分与资格等方面的跨界与融合特色,以职业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累积类型特色,强化类型制度。

(三) 以完善的配套制度体系稳定类型制度基础

由于制度在人们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处处需要诠释,并根据自身的理解来采取行动,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从而形成制度的两个基本特点:习俗观念的稳定性和多重实践诠释与行动的不确定性^①。这就需要制度与观念、制度与文化、制度与制度、制度与社会基础之间的长期互动。职业教育类型制度建立与强化是建立在一系列配套制度基础之上的,这是职业教育自身特征所决定的。

一是完善国家技能治理制度。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形塑了不同的国家技能治理制度与模式,其中涉及教育与培训体系、劳资双方关系处理等。我国属于典型的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系,政府在技能形成与技能治理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应进一步明确技能作为国家能力形成重要来源的基本观念,强化市场在技能形成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建立科学的技能供需结构,调节技能短缺,形成高质量的技能需求与供给预测机制。从技能治理的角度,完善劳资关系,建立适应现代产业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与个体发展需求的劳动制度,建立企业层面技能积累机制,促进技能人才个体需求、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与动态平衡。

二是完善技能工人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保障制度。研究者发现,在技术技能提升上倾注大量时间与精力的技术工人最终目的居然是为了脱离技术岗位^②,尤其是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去技能化”“逃避工厂”等倾向,既与成为制造业强国、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目标相悖,也必然对技能人才培养的“上游”职业教育造成负面影响。上述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技能人才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难以得到切实保障。推动评价制度改革,形成企业在管理人才与技能人才管理方面的双轨体制,保障技能工人发展不设限,纠正“做好技术就是为了成为管理人员”的不良倾向,实现技能人才、技术人才以及管理人才同等重要、同等待遇、同等发展。政府应针对此出台专门制度,确保技能人才的地位、经济待遇、个人发展与荣誉等方面的权利,促使工人阶级重回社会中心。

三是建立国家职业资格框架制度。构建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的国家资历框架,实现职业资格制度与职业技能等级认证、学历证书以及职称等制度的沟通衔接,这是推动职业教育类型制度落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通过完善国家职业资格与学历、技能等级等方面的统筹设计,实现衔接互通、等值互用,继而将贯穿技能人才发展的学习成果认证体系与技能人才职业发展进行统筹设计,形成在国家资历框架下的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与机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等制度,促进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有机衔接。

由于制度是为了规范人与人利益关系而形成的一整套规则,一个制度被“广为接受”,成为社会事实后就会转化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力量^③。如果一项制度暗含的行为模式、选择倾向的假设与人的本性是相冲突的,这一制度的组织成本将居高不下,教育类型制度莫不如此,有效的制度将在经济社会运行现实中真正起作用,通过制度实现节省交易成本,规范市场行为,并为政府授权,以制度促进

^①渠敬东《制度过程中的信息机制》。

^②王星《学术为了不再做技术》背后的逻辑是什么,2019-05-03,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387492 2021-07-17。

^③周雪光《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页。

发展^①，职业教育类型制度同样也体现这一基本特点。如何从价值、认知、组织以及技术四个层次理解职业教育类型制度，并将其转化为社会惯习，需要价值层面的引导、国家层面的制度完善、社会层面的制度认知、组织层面的制度执行与保障以及技术层面的制度随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从而使职业教育类型制度从倡导到落实，再到在社会运行过程中起作用，引动社会观念改变与社会文化形成，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这可能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责任编辑: 蒋永华)

Type Attribut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ts Triple Logics and System Adjustment Paths

TANG Zhibin

Abstract: The typological orient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varies significantly in different times, cultural contexts, and ways of think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ypological attribut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typological theory and a rational structure supported by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From the triple logics of the state, the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we should focus on the core function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its three fundamental dimensions, i. e., contributing to the growth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capacities, promoting social solidarity by adapting to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rough a suitable education. The key to emphasizing the type attributes and optimizing the typological orientation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rresponding system and shaping a normative framework for the cognition of educational diversion and educational types, so that people can acquire a thought schema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al worl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henomena, which can be used to guide our actions and make them meaningful. The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for optimizing the typological orient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transforming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laying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 of the typological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independence of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modes of thinking, strengthening the typological system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stabiliz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typological system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und supporting institutional system.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type system; national logic; social logic; individual logic; typological system

About the author: TANG Zhibin, PhD in Education, is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Desig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①樊纲《制度变革与中国转型》，《全球化》2019年第10期。

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的基本框架与现实路径

◆唐智彬 王池名

摘要:融入乡村产业、服务乡村振兴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但当前职业院校产教融合的产业“先进主义”、企业“以大为美”以及地域“城市中心”等倾向,不利于高职教育与县域以及乡村产业形成深度合作。基于“融合发展”的指导思想,以政府引导、精准对接和共享发展为原则,构建高职院校融入乡村产业的基本框架,实现以产教融合优化乡村产业人力资源结构、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和创新以及参与乡村秩序构建与乡村治理。推动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重在加强产教融合平台建设,改进县域产教融合治理;促进有效衔接,完善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的实践框架;培育生态,实现高职教育融入乡村振兴的全过程。

关键词:乡村产业,高职院校,产教融合,乡村振兴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21.19.016

在乡村发展问题上,从历史和现实看,关键在乡村产业。“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之根,“产业振兴”是“五个振兴”之首,是乡村发展的内在要求。没有“产业兴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农村脱贫,“农民富裕”和“治理有效”的美丽乡村景象也就不会出现。作为与产业发展紧密联系的高职院校,如何利用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契机,拓展产教融合的服务方向,“深耕”乡村产业,服务农村农民,是一个亟待重视的现实课题。

一、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的价值分析与现实困难

从总体看,乡村产业涵盖范围广,在农业之外发展出包括农、工、商、运输、服务等部门,形成一个完整的乡村产业体系。^[1]乡村产业发展与兴旺存在四个维度,包括农村产业要素具有与其他产业大致持平的要素回报率、农村产业的创新贡献度或全要素生产率在持续提高、农村内部的产品结构更能契合居民变动的消费结构、农村产业融合形成对接城乡

居民需求的新供给体系。^[2]要实现四个层面的内涵提升,亟待促进乡村产业的人才、技术、组织和市场等方面的创新。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乡村产业与城市产业具有本质性差异,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乡村产业植根于乡村社会,受到乡村社会秩序、人际关系以及乡村文化观念的影响,是嵌入在乡村社会中的,具有整合乡村社会、盘活乡村资源的优势。因此,乡村产业既具有经济性,又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承载了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高职院校应思考如何从乡村产业的特征出发,主动融入乡村产业,服务乡村产业发展,从而发挥自身在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和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1. 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的价值分析

一是从发展特征来看,乡村产业发展亟待高职教育的深度融入。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3]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产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粮食产能连续7年保持在1.2万亿斤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达14.9万亿元,乡村休闲旅游营业收入超过8000

唐智彬/湖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 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池名/湖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 (长沙 410081)

亿元,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营业收入超过2000亿元,农村网络销售额1.3万亿元,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人员累计达780万,乡村产业体系逐步形成与完善,一批彰显地区特色、体现乡村价值、乡土气息浓厚的乡村产业,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力支撑。^[4]同时,乡村产业也存在产业门类不宽、产业链条不长、要素活力不强和质量效益不高等问题,造成乡村产业吸纳就业空间有限,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农村空心化、“三留守”问题突出;农业比较效益偏低,农村二三产业规模小、层次低。^[5]造成这些问题当然有市场、政策以及经济环境等外部条件的原因,但从乡村产业自身看,人才、技术和管理的短板是根本原因。解决乡村产业发展的困难,不仅仅需要政策保障与经济手段,以解决制度、资本和产业布局问题;更需要从乡村产业弱质性的根源出发,破除造成乡村产业“弱”、“少”、“劣”的痼疾。职业教育与产业存在天然联系,休戚相关,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技术开发与技能积累对产业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产业基础也决定了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世界各地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开展职业培训的重要理论前提和政策基础。在具体方式上,职业教育通过与相关产业结合,主要以技能型人才培养、辅以产业结构更新和产品创新为服务内容。在乡村产业发展与振兴的过程中,需要更多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参与,从而改善乡村产业从业人员素质与人力资源条件,发展乡村产业技术,改进乡村产业管理,推动产业升级,这无疑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有针对性地解决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现实难题的重要方式。

二是从产教融合本质与高职院校自身发展需求看,融入乡村产业是高职院校发展模式的创新途径。作为一项典型的“跨界性”制度,产教融合将在异质性的组织之间实现高水平的信息、经费、人才等资源的交换与互通,解决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脱节。从制度的直接目标来看,产教融合旨在解决大批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能人才的培养问题,多主体协同解决限制我国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核心工艺问题,推动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高效转化为先进产业技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中的自主创新问题,蕴含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发展多重目标与意义。

从高职院校的角度看,产教融合旨在突破办学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产教“两张皮”、传统办学模式滞后于产业技术发展及人才培养的需求等现实制约。通过提升产教融合的水平,高职院校将进一步聚焦发展规划和资源布局,推进人才培养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服务能力,实现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发展协同创新、共同发展。^[6]在国家产教融合的总制度框架下,高职院校的重要职能就是对接国家重大战略,以产教融合承担历史使命,服务乡村产业发展与创新,实现高职教育及其他资源的乡村内部化,以产教融合的视野扩展与质量提升,推动乡村产业现代化,彰显高职教育在国家战略中的独特地位。从这一意义上说,高职教育通向农村、融入乡村产业,以产教融合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以产业兴旺奠定乡村振兴的基础,这不仅仅关系高职院校自身发展,更是高职院校及其产教融合行动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重要职能选择与历史使命。

三是从乡村振兴和产教融合的政策导向来看,以产教融合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既有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又有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将产教融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融入经济转型升级各环节,贯穿人才开发全过程,形成政府企业学校行业社会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7]这是我国产教融合的顶层设计,意味着教育与产业形成全面的融合关系,包括乡村产业。类似的意见也出现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其中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有机衔接、深度融合”。2018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要“支持地方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综合利用教育培训资源,灵活设置专业(方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乡村振兴培养专业化人才。扶持培养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等。”^[8]2019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中也提出要“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大力培育乡村产业创新主体”,“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联合攻克一批农业领域关键技术”,“建立健全科研人员校企、院企共建双聘机制,实行股权分红等激励措施”等。^[9]从上述政策内容不难看出,国家政策支持高职院校充分发挥社会服务功能,积累自身在人才培养、技能

开发、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方面优势,与产业、区域、企业和行业紧密合作,形成与产业协同发展、融合发展的格局。尤其是在产业分散、技术能力弱、技能人才少、创新意识欠缺的乡村产业领域,高职院校更应通过适当的方式,主动对接、精准服务,以高水平产教融合实践回应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要求。

2. 当前产教融合的几种倾向导致高职教育难以融入乡村产业

一是产教融合存在“产业先进主义”取向,影响了高职院校对融入乡村产业重要性的认识。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先进产业体系是支柱。关注先进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应有的价值取向。推动产教融合,重在推动职业教育与先进产业的合作,关注产业部门的现代化、前沿性和先进性。因此,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遴选标准中,明确“重点建设培育主动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优质企业”。惟其如此,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才能不断适应并逐步走向引领现代产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代产业体系中,除了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引领产业发展方向的现代企业之外,还有大量传统技术工艺工业或者传统手工业。以贵州为例,2017年该省手工业产值达60多亿元,带动百万余人口就业,是现代产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产业虽然并非“高、精、尖”,但同样需要通过产教融合得到发展,使技术实现创新,改进管理。部分乡村传统非遗产业,由于缺乏现代工艺与现代审美,出现产品单一、审美陈旧的状况;同时,这类产业的技术普遍单一,包装、营销往往跟不上产业与市场需求,因而发展举步维艰。因此,产教融合发展版图中应该加大对这类企业和产业的关注,实现乡村产业的现代化改造。

二是产教融合企业的“以大为美”可能忽视了大量中小微企业,尤其是乡村企业的需求。2018年9月,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培育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并对产教融合型企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规模上,企业应为在中国境内注册成立的规模以上企业,依法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在实训基地、专业、教学课程建设和联合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校企合作3年以上,同时还明确了其他相关要求。^[10]从各个学校推动产教融合的实践来看,也往

往以与多少家“世界五百强”或者规模企业形成合作为宣传卖点。这固然无可厚非,因为大型企业具备资源、管理、技术以及人才的诸多优势,这些都是建设高水平产教融合的重要基础。但是,我国现代产业体系中还有数量庞大的中小微型企业,它们是市场主体的绝大部分,在就业岗位、专利发明、GDP和税收等方面贡献超过大型企业。从数据看,2018年末,我国共有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1807万家,占全部规模企业法人单位的99.8%。其中,中型企业23.9万家,占比1.3%;小型企业239.2万家,占比13.2%;微型企业1543.9万家,占比85.3%。^[11]如何通过产教融合关注他们的发展需求,是完善我国现代经济体系建设、提高产业竞争力、改善产业生态的重要基础,也将促进高职院校发挥社会服务职能,实现健康发展。

三是“城市中心”导致县域产业体系和乡村产业成为产教融合的“洼地”。“城市中心”取向代表一种效率主义,旨在利用城市人才、产业、教育、技术以及资本等资源集中的优势,发挥城市综合承载改革功能,突出行业和企业优势,探索教育与城市互动的方式,因此产教融合的重要原则也是“以城市试点为基础,突出城企校联动”。以城市为中心的产教融合模式改革“基本盘”,将推动行业组织、产业政策更好融入产教融合改革,为地方产业发展提供精准助力。^[12]但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县城是基础,县城产业和乡村产业是关键点,也是难点。推动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也应该关注县域和乡村产教融合工作。县域和县城产业的资源承载和发展模式与城市存在较大差异,在产教融合的资源分配、行业投入、企业参与以及政府角色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征。城市中心的产教融合模式无法完全覆盖所有产教融合模式特征,在重视以城市为节点的同时,产教融合也要积极研究与县域和乡村及其产业融合的方式与路径,探寻其中的规律,避免出现城市中心模式下的产教融合“洼地”。

二、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的基本框架与核心内容

从高职院校的角度看,推进与乡村产业的融合,既要关注现有乡村产业水平的提高,又要关注乡村产业潜力挖掘与创新培育;既要关注现有产业人才

队伍的优化,更要通过融入乡村产业推动现代高等教育通向农村,改进乡村社会治理,以产教融合促进城乡融合,从而实现服务乡村振兴的定位与目标。

1. 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的基本框架

与乡村产业的融合,在本质上与其他城市产业的融合是一致的,目标都在于“促进教育和产业体系人才、智力、技术、资本、管理等资源要素集聚融合、优势互补,打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13]但是,由于乡村产业的特殊性,高职院校融入乡村产业在模式和框架上特点突出。

(1) 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的指导思想

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的指导思想是“融合发展”,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旨:一是实现高职教育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重点在于推动高职教育主动服务乡村产业,提高产教融合效率。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和具体内容,促进高职院校完善发展规划和资源布局,在服务乡村中实现产教融合的人才合作培养、技术协同创新和精准社会服务等多方面发展目标,促进高职教育与乡村产业全面衔接,共同发展。二是在产教融合中实现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乡村产业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2018年一号文件明确了“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立足乡土的发展,决定其应走乡村融合发展的道路,从而进一步融入乡村社会,融入农民日常生活,发挥乡村产业的发展功能与治理功能。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涵盖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同时与二、三产业的有机整合,同时还要突出农业及乡村功能的扩展,^[14]重在乡村产业影响力的整体提升。高职院校要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与能力优势,促进乡村产业在结构、内容与发展方式上的创新,进而实现融合发展。三是以产教融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是我国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和目标之一,发挥高职教育的社会引领作用和高职业院校组织的资源撬动功能,以乡村产业发展为抓手,从而有力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优化城乡公共资源配置,逐步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格局。

(2) 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的基本原则

一是政府引导原则。与城市产业的融合不同的是,高职教育与乡村产业的融合不仅仅需要尊重市场规律,更应该重视发挥政府的关键作用,遵循政府引导与市场参与相结合的原则。政府应着力引进与

县域支柱产业紧密对接的高职教育资源,将县域层面的产教融合合作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与高职院校为主体、社会积极参与的高职教育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格局。

二是对接服务原则。高职院校选择融入哪些乡村区域、哪些乡村产业需要科学选择、精准对接。目前,乡村产业处于发展期,繁荣与短板并存,高职教育的资源优势 and 智力资源如何精准输导到相关产业,决定了产教融合目标的实现。高职教育资源与县域经济社会和产业特征的精准对接,首先要主动研究县域产业结构与特征,准确把握需求,选择与自身专业结构相关的县域及其产业作为服务的重点。其次,深入研究乡村产业发展中的痛点和难点,以全方位智力支持形成乡村产业发展问题的精准解决方案。再次,高职院校应集中优势资源,重点突破,解决乡村产业中的突出问题,提升资源投入效率。

三是共享发展原则。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享发展作为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原则,也将体现在高职教育与乡村产业的融合过程中。乡村社会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洼地”,乡村产业是人才与技术的“洼地”,因此,共享发展原则就是要通过产教融合的方式,促使乡村产业和乡村社会共享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各项成果,保障乡村民众享受优质、充足的教育资源权利,保障乡村产业共享人才培养成果和技术发展红利的优势,为构建健康乡村产业体系奠定基础。

(3) 高职院校融入乡村产业的运作机制

高职院校融入乡村产业的运作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高职与乡村产业融合中各利益主体的定位;二是运转机制,即确定融合框架中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在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的基本框架中,利益主体主要包括地方政府、高职院校以及相关企业。各个主体虽然有各自的利益取向,但是三方共享一个目标,即以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三方在这一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之下形成合作关系。

从县域政府的定位来看,应充分发挥其县域治理的基本职能,围绕区域产教融合治理的重大事务,利用政策、财政以及组织优势,整体规划区域产业发展、教育布局、社会建设等。政府应在推动县域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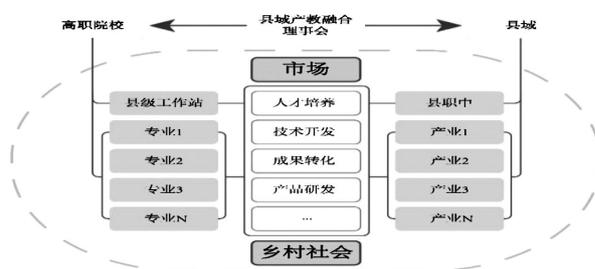
布局与发展过程中,积极吸引高职院校融入乡村产业,为其提供产教融合的便利条件。在课题组所观察的案例中,县级政府主要领导在促成高职院校与县域的合作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将高职院校与产业的合作提升为高职院校与区域的全面融合,营造了良好的融合生态。

从高职院校的定位来看,应依托产教融合平台,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品研发以及拓展服务等多元优势,积极承担教育机构的社会责任,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将自身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回应乡村产业的需求,全面融入乡村经济、文化与社会之中。高职院校不仅服务乡村产业发展,更应围绕乡村人群的发展需求提供优质的高职教育服务。

乡村产业既包括县域支柱性产业,同时也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小微企业。从定位看,在产教融合的过程中,乡村产业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功能:一是通过产教融合发展,提升发展水平,奠定县域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二是以自身的产业资源参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因此,乡村产业既要积极应对自身发展中的短板,利用高职院校的人才、智力和资源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水平,以此扩大影响力。与此同时,乡村产业也要积极参与到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在课程开发、师资支持、实习实训基地开放、协同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等方面与高职院校形成全方位的合作关系。

2. 高职院校融入乡村产业的重点

一是以产教融合优化乡村产业人力资源结构。我国农村产业兴旺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农村产业形态、技术进步、组织方式、生产体系等多个方面,但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因素,即乡村从业者的素质、能力和人力资本含量。由于乡村产业的区位弱势和产业本身存在的弱质性,因而在人力资源储备和人才吸引方面存在天然不足,这也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既有传统产业人才流失、培养周期长、培养方式落后的问题,也有新乡村产业吸引力不足、人才聚集效应差等问题。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参与乡村产业技能人才培养,优化乡村产业人力资源结构,从而在理念、管理和技术上改进乡村产业的人力资源优势,激发技能人才作为乡村产业创新发展的要素动力。



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的基本框架

在课题组关注的案例中,G高职院校通过融入D县某镇的侗锦产业,促进优化了该产业的人力资源结构。织造从业女工年龄普遍偏大,产品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受限,且存在“青黄不接”的状况,学校相关专业为该镇产业从业人员设计了侗锦织造技艺传承与产品创新研修班,以工艺美术产业为主体力量,成体系地开展非遗人才培养培训。通过设计基础课程、拓展课程、实践课程和展示交流课程四个教学模块,共16项教学内容,帮助传承人群掌握非遗保护、侗锦创新设计等专业知识,开拓眼界格局,从而全方位提升现有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同时,G校通过聘请该镇产业的国家级非遗文化传承人在学校开设名师工作室,参与到学校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开发和具体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实施“大师工作室+项目+产品”工学结合、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用现代高职教育的理念与方式,解决了传统手工业产业人才培养的手段单一、内容陈旧、周期过长等问题。为产业发展准备了后备力量,并及时补充。因此,通过融入乡村产业,高职院校一方面优化了现有从业人员结构,改善了乡村产业人力资源结构;另一方面通过合理挖掘乡村产业的技术人才优势,将其及时而有效地转化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相关产业培养生力军。

二是以产教融合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和产品创新。在乡村产业中,产业发展通常依靠两类因素:要素供给和要素组合效率。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农村产业兴旺除了依靠要素回报率提高来夯实要素供给之外,还应依靠技术、组织、市场创新来提高要素组合效率。高职院校融入乡村产业,就是要通过教育激活要素,促使农村产业要素具有与其他产业大致持平的要素

回报率,提高农村产业的创新贡献度或全要素生产率,使得农业内部的产品结构更能契合居民变动的消费结构以及形成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新供给体系,^[15]从而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更新乡村产品结构,实现乡村产业发展创新。

从产业布局与规划到新产品研发,从非遗保护与研发到传统产品改良,案例学院在过去几年中一直高度关注D县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创新,利用自身的优势,参与乡村产业发展。学校组织相关专业团队和研究力量,帮助D县制定传统产业发展战略,并在D县Y镇投资千万,校地共建了侗族非遗保护与研发工作站,帮助县文化和旅游产业研发新产品,为乡镇发展特色产业,建立旅游工艺品创新研发与新产品孵化基地。为进一步提升县城产业发展品质,校地共建构建了“非遗进校园、技艺进专业、大师进课堂”的教学组织模式,实施“人才培养、技艺传承、文化研究、创新研发、传播推广”五位一体的非遗传承保护模式。在该校与非遗产业的融合过程中,通过现代审美艺术改造“非遗”,提出“非遗”产业不能仅仅停留在博物馆,更应该通过现代艺术创新结合走入千家万户。该校在非遗人才培养上形成了“四能力三模块”培养体系,即毕业生具备“文化研究能力、技艺传承能力、产品创新能力、传播推广能力”四种核心能力,培养课程由“非遗共享课程模块、非遗特色课程模块、非遗互选课程模块”构成,能力培养贯穿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16]在这一模式下,该校与合作乡村产业融合创新,以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设计结合,同时通过高职教育将非遗文化进行扩散,一方面形成了系列非遗产品设计,传统工艺得到创新传承,丰富了产品结构形成;大批毕业作品成为产品、商品;另一方面,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内容改革持续深化,专业内涵不断提升,专业底蕴逐步积累深厚,成为产业创新的重要智力来源。

正是通过融入乡村产业,高职院校促进了乡村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进而激发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有效地推动乡村产业的产业融合、产业链延伸、产业功能拓展和产业附加值增强,从而不断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三是以产教融合参与乡村秩序构建与乡村治理。“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改进乡村治理也是产业发展在乡村的功能扩展,这是乡村产业

区别于城市产业的地方。乡村社会除为产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原材料外,更为重要的是乡村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为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社会基础。只有深入理解乡土社会具体的历史传统、社会关系和文化伦理,才能理解乡村产业的发展历程、发展逻辑及其转型路径。^[17]乡村产业发展引发了经济秩序的变革与分化,在市场力量渗入乡土社会之后,农民观念与行为都将发生相应的改变,进而带来乡村秩序的变革,产业兴旺与乡村治理有效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系机制。^[18]乡村产业的发展与变革,改变了乡村经济形态与农民生产状态,引发乡村社会变迁和农民生活方式的革新。乡村产业形态和乡村社会的变迁,带来农民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乡村生活要素的重构,并逐步形成基于“乡村产业兴旺”的新型乡村社区共同体。高职教育在与乡村产业融合的过程中,要利用这种特殊性,扩散自身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参与乡村社会秩序构建与乡村治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G校通过深入研究了解到,D县有大量农村女性从事侗锦生产与制作工作,她们普遍存在的技术短板、设计能力不足以及营销方式落后的问题。而这些边远乡村地区的女性属于弱势群体,如何保障她们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点和关键,因此,利用她们自身技能提升其经济独立的能力是一个突破口。G校针对这部分妇女的需求,利用其承担的文旅部、教育部等相关部委培训项目,联合本地侗锦企业和专业合作社,面向乡村侗锦从业人员开展多次短期培训班,同时利用学校其他专业,如包装设计、品牌营销等专业力量,主动服务乡村产业的包装和营销,帮助她们开拓市场。由于培训带动和销售激励,当地从事侗锦生产的女工增加,产品销路拓展,收入增加,W村侗锦总产值就达到400多万元,不少女工年收入超过3万元,不仅顺利脱贫,女性地位普遍得到提升,有了更好的乡村社会发展基础与治理条件。更重要的是,高职教育在乡村扎根,让民众看到教育的优势,改变了乡村居民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文化,村民以参与培训、接受教育为荣,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乡村文化,有力改变了以往的不良风气,乡村风貌焕然一新。

总之,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触发乡村产业结构与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从而在经济秩序的变革与分化中奠定社会治理的经济基础,逐步构建新的

乡村社会秩序和治理特征。通过推动更多优质高职教育融入乡村,营造良好的乡村教育氛围,以教育塑造乡村文化,提高乡村振兴中的乡村教育振兴标准,以教育影响乡村居民观念、素质与能力,为改进乡村社会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乡村产业潜能巨大,关键在于通过合适的政策与机制,激活乡村产业的主体地位和主体功能。利用县域政府的资源统筹能力,促成高职院校与乡村产业合作创办产教融合研究中心,推动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发挥其在乡村产业技能人才培养、传统工艺技术创新以及参与乡村社会秩序建设与乡村治理中的资源和能力优势,形成“教育提升-工艺传承-产业创新-产业布局”的乡村产业发展与创新路径,构建乡村产业兴旺与乡村治理互动的乡村社会发展格局,全方位提升高职教育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

三、促进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的现实策略

坚持以融入乡村产业作为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这是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扩展产教融合功能与定位的重要方式,应该在疏通体制和完善机制中实现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具体而言,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服务乡村振兴应通过一系列组合策略,形成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的系统方案与现实策略。

1. 改进治理,构建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的平台与机制

在推动高职教育资源通向农村的过程中,我国积累了不少经验,如“对口帮扶”“驻村帮扶”等方式,在物质和教育扶贫方面积累了很好的探索。但是,这种方式很难形成长效机制和稳定联系,在合作内容方面较为狭窄,合作成效也较为单一,县域政府也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治理手段。因此,在乡村振兴时代,促进高职教育资源通向乡村,产教融合嵌入乡村社会,需要新的机制和模式。高职教育与乡村产业的融合,不仅仅是个政策过程,更是产业体系与产业结构调适及其与乡村社会整合、融入农民日常生活的过程。因此,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是一个集政府、市场与社会于一体的过程。其中,政府提供政策是基础,政府行政支持也是重要条件,通过政府的有效介入和积极引导构建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

产教融合服务乡村振兴的“校地合作”发展模式,推动县域产教融合治理。

一是县域层面建立产教融合的服务平台和引导机制。基于县域产业特征与发展方向,遴选合适的高职教育资源形成合作框架。通过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高职院校与区域建立全面合作关系,搭建产教融合的工作平台。高职院校和县域中等职业学校的发展应与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定位进一步契合,促使职业教育真正成为推动县域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关键动力,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学校、市场与社会参与的产教融合机制。同时,依托县域职业中学,搭建优质高职教育资源的引导通道,将城市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精准“引流”,让高职教育有通向乡村社会的便捷、稳定的渠道。

二是整合研究县域产业、教育资源培育与本土人才培养问题,形成三者同步规划、统筹发展的格局。在政策执行层面,利用县级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推动产教融合制度的协同执行、共同推进。立足县域内乡村产业优势和产业特色,通过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完善县域内职业教育资源的布局与系统结构,构建适应县域产业发展需求的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建立区域内资源共享共用机制及信息沟通机制。统筹县域内职业教育发展和技能型人才培养与县域传统文化产业传承与创新、现代产业升级、新型产业引进与发展以及乡村社会服务等各项事业协同发展,以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和县域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嵌入县域经济社会的总体布局,形成高职院校联接乡村社会的重要纽带,塑造产教融合服务乡村振兴的发展范式。

三是完善县域产教融合管理体系,重塑产教融合价值链,为产教融合中企业、高职院校等各类参与主体进行精细化功能分类,准确定位产教融合中不同角色与功能。县级政府在国家产教融合制度框架下,出台面向县域企业和乡村产业的政策支持、税收优惠、专项补助与金融资助等组合式激励政策。在产教融合工作评估上,县级政府应整合教育、产业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要素,面向职业院校和乡村产业,设立产教融合政府奖励基金和相关荣誉,激励高职院校参与乡村产业发展,同时引导乡村企业转变发展思路,走产教融合的发展与创新道路。

2. 多重对接,完善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服务乡村

产业振兴的实践框架

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服务乡村振兴需要建立有效机制,从多个层面保障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提高乡村产业发展水平。高职院校应及时调整办学重点与发展方向,回应国家重点发展战略需求,充分融入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社会进步的各个环节,并及时反馈到人才培养与技能开发的全过程,探索与县域政府、乡村产业以及市场协同推进产教融合的路径。具体而言,需要通过建立多重机制,以产教融合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全过程。

一是要从宏观层面,形成国家政策与制度对乡村产业系统和高职教育系统有效融合机制的引导与促进。作为一项国家教育政策,在推动职业教育体系与产业体系形成融合常态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与国家重大战略与行动的具体对接,寻求政策发展过程中的创新空间。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乡村产业始终是乡村发展的重点和关键,产教融合应从宏观层面寻求与乡村产业体系与产业政策的对接与整合,明确功能定位。

二是在高职院校层面,完善与县域乡村产业链融合的功能设计。充分理解乡村振兴进程中高职教育的社会责任,对接乡村产业与乡村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基于自身的基础能力和优势专业找准重点领域,系统建构乡村产业的产教融合框架,推动自身优质资源通向乡村;同时着眼于乡村社会发展全局推进,紧扣融入乡村产业和乡村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完善学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总体功能设计。

三是在具体操作层面,构建面向乡村振兴的产教融合实施框架。高职院校既要充分理解乡村振兴的产教融合服务方向和重点,完善院校与县域、专业与产业、教师与农民的对接机制,搭建合作平台,建设县级产教融合工作站;又要为乡村产业“定制”服务内容,在课程体系、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等方面形成适应性特色;还要充分发掘乡村产业的独特资源,服务人才培养。如乡村传统产业中国家级、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就是重要的教育资源,能很好地弥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资源短缺。学校在乡村产业所在地建立保护和研发中心,更直接参与产业的发展与创新,同时也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便捷、优质的实习实训条件,在优化县域职业教育本土资源,实现高职教育真正扎根乡土。

3. 培育生态,促进高职教育全面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

推动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以产教融合推动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生态是基础,也是产教融合发展的基本条件。产教融合服务乡村振兴的生态,指的是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与乡村社会系统中的复杂行为与关系。在这一生态基础中,政府、高职院校、市场与产业系统以及乡土社会等行动主体之间进行沟通、交流以及互动,共同促成生态系统的形成,促进高职教育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

一是产教融合的乡村社会生态。在乡村社会,乡村产业和乡村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乡村社会和乡村生活的组成部分,产业和经济都是总体上服从地方社会的政治逻辑与乡村生活逻辑的。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影响乡村社会,但同时也受到乡村社会的影响,应该从理解乡村社会的逻辑与行动出发布局融入乡村的战略。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能否在乡村产业扎根,取决于融入乡村社会和融入农民生产生活的程度、乡村社会文化的基础以及乡村社会网络的支持。因此,要找到高职教育及产教融合通向乡村社会的衔接点,形成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的完整生态。

二是产教融合的乡村产业生态。产教融合需要在合适的乡村产业基础上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的基本目标在于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从而以此促进乡村发展与振兴。高职教育与乡村产业在产教融合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一种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不断探索推进区域、组织层面的产教融合问题,在区域企业经营发展与职业院校办学实践融入产教融合的理念。^[19]在乡村产业中,逐步培育适合产教融合在乡村企业“落地”并持续发展的模式,以此形成凸显产教融合特征与内容的乡村产业基础与产业生态。

三是产教融合的高职教育生态。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运转与发展,关键在于构建专业链与产业链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生态循环体。^[20]产教融合是形成良好的高职教育发展生态的重要基础,同时,良好的高职教育生态也是促进产教融合的条件。高职院校应不断探索机制创新,通过主动服务,寻求与乡村产业的合作契机,建立实质性的长期联系与互动机制,推动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和师资队伍建设适应产教融合的需求。

求,尤其应形成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发展取向,主动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布局 and 区域规划,从而形成以产教融合为基础的高职教育发展生态。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结构优化与支出绩效评价研究”(2019JJ40192)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翁伟斌)

本文系 2019 年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参考文献

- [1]吴承明. 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M]. 北京:三联书店,2001,52.
- [2]高帆.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提出逻辑与政策选择[J]. 南京社会科学, 2019, (2):9-18.
- [3]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EB/O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6/28/content_5404170.htm.
- [4]农业农村部. 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EB/OL].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7/02/content_5405229.htm, 2020-06-24.
- [5]农业部课题组. 中国特色乡村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及实现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 2017, (12):51-58.
- [6]发改委. 关于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Z]. http://www.gov.cn/xinwen/2019-10/10/content_5438011.htm, 2020-06-24.
- [7]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EB/O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12/19/content_5248564.htm.
- [8]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
- [9]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EB/O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6/28/content_5404170.htm.
- [10]欧阳河, 戴春桃. 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内涵、分类与特征初探[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9, (24):5-8.
- [11]国家统计局. 中小微企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系列报告之十二[EB/O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12/t20191218_1718313.html.
- [12]孙韶华. 发改委:分两批试点布局 50 个产教融合城市[EB/OL]. 经济参考报.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9/10/11/c1004-31393431.html>, 2020-06-24.
-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EB/O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910/W020191024567310336296.pdf>, 2020-8-11
- [14]朱启臻. 关于乡村产业兴旺问题的探讨[J]. 行政管理改革, 2018, (8):39-44.
- [15]高帆.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提出逻辑与政策选择[J]. 南京社会科学, 2019, (2):9-18.
- [16]阳锡叶. 路小路. 非遗为何在这所学校“活”了! [N]. 中国教育报, 2020-08-04(1).
- [17]付伟.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及其社会基础——以浙江省 L 市偏远乡村来料加工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6):71-90.
- [18]邱泽奇, 李澄一. 三秩归一与秩序分化——新产业触发乡村秩序变迁的逻辑[J]. 社会学评论, 2019, (2):3-15.
- [19]郝天聪, 石伟平. 从松散联结到实体嵌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困境及其突破[J]. 教育研究, 2019, (7):102-110.
- [20]李梦卿, 刘晶晶. 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的教育生态学意旨、机理与保障[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 (3):71-75.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ramework and Path

Tang Zhibin & Wang Chim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for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integrate into rural industry and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the tendency of “industrial progressivism”, “enterprises taking pride in the scale” and “regional urban center”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integr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o rural industry. Based on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guidance, precise docking and share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integrati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to rural industry, optimizes the human resource structure of rural industry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rural industry, and participat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order and rural governanc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o rural industry,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the governa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the county, promote effective convergence, improve the practical framework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o rural industry, and cultivate ecology to realize the whol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o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industr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市域产教联合体公共价值创造的逻辑与路径

唐智彬, 龚楚仪

(湖南师范大学 职业教育研究所,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建立市域产教联合体是我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探索, 它具有协同创新性、地方性、契约性、开放性与融通性等多重特征, 立足公共价值创造分析视角能帮助理解市域产教联合体超越“教育”或“产业”领域价值的组织本质。公共价值创造分析框架呈现了市域产教联合体增强职业教育经济社会适应性与人才培养组织支持水平、改善企业人力资源和技术技能结构以及提升企业形象等方面的公众价值基础, 并充分阐述了其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价值共识、强化社会凝聚力和提升公众福祉等方面的公共价值结构。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 应准确识别公共价值内涵, 定位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目标, 在制度完善过程中寻求价值公约数以及强化组织能力, 不断优化运行机制, 塑造协同文化, 构建价值共创格局, 从而实现市域产教联合体公共价值创造。

关键词: 市域产教联合体; 公共价值创造; 产教融合; 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13X(2024)04-0118-09

DOI: 10.13763/j.cnki.jhebnu.es.2024.04.015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革命性技术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维与生活方式, 也重塑了生产劳动和组织模式, 带来工作本质、技能内容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迁, 从而深刻改变现代教育发展的底层逻辑和现实情境。在这一背景下, 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方式亟待重新审视。市域产教联合体基于组织、产权、机制和模式等方面的实体运作, 通过资源共享、信息互通、责任共担和利益共赢, 以全新的思路突出了新发展背景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现实要求与未来方向, 具象了智能化社会职业教育发展有效模式, 探索了区域内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协同创新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形成了超越“教育”和“产业”领域的广泛社会意义。本文

立足公共价值创造视角, 从分析市域产教联合体实践特征出发, 理解市域产教联合体在实现高质量人才培养和助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 创造区域繁荣和公共福祉改进等公共价值, 从而寻求联合体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

一、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现实特征

(一)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多元协同创新性

市域产教联合体是包含了多元异质性行动主体的创新型职业教育实体机构, 体现了产教融合系统中构成要素的差异性与结构协同性。在园校互动、校校交流与合作、体系整合的过程中明确各方职责与权利, 通过完善治理结构实现协同创新。任何协同系统都包含三个基本要素: 协同意愿、共

收稿日期: 2024-03-27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职业教育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制度设计研究”(BJA230033)

作者简介: 唐智彬(1980-), 男, 湖南衡阳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龚楚仪(1999-), 女, 湖南长沙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同目标和信息沟通^{[1](P29)},在政府主导下,市域产教联合体集合了多元主体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共同意愿,通过金融、财政、税费、土地、信用以及就业和收入分配等激励政策,协调了微观主体形成共同的利益基础。针对关键问题,市域产教联合体在机构设计与运作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治理机制、人才培养以及服务产业发展等之间的协调,不仅关注特定产业领域,还综合考虑各主体需求,促成不同领域、不同责任方的利益耦合,以追求更广泛、更全面的发展目标,从而实现机构良性运作与社会功能的可持续发展。

(二)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地方性

地方性指的是职业院校在办学过程中服务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介入本地居民日常生活与工作,并在教育内容上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文件中明确了省域统筹、市域规划、产业园区为基础的基本定位,目前各地纷纷开展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实践所体现的“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基本方式,切中了职业教育的核心要义。“地方性是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可以通过不同时空维度下内生与外向的社会关系互动得以再生产”^[2],而地方性又表现出显著的系统性,具体体现为地理空间区位、经济社会、文化精神以及人们的生活实践等各个层面,它们是一个地方长期不断建构形成的具有社会文化底蕴的表征,因此,具有很重要的再生产能力^[3]。市域产教联合体一方面被地方性所塑造,从名称到功能定位都有显著的地理空间区位特征。另一方面又不断地“生产”地方性,在发展过程中通过自身办学行为参与建构地方性,影响地方政府决策、塑造地方民众的观念与选择以及优化属地企业的发展思路等,自身也成为地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契约性

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过程中,契约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体现在市域产教联合体是“作为一种共同利益的教育”的重要载体之一,集合了国家、社会、学校、企业、社区以及个人对于职业教育的共同期待,是各方在职业教育对国家、社会与个人所产生积极影响(共同利益)所达成的“默示协议”^{[4](P2)},这是一种理念型契约。其次体现在作为一个实体化运作的机构,市域产教

联合体建设指标和要求中都明确了实行“政府主导、校企主体、多元参与”的原则,成立了“多方参与的理事会”。因此,各个利益相关方在组织架构之下,形成了各自的分工、责任、权利与义务,这不仅需要各方明确相应关键性要素,更需要在一定契约之下形成对各方的约束与协调,形成产教融合制度的重要基础。正如罗尔斯所言:“‘契约’一词暗示着这种个人或团体的复数,暗示必须按照所有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原则来划分利益才算恰当。”^{[5](P14)}契约性是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基本特征,也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组织摆脱短期行为、探索可持续发展机制方面的关键所在。

(四)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开放性

首先,开放性主要体现在通过建立整合机制与分享机制实现联合体内部成员之间经验和知识、技术和资源的共享,这一特征促使多元化知识在不同机构和成员之间顺畅流动,弥补各独立主体的知识局限,打破能力短板,拓展教育领域的创新空间,促进政治资源、产业资源、教育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互补,为培养复合型人才和推动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可能性。其次,通过突破传统职业教育组织和机构的固定边界与传统任务限制,市域产教联合体逐步成为以任务为导向、目标明确、灵活多变的任务型组织^[6],且具备强外部开放性特征,吸纳、共享与创造各类优质资源,从而构建一种更具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产教融合实体。外部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市域产教联合体跨越社会组织界限,促进教育、知识、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跨界流动与共享,灵活调整组织结构和育人框架,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

(五)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融通性

首先,产教融合是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核心使命,产教双向赋能、双向融通是基本特征。从设计上,联合体以产业园为载体,通过提供实践平台和资源支持,实现教育与产业的紧密连接,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与社区融合。通过整体融入经济社会生态体系,培养经济社会发展和未来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创业发展。其次,普职融通是市域产教联合体探索的重点。通过明确联合体内中职、高职高专、本科学校合作分段培养或贯通培养,跨类型、跨层次、跨

学段的院校覆盖,探索我国普职融通实践方案。以市域内不同类型学校差异化定位与协调打破传统院校之间的壁垒,促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学生提供更加贴近实际需求的教学内容和实践机会,满足区域内不同群体的发展需求,探索区域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路径。最后,科教融汇是市域产教联合体发展的方向。市域产教联合体作为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共生系统,形成了产、学、研、创融通与互动的生态。基于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协作机制,科技、教育和产业等多方资源有机整合,逐步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技术改进、服务升级以及创业破局的有效衔接和积极互通,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推动产、科、教互融互通,实现以教促产、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将市域产教联合体打造成为助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及探索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实践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载体。

二、市域产教联合体公共价值的生成机理

“公共价值”这一概念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公共管理领域近年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7]。公共产品供给、公共权力运作、公共精神积淀、公共领域建构等公共行为的内部构建相当复杂^{[8](P10)},解决问题需要多元主体协调参与,但不同人群和利益相关者对公共事务的价值观存在差异,个别利益集团通过利用权力、资源或信息不对称来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导致决策过程滞后、难以达成共识和公共资源的不公平分配等问题。为了倡导各主体合作调和多样化的价值观,重新关注社会公平,公共部门应该更加关注外部情境变化,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并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创造出公众认可和认为有价值的成果,以期满足公民对政府的需求^[9]。在此基础上,公共价值创造概念提出者穆尔提供了一种全新战略管理的方法,即“战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模型,由三个关键要素组成:公共价值目标、组织能力和政治环境^{[10](P55-61)}。公共价值创造强调管理和政策制定的道德性,提出公共管理者不仅关注经济效益,还应关注公众福祉和整个社会的利益,

认为公共价值的来源在于公民共同意见和集体需求,公共组织在进行公共行为时需要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以达成一致意见,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进行权衡和优化^{[11](P73-81)}。

从定义上看,穆尔认为,“价值”(value)是个人期望和现实感知;公共价值就是公民所表达期望的集合,是“一种公众所获得的效用(utility)”,“正在被‘创造’的公共价值和应该被‘识别’或‘衡量’的公共价值实际上是公民对政府期望的集合”;也有研究者认为公共价值是“一种集体表达的、政治协调的公民偏好”,“公共价值的创造就是依赖于基于政治协商的、集体性的偏好表达”,“关于权利、义务和规范形成的共识”,并强调作为共识或者规范的公共价值往往是多元的^[12]。基于上述定义,我们可以从价值创造主体、设计功能以及实现过程三个方面来审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公共价值特征。

(一)从价值创造主体看,市域产教联合体契合公共价值创造的基本定位

依据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具体工作定位和评价标准,“政府主导”“纳入园区工作考核指标”“职业教育工作目标考核体系”,被政府纳入重要的工作和绩效考核内容,是政府向公众提供的重要服务。在强调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将政府及其代理人(如学校)需要完成的任务进行具体化。正如凯利等人所言,公共价值是“政府通过服务、法律法规和其他行动创造的价值”,通过公共价值管理,政府能够有效地调动各部门的合作和资源,确保公共利益最大化,同时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在推动公共价值创造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主导和监管作用,是公共价值创造的主体,确保公共价值目标能够得到有效实现。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运行与发展,确立了政府和公共管理者推动产教融合的主体地位,并提供组织、规划、实施、组织机构以及经费等方面的支持,省级统筹、市域规划、园区实施的联合体运作模式明确了各级政府部门责任,奠定了公共价值创造的现实基础,也进一步明晰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功能及价值定位。

(二)从设计功能和目标来看,市域产教联合体体现了公共价值创造的重点内容

“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是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功能定位设计,“面向系列核心主导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基本的服务方向,并在人才培养、服务产业发展、创新创业、促进职业现代化等方面形成了系统性集成功能,突出了市域产教联合体作为公共价值创造主体的核心能力。在公共部门中,公共价值创造的目标应该以满足公众的需求、促进社会福祉和整体发展,确保目标的公共性、可衡量性和可持续性,这些目标通常与社会福利改进、公众健康、环境保护等相关。作为一个教育性机构,市域产教联合体在面向公众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超越了单一的人才培养功能,指向了产业发展、社区服务、技术创新、创业服务、终身学习等一系列促进“公共性”改进和价值实现的内容。通过共同目标和共享价值将多元主体集合在一个综合性组织当中,在持续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基础上,市域产教联合体探索了“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的实践路径,也为技能型社会和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了创新思路,突出了公共价值目标整合与持续实现。

(三)从价值实现过程看,市域产教联合体需要良好协同环境与条件

公共价值的实现,需要参与公共价值创造的多元主体之间实现信息互通与知识共享,并建立高度信任和深度合作关系。即便是关于权利、义务和规范形成的共识主导的价值创造过程,也可能因为异质性主体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对公共价值的认识存在多元性和冲突性。公共部门在战略管理中需要考虑政府合作和政治环境的因素,与其他相关机构、私营部门以及公众利益相关者达成合作认同,共同实现公共价值的目标。政府组织需要适应和应对政策变化、政治力量和公众期望等因素,以保证公共价值的实现^[12]。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在很长时间未取得根本性突破的关键原因不在产教融合本身是否存在价值,而在于各个参与主体之间对产教融合的价值与功能认识存在偏差,同一组织目标在不同主体视域中的价值差异造成行动上的不一致和目标偏离。市域产教联合体通过在制度框架下创造良好的合作基础与协同条件,整合不同价值类型,帮助管理部门形成更理性更科学的组织决策,促成共同的价值取向、组织行为和能力结构。此外,公共

价值存在较强的情境性,这也就解释了产教融合在不同的地区、产业和院校中呈现差异性特征。

为什么要从公共价值创造视角来理解市域产教联合体?一言以蔽之,由于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形成和发展是对教育与社会问题和需求的集中回应,汇聚了政府、产业界和教育界等多方资源和力量,通过协同合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在公共领域内实现公众福利的转移与积累^[13]。公共价值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市域产教联合体活动只有超越了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组织目标和行为充分理解并满足公众的需求,促进社会整体对公共利益的共同追求,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价值创造。

三、市域产教联合体公共价值创造的分析框架与多维结构

(一)市域产教联合体公共价值创造的分析框架

基于约翰·贝宁顿(John Benington)在《从个人选择到公共价值》(*From Private Choice To Public Value?*)中所提出的公共价值分析框架,首先是“公众价值观”,其次“什么能为公共领域增加价值”^[14]。“公众价值观”代表着私人领域选择,源于私人的价值偏好和价值选择,即公民参与公共活动等方面所重视的内容,反映了个人对于自身利益和价值的关注与偏好。公众价值观对于社会稳定和秩序起着基础作用,通过塑造个体行为和具体决策,引导形成良好的个体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同时,公众价值观也是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规范形成的基础,对于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维护社会和谐具有基础性意义。尽管公众价值观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但个体在形成和选择自己的价值观时,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同一个社会中可能存在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个体在社会中的行为和决策也会因为个人的价值取向而有所不同,这是公共价值创造的重要基础。

“为公共领域增加了什么价值”这一维度,折射出公共领域的诉求,即公众关注在参与公共服务或活动后产生的结果,反映在个人利益基础上更广泛的公众利益。约翰·贝宁顿认为,公共领域可以被视为由价值观、场所、组织、规则、知识和其他文化资源组成的网络,这些资源由人们通过

日常承诺和行为共同拥有,并由政府和公共机构托管。公共领域为一个社会提供了某种归属感、意义、目的和连续性,使人们能够应对不确定的环境,为社会的繁荣而持续努力^[14],因此,为公共领域增长的价值或利益将惠及所有人,具有普遍性。“个人选择”的价值与“公共取向”的价值整合,共同构成了公共价值的基本内容和结构框架。

(二) 市域产教联合体公共价值创造的公众价值基础

从现有实践看,市域产教联合体采用了以高职院校为牵头单位,联系区域内相关本科院校、中高职院校的方式,通过产教融合行动发挥各类不同主体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以及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功能,推动区域内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协同创新。从教育部门视角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价值创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增强职业教育的经济社会适应性。市域产教联合体以产业园区为基础,与当地企业建立联系,融入当地产业发展,准确了解产业和行业发展动态,促进学校调整和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培养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在智能化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下,为了适应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和技能密集型产业结构变化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职业院校需要依托更有效的方式改进办学行为,提升适应性。

二是改进异质性组织协同创新能力。联合体依托的产业园区内产教资源相对聚集,且由于职业教育系统具有与产业系统临近性的基本类型特征^[15],产教联合体内部各类院校之间在资源上各有优势,因此,通过有效机制促进资源共享,学校能有机会利用产业园区企业与院校的人才、设备、材料、现场教学以及就业岗位等重要资源,实现不同组织之间知识与技术的流动与共享共创,促使异质性组织合作人才培养、技术技能积累与协同创新等成为可能。

三是改进人才培养的组织支持水平。依托产教联合体,产教双方开发面向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真实产业环境,利用相关生产要素和相关机制共同开展知识生产、技术共享与价值共创活动^[16],持续优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要素投入和资源支持力度。如,建设过程中学校通过联合体获得来自产业园区或者企业项目资助、设备捐赠和赞助等,

在组织层面获得更高水平的支持,集聚培养资源。

对于产业层面而言,市域产教联合体价值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有效改进企业人力资源与技术技能结构。校企双方广泛开展联合招生、联合培养、岗位成才的中国特色学徒制,为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人才资源。通过与学校建立联系,企业参与课程设计、实习计划和就业指导,帮助塑造员工的技能和素质,降低人才招聘成本和企业培训成本。联合体内的企业或院校在交流互动中,不断突破企业发展与创新边界,加快成果应用,改进技术技能积累水平。其次,在履行社会责任中提升企业社会形象。市域产教联合体可以看作是省级政府联合地区产业、企业、学校和科研机构搭建的组织网络^[17]。通过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企业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和实践机会,展示出社会责任感及对教育发展的支持。这不仅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在市场中赢得更多信任和支持,还有助于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可持续发展。再次,在持续影响中拓展企业发展的资源通道。各地都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面向企业推出了“财政+金融+土地+信用”的激励细化政策,创新产教融合和企业发展的保障途径。如山东省潍坊市先后出台13项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政策包”,为28户/次产教融合型企业抵免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1669万余元^[18],拓展企业发展空间。

(三)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公共领域价值结构

从内涵看,公共价值创造指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构成公共服务网络,在构建和维护网络的过程中实现多元主体共同认可的价值目标,可以划分为结果实现、信任与合法性、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这四个维度^[19]。基于这一视角分析发现,政府、企业、学校以及行业协会与研究机构分别承担不同角色,在公共价值创造过程中功能各有重点,共同创造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公共领域价值结构。因此,由地方政府牵头建设的市域产教联合体更关注整体、长期的积极社会效应,强调以社会契约精神促进实现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其公共领域的价值创造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教育是社会公平的基石,良好的教育机会可以帮助个体

充分发展潜能,打破社会阶层障碍,实现社会公平。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不均是教育空间正义缺乏的最重要表征,带来了社会不公问题,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突破点所在^[20]。市域产教联合体通过促进区域内教育资源合理分布与均衡配置,缩小我国不同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和产教融合水平差异,并依托多类型学校网络与企业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避免资源分配失衡,集中体现了构建新的教育社会契约中提出“坚定地根植于对人权的承诺”^[21],确保所有人终身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二是促进价值共识,提升社会凝聚力。在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等多方主体协同的命运共同体基础上,各方集体制定发展规划,明确联合体的发展目标,促进跨界交流与合作。这种协同合作强化了不同利益攸关方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减少分歧和冲突,达成了共同利益和价值共识。在“社会新契约”框架下,人类高层次的发展不仅要学习处理复杂环境、应对科技日新月异的能力,更要拥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自我、共同繁荣的格局。产教融合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市域产教联合体被赋予了超越个人、企业或者学校的价值和功能,具备了面向社会和国家的普遍意义。这意味着地方、国家在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治理模式上应该增强参与性,“在政策和决策过程中,需要整合不同的声音和观点”^{[4](P12)},通过社会群体内部的互动和合作,加强人才培养和知识交流。多部门共同参与机制向外界传达了发展职业教育价值共识,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各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和多方参与的理事会,为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运作提供了有力支持,昭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心。教育、发展与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政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联合体建设,构成了教育、科技、产业和各项资源的协同发展网络,向外界明确传递有关职业教育发展和产教融合的积极信息,契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方向。通过强化各方在教育发展和产业治理中的参与性,促进产教联合体各主体的互动和合作,加强人才培养协作和知识流动,促进共享,激活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为社会群体成员提供更多机会和福利的同时,增强社会成员

之间的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提升社会凝聚力,从而为社会发展、稳定与繁荣的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保障产教融合的可持续性,实现公众福祉的转移与积累^[22]。政府在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支持举措,以确保市域联合体长期有效发展,并实现公众福利的转移与积累。实施产教融合所形成的公众福利转移主要通过经济福利体现。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技术技能创新和积极创业所带来的成就,将通过多种方式转化为公众福利。这些都直接与公众福祉密切相关,有效提升了公众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从总体上满足公众的心理和物质需求。公众福利的积累则主要依靠制度福利来实现,突出表现为在长期持续推动的政策落实下,市域产教联合体为公众提供基本生活需求之外的更高层次的发展需求保障。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不断提升市域产业发展水平和教育质量,有效改进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从而奠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公众福利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市域产教联合体是政府作为发起主体,面向全体公民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目的是通过产教融合促进公共利益,且必须服务于所有人的公共利益,进而实现公共价值创造。“政府主导”为公众福利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提高了市域内公众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从而创造休戚与共且相互依存的未来。

四、市域产教联合体公共价值创造的现实路径

(一)准确识别公共价值内涵,定位产教联合体组织目标

价值识别是公共价值创造的逻辑起点,决定了公共价值的产出水平和公共价值创造的整体绩效^[13]。因此,应重点关注产教融合的公共价值排序和优先级,理解各主体价值偏好,了解产教融合行为对象和行为主体的价值诉求,准确分析价值间的相近性及因果关系^[23],从而明确市域产教联合体中各主体在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的观点、期望和需求,促进共识,理解被各利益相关主体所达成共识认可的、对整个社会具有积极意义的具体公共价值内涵,确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目标。从宏观层面而言,公共价值在于提高公共福祉、促

进社会公平、改善民众境遇、加强社会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从微观角度来看,则落脚在促进产业发展、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推动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通过整合宏观与微观视角的公共价值,准确识别产教融合主体在不同情境中的行为价值取向,构建公共价值整体框架与具体细节,奠定公共价值创造基础,并以价值共识引领联合体的办学方向与组织目标。作为联合体成员的行动指南,组织目标引领各主体完成组织使命,在不同的发展情境下,组织目标随之变化,因此,既要关注市域产教联合体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又要立足公共价值创造形成相对稳定的长期组织目标,还要通过对总体目标进行分解和协调,明确指向公共价值创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目标、组织使命与阶段任务。

(二)完善制度设计,积极寻求价值公约数

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总体框架下,各参与主体依托共享目标的共建平台,既有合作也有博弈,在合理、合法和道德的制度框架下最大程度地达成共识,从而实现公共利益和共同价值^[24]。因此,制度在组织构建和运行管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维护组织秩序和促进公共利益的重要工具,通过建章立制,约束联合体成员。作为主导者的政府将依据相关法律、政策制定联合体管理机制,严格规范成员行为,以确保私人领域的个体利益与公共领域的整体利益相协调,促进各方利益均衡,形成共同价值取向。建立明确的管理制度、责任体系和约束机制,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成果进行监测、评价和督导,对产教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以制度引导和规范联合体成员行动。通过设定明确的规则和程序,有效地规范行动主体的权责,确保主体在一定的框架内行使权利。同时,制度也能够整合各方的利益,在博弈中促进共识的达成,确保公共利益与公共价值得到充分考虑和实现。良好的正式制度意味着健全的法律法规、规范有效的政府职能及有利的经济环境,三者共同组成了有利的政治环境^[25],为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运行提供了基本规范和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价值公约数,强调通过倾听各方的诉求和意见,在协商中寻求利益的平衡点,确保政策制定过程更加包容和全面,使产教融合政策更接近实际

情况与理想状态。同时,明确价值公约数也增加了政策可行性和可持续性,走出以往产教融合政策碎片化、行为短期化的困局,保证长期投入和持续关注的效果,避免短视效应,从而寻求有效协作,创造更大公共价值。

在这些规范和框架中,一是涉及制度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规制性要求和对失责、渎职的惩戒性安排,建立合适的退出机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二是对政府权责的界定。地方政府部门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过程中应切实发挥“主导”作用,在政策供给、经费投入和部门协同等方面充分履行职能,以制度和政策明确政府的责任范围与职责范畴。三是在制度规制、政策引导和政府主导的过程中,逐步塑造有利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和市域产教联合体发展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环境。政府和其他相关部门针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与市域产教联合体需要,对地方发展环境进行管理和调控,以维护经济稳定发展,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三)强化组织能力,构建开放包容的价值共创格局

摩尔在论述公共价值时,强调了战略三角模型中的组织能力指向达成价值目标的重要功能,关注资源可得性和管理运作能力对于价值目标实现的重要性^[26]。为了实现公共价值创造,公共管理部门需要具备特定的组织能力和充足资源,以提供满足社会期望的服务。组织能力指的是市域产教联合体充分利用主体资源,制定并有效实施组织愿景、战略、使命和目标,形成组织与环境的良性互动,获得竞争优势,确保组织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潜能和素质^[27](P910)。在建设过程中,市域产教联合体需要进一步强化资源、机制和价值的协同能力,整合产业界、教育界、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源,构建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衔接机制是发挥组织能力的基础,利用联合体的平台优势,促进不同院校、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之间面向产业需求、技术创新和市场趋势等信息和知识流动与共享,提升整个区域创新能力和发展竞争力。依托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功能,打造开放性教育和文化环境,创造公众参与知识传递、共享和价值共创的机会。利用产教联合体各种开放学习平台和设施,通过面向社区、面向大众开展

讲座、研讨会等活动,与各个学科和行业领域的专家进行深入的交流和互动,为公众提供多元化知识交流和价值创造的机会,培养公众的终身学习意识和创新能力,促进公众对知识和文化的理解和参与,促进市域产教联合体真正融入社区、深入民众、服务社会,落实各类型教育协调发展与统筹三教协同创新,从而实现广泛意义上的公共价值创造。

(四) 塑造协同文化,奠定公共价值的微观基础

市域产教联合体中的成员具有较强异质性,其背景、利益和价值观各不相同,从协同的本质来说,主体差异越大,主体数量越多,协调越难。法律赋权和制度保障为市域产教联合体提供“合法性”,而稳定的外部环境也是运行与发展的关键,直接影响主体的积极回应与科学判断。其中,形成适应市域产教联合体创新与发展的协同文化是关键。因此,要通过塑造协同文化,发展规范性共识,推动主体之间形成开放、包容、协作与互助的“惯习”,从文化上影响主体行为,引导主体行为符合联合体发展和共同利益改进的需要。

具体而言,一是培育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信任。信任是协同文化的基础。虽然市域产教联合体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但产教融合组织获得强大生命力的基础在于多元主体在组织活动中形成的高水平信任。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信任程度、质量与可靠性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建立在切实科学有效的契约关系上,以确保政府、学校以及企业在契约之下形成合作行为的可预测性和

合理约束,降低随意性。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强化产教合作行为的正向结果,改进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目标实现水平和组织绩效,提高各主体参与联合体过程中的获得感,在信任中促进合作,强化协同水平。

二是要培育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协同自觉。市域产教联合体在运行过程中,应将成为区域经济社会中提供重要知识生产、创新传播与精神文化的标志性机构作为发展目标,积极走向社会、融入社会,回应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的不同层次需求,形成自身发展与区域协同的行动自觉。从根本上说,市域产教联合体立足于自身的基本职能,与社会的联系越紧密,协同意识越强,协同行为越频繁,与其他主体依存程度就越高,更有利于形成协同文化。

三是促进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协同创新走向日常化。从组织结构与功能看,市域产教联合体是协同创新的最佳载体。一方面,要推动基于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协同创新,为区域内教育协调发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奠定坚实基础,通过人力资源协同深度开发,促进教育协同创新。另一方面,产教协同创新是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核心任务,充分利用各个主体的异质性禀赋,在交叉融合中促进知识创新和技术升级,实现知识与技术的集成创造,通过政策协同、战略协同、资源协同和行动协同,以教育、科技与人才一体化促进市域产教联合体融入国家创新体系,积极担当时代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使命,创造富有韧性的公共价值。

参考文献:

- [1] 许国志.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 [2] 宣朝庆,王茹薪.地方性再生产的时空逻辑——基于北碚乡村建设的理论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8(6):81-92.
- [3] 王春光.地方性与县域现代化实践——基于对太仓与晋江持续近三十年的调查[J].社会学研究,2023,38(3):1-22+226.
- [4] UNESCO. 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 </i>[M]. Paris: UNESCO,2021.
- [5] [美]罗尔斯著.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6] 陈姜媛,安冬平.职业教育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任务型组织的理论分析框架[J].教育与职业,2024(1):37-43.
- [7] Hefetz A, Warner M. Privatization and its Reverse: Explaining the Dynamics of the Government Contracting Process[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4, 14(2): 171-190.
- [8] 陈 驰. 浙商公共行为的公共治理机制分析[A].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浙商研究 2010[C].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
- [9] 何艳玲.“公共价值管理”:一个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J].政治学研究,2009(6):62-68.
- [10] Moore M. Creating Public Value: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1] Bozeman B. Public Values and Public Interest: Counter-balan-

- cing Economic Individualism [M].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2] 王学军,张弘.公共价值的研究路径与前沿问题[J].公共管理学报,2013,10(2):126-136+144.
- [13] 王学军,韩志青.从测量到治理:构建公共价值创造的整合分析模型[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18(6):38-49.
- [14] Benington J. From Private Choice to Public Value[J].Public Value: Theory and Practice, 2011(121):31-51.
- [15] 崔发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基本功能、制度设计与推进策略[J].职业技术教育,2023,44(28):6-12.
- [16] 韩连权,徐高明.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内涵、价值与行动方略[J].江苏高教,2023(10):47-52.
- [17] 冉云芳,周芷莹,徐灵波.组织间网络理论视角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内涵与形成机制[J].职业技术教育,2023,44(25):20-27.
- [18] 王金诺,冯秀红.先行先试,全面提升产教融合质效——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潍坊实践”[N].中国教育报,2023-09-26.
- [19] 王学军,陈友情.数字政府的公共价值创造:路径与研究进展[J].公共管理评论,2022,4(3):5-23.
- [20] 张兴.以教育空间正义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43(25):16-21.
- [21] 岳伟,王欣玉,杨雁茹.革新教育:建立一个和平、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报告述评[J].现代大学教育,2022,38(6):1-11.
- [22] 刘太刚.福利的本质与公共福利的多元循义供给——兼论需求溢出理论的福利观及永续福利国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0(2):78-85.
- [23] 陈振明,魏景容.公共价值的“研究纲领”:途径、方法与应用[J].公共行政评论,2022(6):63-77.
- [24] 李志强.网络化治理:意涵、回应性与公共价值建构[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5(6):70-77.
- [25] 池建宇,王舒亭.信任、东道国政治环境与中国对外贸易出口[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22(2):25-34.
- [26] Moore M H. Managing for Value: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in for Profit, Nonprofit, and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00, 29(1):183-204.
- [27] 马庆珏.社会组织能力建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Public Value Creation of City-Leve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a: Logic and Approaches

TANG Zhibin, GONG Chuyi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City-leve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a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effort in developing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These consortia are characterized b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local focus,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openness, and flexibility. Analyzing these consort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value creation reveals their organizational essence beyond mere educational or industrial contributions. This paper employs a public value creation framework to elucidate the foundational public values of city-leve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a. These values include enhanc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and skills of enterprise human resources, and boosting corporate image. Additionally, the paper identifies the public value structure in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stering social value consensus, strengthening social cohesion, and enhancing public welfare.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city-leve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a, it is essential to accurately define public value, align organizational goals, seek common value denominators, and strengthen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through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Furthermore, optimizing operational mechanisms, fostering value co-creation, and cultivating a collaborative culture are crucial for realizing public value creation in city-leve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a.

Keywords: city-leve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a; public value creatio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 姜惠莉]

资本与能力双重缺失条件下贫困地区农村职教的发展 ——以H省某农村职业学校为例

唐智彬

(湖南师范大学 职业教育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以H省贫困地区某农村职业学校的发展过程为个案,基于当前反贫困国家战略下强化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策略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资本与能力双重缺失”现实状况,分析农村职业学校发展的路径选择。学校在“嵌入发展”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建设与通过“对口帮扶”实现社会资源汲取的双重作用下,不断积聚自身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本,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政策环境中,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存在异质性资源汲取渠道与方式,学校要通过对关键资源的精准识别,立足于自身能力建设,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资本与能力双重缺失;嵌入发展;对口帮扶;农村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870(2017)01-0059-07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一直都是人类发展与进步过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反贫困是各国政府长期以来的任务与使命,教育扶贫,尤其是通过职业教育实现扶贫目标,被认为是为贫困地区“造血”的重要途径,其功能与意义被高度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多个文件强调了职业教育在改变贫困与剥削等社会问题上的重大作用,是人权保障的重要前提,^[1]多数国家也将发展职业教育看作一种旨在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消除阶级分化与贫富不均的重要国家政策和社会干预手段。^[2]因此,发展农村地区职业教育,加强职业教育机构建设,是“教育扶贫”的基础性工作。贫困地区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本身就是“开发式扶贫”的工作内容,广大处于贫困地区的农村职业学校,自身办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以及区域贡献度低以及政府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等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其反贫困功能的实现。基于上述认知,我们将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条件总结为“资

本与能力双重缺失”。

本文以我国中部H省西部贫困地区的一所农村职业学校在精准扶贫战略下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案例,讨论在资本与能力双重缺失条件下农村职业学校通过嵌入性定向发展与汲取外部资源的方式与途径,即学校通过“内挖潜力、外部借力”的方式,整合各类资源,实现自身发展。那么,农村职业学校这一发展路径具有什么样的核心特征,在发展过程中采取了哪些重要行动与关键性策略?“对口帮扶”模式下农村职业学校资源积累方式有何特征?这些发展方式对于其他学校的发展有何启示与借鉴意义?

本文使用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主要关注农村职业学校作为组织的社会资本获得途径。社会资本概念最初由皮埃尔·布迪厄于1980年提出,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主要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个人的网络规模的大小和网络成员靠自己权力所占据资源的多少决定个人社会

收稿日期:2016-08-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教育学)“城市化进程中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与发展对策研究”(CJA110157)、湖南省哲社规划一般项目“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校地协同模式研究(16YBA26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唐智彬,男,湖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和职业教育政策。

资本的多少。社会资本越多的人,更容易获得各种利益,也就是韦伯所谓的将“纯粹的实质权力关系网络转变为各种应得权利的和谐秩序”。布迪厄之后,社会资本被不断的扩展与重新阐发,一些新的概念如“社会网络”、“关系强度”、“社会资源”和“嵌入性”被不断引入,科尔曼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的角度发展了社会资本的研究,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结构内部那些能给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的要素组成。^[9]基于此,罗伯特·D·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性,如信任、规范与网络,这些都能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边燕杰等人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汲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对于个人而言,稀缺资源主要包括权力、地位、财富、资金、学识、机会、信息等等。^[10]作为嵌入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重要资源,社会资本是对组织社会关系的投资,对于组织而言,社会资本决定组织的发展水平与行动能力。通过动员组织社会资本,行动者的组织行动目标将更容易实现。与人力资本不同的是,它可以通过其他行动者获得资源。因此,组织社会资本可以理解为,组织与组织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网络,体现为组织的资源,并将影响和决定组织其他方面资源(如政策、经费等)的汲取能力。

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的发展是一种自我生长与外部环境改善的过程。发展是有代价的,是需要相应的资本为条件的。论文主要分析两种资本获取渠道:(1)农村职业学校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发展的经济社会嵌入性机制,亦即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通过发展一种嵌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提高定向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和区域贡献水平,以期获得政府、企业以及当地民众的肯定与支持,提升自己在当地社会网络中的地位,积累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2)对口帮扶模式下农村职业学校社会资本外部汲取方式,指学校在对口帮扶项目中,通过与其他学校与部门的合作,获取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两种社会资本积累方式相互补充,相互转化,共同作用于农村职业学校的发展过程。

文章基于以下逻辑与认识展开:通过职业教育开展人力资本投资是反贫困战略的重要部分。一方面,农村职业学校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是其积累社会资本、提升自身在社会网络中地位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础;另一方面,来自外部的资源也

将影响职业学校的发展。在当前的政策契机下,通过对口帮扶机制,农村职业学校从外部汲取资源,并转化为发展条件。农村职业学校要善于将两类内外部两类资源进行整合,实现资本与能力双重缺失条件下的发展。

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逻辑:基于社会资本积聚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发展过程

贫困地区实现脱贫,进入可持续发展循环离不开政府政策、经费的倾斜,也需要发达地区的帮扶,更需要内部因素的积累与推动。在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新阶段,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贫困地区还是发达地区,最关键的内部发展因素是劳动力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因此,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如何有效地激活农村地区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通过劳动替代资本,是发挥当地优势,实现经济增长,尽快实现脱贫的关键。承担农村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主要是当地农村职业学校和乡镇农校等职业教育与服务机构。这些机构的发展水平、提供的职业培训服务质量,既影响职业教育扶贫的功能与效果,也影响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的声誉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后续资源的获得。

对于学校而言,社会资本是一种显在和潜在的资源集合,能够被学校所控制,有利于学校实现目标,并嵌入于学校网络结构中。学校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社会资本,有两个层次。一方面,学校社会资本可能作为一种中介和桥梁,是与其他行动者(如兄弟学校)的联系中获取竞争优势过程中的关键性资源;另一方面,学校的内在社会网络和规范可以融合学校组织内部的行动者,社会网络促进学校成员间合作团结的“粘合”作用也是实现组织目标的重要条件。因此,此处所分析的是组织层次的社会资本与网络资源,重点关注的是社会资本作为组织的信任、共鸣、合作以及互惠等等群体资产。

学校组织的特点决定了其具备内部和外部社会资本,外部社会资本是学校作为社会中组织而获得社会资本,内部社会资本则是围绕学校的集体特征,从组织角度发展能为学校组织利益作出贡献的个体内部网络。从这一意义看,职业学校社会资本体现为学校与所有关系网络和人际关系的总和,包括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其他兄弟学校、区域内其他学校、企业、行业、家长等。换言之,在现实中,学校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学校的核心资源,直接决定了学校的竞争优势和发展质量。

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系统结构位置,直接影响了其获取内嵌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少数占据了社会结构金字塔尖的行动者,将控制这最多的绝对和相对数量的有价值资源,并拥有结构中关于资源位置的最全面信息。^[9]就学校而言,不同地域、类型、层次、质量、声誉的学校,在整个教育系统结构中呈现出等级形式的差异分布。因此,贫困地区的农村职业学校处于教育系统结构的较低位置,难以平等地汲取社会资源。同时,由于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在系统结构中层次较低,因而在校际关系上也呈现浅层次、小范围和弱结构的特点,限制了学校组织和学校组织成员发展外部社会关系的范围和机会,外部社会资本的获得也较为困难,影响了学校作为行动者的表达性行动和工具性行动中获取外部社会资本的机会。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学校内部社会资本稀薄,表现为社会网络与关系松散,成员凝聚力下降、信任与合作减弱、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不畅等状况。因而从总体看,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缺乏真正有利于学校发展的社会资本,资源汲取能力较弱,导致发展陷入困境。

农村职业学校在区域经济社会领域的联系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纵向联系、横向联系与社会联系。纵向联系主要包括与当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地方政府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联系能直接影响和决定学校的资源获得水平。在我国当前发展环境下,学校与当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关系的处理会对学校在资源汲取能力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部分地方政府为解决农村职业学校发展问题,同时也为解决部分基层官员的级别问题,由县教育局局长或者副局长同时兼任县职业中专学校的校长或者书记。这一人事配备方案在部分地区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一是作为地方教育局长的县职业中专校长与县政府之间“政策议价”能力和资源获得能力是一个单纯的县职业中专校长所不能比的。二是“位置决定脑袋”,作为地方教育局长的县职业中专校长的资源动员能力与资源分配能力也比一般的校长要强得多。如某县长期以来“普职分流基本相当”的政策无法落实,兼任教育局长的职业中学校长上任以后,这一问题在当年就得到了妥善解决。因此不难看出,学校的纵向联系是典型的社会资本。

横向联系指学校与兄弟学校之间发生的联系。对于农村职业学校而言,横向联系的对象主要是区域内其

他职业学校、所对接的合作学校等等。横向联系会直接影响学校的信息获得水平,影响学校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我们所观察的省示范性高职与贫困地区农村中职“对口帮扶”的行动中所产生的就是典型的横向联系。

社会联系则主要指职业学校与企业、行业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与企业的紧密联系与合作是职业学校的典型特征,学校通过企业提供的合作机会为学生的实习实训以及就业开拓渠道。此外,与其他社会团体的联系也能影响学校的资源获得。如职业学校获得非营利性机构的经费及设备捐助、行业协会的技术指导,都可以看作是职业学校的社会联系。这三类联系都会影响学校的社会资本获取水平。

三、“嵌入发展”与“对口帮扶”:H省TD职业中专发展的个案研究

(一)案例背景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贫困地区农村中等职业学校的发展路径选择,观察案例为H省TD职业中专学校,探索该校在新的扶贫行动总体框架下通过“嵌入发展”与“结对帮扶”实现自我发展的过程。H省为我国中部省份,人均GDP排名全国第22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国家的“精准扶贫”总体政策框架之下,H省教育部门出台了相应的精准扶贫扶贫实施方案计划和措施,其中就包括职业教育扶贫的相关方案。

根据H省扶贫总体安排与部署,H省教育厅制定了《H省教育厅教育精准扶贫试点方案》、《H省教育厅教育精准扶贫工作规程》、《H省教育扶贫规划(2015-2020年)》系列文件,创新了职业教育扶贫的思路,形成了“对口帮扶”的发展思路。通过遴选11所基础条件好、办学水平高、师资队伍强的省级示范性职业院校,对口帮扶H省G市的11所农村薄弱中等职业学校,期限为3年,形成了职业教育扶贫的新格局。对口帮扶对象的确定主要是根据“专业对口、产业对接”原则,高职院校专业与帮扶对象相对接,同时服务对口帮扶县的相关产业,形成全方位的系统扶贫方案,构建起职业教育扶贫的“校县合作”模式(“校”是指高职院校,“县”是指对口扶持县及其农村职业学校)。

TD县职业中专成立于2004年5月,为该县一所集职业教育和相关培训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办职业中专。TD县位于湘、桂、黔三省(区)交界处,为武陵山连片特困区所覆盖县。该县少数民族人口占88.1%,是革命老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国家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县。“生态立县、旅游兴县、产业强

县”为该县发展战略定位,2015年,该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常住人口计算为16106元(H省为43114.65元,全国为49351元),是一个典型的国家级贫困县。

背靠这一发展条件,TD县职业中专的发展举步维艰。2011年,学校在校生仅为192人,^[8]生存尚且困难,更不用说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但是,经过几年的发展,到2015年该校在校生达574人,办学影响扩大,总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一是办学基础能力得到跨越式发展。2016该校整体搬迁新校区,新建了办公楼、教学楼、实训中心、学生中心等,办学条件极大改善。二是获得经费大幅增加。2016年该县将办好示范性公办中职学校作为攻坚计划的首要任务,提出“高标准建设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统筹安排专项资金近1.1亿元,每年同时落实了政策性经费200多万元用于支持学校发展。三是学校在区域内的影响扩大,学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才培养、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等诸多方面的活动形成了广泛的影响,2015年该校承担了5000余人次农村劳动力培训,促进新增城镇就业1500余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600余人。此外,学校与对口学校的扶持合作项目也成为对接帮扶的职业教育扶贫成功典范被广泛宣传。在2016年5月该县举办的首届职业教育活动周上,县委书记参加宣传周启动活动,分管教育的副县长致辞并作了该县职业教育发展规划报告,多家企业与合作学校参与,并举行了多家省级主流媒体参与的新闻发布会,介绍发展成果。观察TD职中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节点值得关注:(1)学校确定以服务地方的发展战略赢得了当地政府的关注,并将政府的关注转化为发展所需的资源;(2)学校通过对口高职院校的全方位大力帮扶,有效地提升了学校基础能力,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得到了增强。因此,深入观察该校的发展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有较强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二)“嵌入”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建设与农村职校社会资本生产

社会资本的多寡是与自身的能力或者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注点密切联系的。对于农村职业学校而言,H省时任分管教育的副省长的一番讲话最能体现农村职业学校在社会资本积累方面“力不从心”的困境:“我到一些县市调研,有的县市长对于当地普通教育发展讲得头头是道,对县一中考了多少清华、北大和一本学生如数家珍,但对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却知之甚少;职业院校生均经费已有明确标准,部分主办单位和地方财政没有按要求落实;一些地方对招商引资不遗余力,但对

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的职业教育却没有上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是地方政府不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还不如说是职业学校自身并未很好地履行其职责。之所以当地政府重视重点高中,是因为这是符合当下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和当地民众的期待与利益。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说,在社会网络中,农村职业学校对其他行动者的影响很弱,摄取资源与产生影响的渠道和能力都受到极大的限制。从现实因素来看,是因为农村职业学校没有发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职能,对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力太小。

社会资本是通过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并存在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9]作为区域经济社会活动中行动主体之一,学校是独立的社会行动者,但并不是孤立的行动个体,学校运行是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中进行的。因此,学校的办学行为是与区域经济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学校网络上的纽带。学校的社会资本就是通过这些联系而摄取稀缺资源的一种能力。

“嵌入”是新经济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讨论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网络这一特征,进而说明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密切关系,因此,嵌入是指经济活动在持续的社会关系模式中的情景。^[10]对于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来说,如若能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一种“嵌入性”关系,将自己的发展战略与发展行动嵌入所在地方的发展全局之中,形成与区域发展直接互动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双赢的格局。与分析任何政策制度或者经济行动一样,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研究也应该重视行动的关联性特征,分析其行动的嵌入特点。在明确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行动定位的基础上,厘清这一行动是如何嵌入在更大的网络关系中的。在TD职中具体的行动策略上,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充分认识到自身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之间互动与契合的重要性。从该校多份公开报道和正式讲话中,“依托产业办专业、办好专业兴产业、兴旺产业促就业”的办学主旨被反复提及,并且根据地区特点提出“让每一位学生‘升学有门、就业有路、致富有方’”的办学目标,形成了校际合作、校企合作,拓宽订单式培养、定向就业渠道的办学方式,都较好地符合了学校的发展基础。

二是选择了契合区域产业发展特点的专业布局与结构,并大力发展技能培训服务。按照地区“文化强县、旅游兴县”的发展战略,该校通过同步规划学校人

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建立了专业随区域产业发展动态调整机制,专业链与产业链的融合更紧密。因此,在专业设置上,该校基于学校基础,从适应区域需求的角度,选择发展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SMT)、旅游服务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制作、工艺美术、果树花卉生产技术等紧密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并将增设种养殖技术、中草药栽培技术、食品加工技术等专业,由此能非常清晰地看出每个专业对接产业(如旅游、工艺美术及中草药栽培技术)或者对应区域发展需求(如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基本思路。

三是采取了兼顾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学校发展战略,发展行动嵌入在更大的经济社会环境之中。TD县所属的地级市市委书记在该校视察时充分肯定其“以小财政办职业大教育”的职业技术总校新办学模式。这一官方表述基本理清了一个事实:该县由于财政实力薄弱,对职业教育的支持较为有限。因此,该校在经费投入方面并没有过度依赖当地政府,而是在政府投入的基础上,也努力从其他途径获取发展资源。如学校积极争取九三学社省委、省委统战部、省教育厅的支持,通过实施“一家一”项目带动学校招生、教学和就业工作;争取对口学校的支持,由对口学校出资建设了“侗族传统工艺保护与研发工作站”;也通过项目形式从企业获得资源。未单纯依赖政府经费投入或资源分配、而是通过积极争取多渠道社会资源的方式符合公共财政极度短缺地区发展教育事业的策略特征。

里纳(Leana)和伯恩(Buren)认为:“一个反映与组织内部社会联接的资源,通过组织成员的群体目的导向的程度以及分享的信任,并因此而带来成功的群体行动,进而创造价值。”^[9]通过上述简单分析看出,“嵌入”区域经济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建设主要体现在学校充分认识到“嵌入”的重要性,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使学校的发展行动有效地嵌入在经济社会环境之中,既准确地回应贫困地区的发展需求,也契合区域现实发展条件,改进了学校对区域发展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提高了学校的区域贡献度。“嵌入”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建设生产了TD职业中专的发展所急需的社会资本。因此,在县财政极度紧张条件下,该县投入过亿新建校区,改善办学条件;为专业教师引进开辟绿色通道,为学校公开选拔专业课教师调剂编制;将教师绩效工资纳入县财政全额保证的范畴;县政府组织专门中职招生会议,出台了《中职招生管理办法》,推动多部门参与招生以确保该校生源;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出席该校的开学典礼及职业教育宣传周活动,并由县

政府统筹,每年安排20余万元从农业、旅游等部门聘请兼职教师;设立特聘岗位,由3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每年定期来校开展专业技能指导和青年教师培训等等,无不说明该校在网络中的行动能力摆脱了过去的弱质性特征。随着社会资本的积聚,学校的资源获取能力大大加强,发展也逐步进入了良性发展轨道。显然,农村职业学校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与社会资本获得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在贫困地区,增强“嵌入”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是学校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前提,是提高学校在社会网络结构地位的主要途径;社会资本的积累,决定了农村职业学校获得发展资源的能力与质量。

(三)“对口帮扶”模式下的农村职校社会资本拓展外生

在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的联系中,“对口帮扶”是其横向联系中的一个非常特别的联系,这也是在国家扶贫的总体政策框架下出现的一种新型职业学校校际关系模式。H省教育厅在指定提供帮扶的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时,不仅考虑了TD县职业中专的专业结构特点与发展重点,同时综合考虑TD县的产业特征、民间文化艺术和侗族文化艺术的基础,由全国4所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之一的GM职业学院实施帮扶。该校办学力量较强,在工艺美术和现代艺术设计类专业方面特色鲜明。观察对口帮扶行动,可以发现TD县职业中专搭建了另一条社会资本汲取途径,并转化为自身的发展资源。

一是通过“对口帮扶”向外部学校汲取稀缺性资源,改善办学条件,改进了学校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TD县职业中专获得了来自GM职业学院的全方位“定制帮扶”,在二者所签订的《结对帮扶框架协议》中,GM职业学院为TD县职业中专提供了学校品牌使用、办学理念更新、特色专业群建设指导、专业课程与校本教材开发、教师培训、信息化建设与优质网络资源共享、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对口招生、项目申报等9个方面的帮扶内容,为期三年,涵盖了学校发展的各个方面。此外,GM职业学院对口帮扶TD县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是合作共建的“侗族传统工艺保护与研发工作站”。工作站由GM职业学院规划设计并出资1000万援建,承担了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产品展示展销、技术技能积累、技术技能数字化传承保护、县域形象推广以及大众创业的功能,成为当地特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引擎。作为TD县职中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重要基地,工作站的功能综合体特点将能有效提升该校在

县域经济社会的服务能力与影响。对口帮扶行动带来的资源和利益,如学校在招生、就业、学生培养、教师队伍建设和经费等,有力地强化了学校基础能力建设,改进了人才培养水平。

二是“对口帮扶”促进双方长期合作,增进信任,形成互惠关系。信任与互惠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从过去一年双方所发布的各类信息看,帮扶工作持续进行,成为双方的常规工作内容,交流动作频繁,进展明显,合作成果丰富。TD县职业中专通过主动、深入地帮扶学校进行沟通与联系,使其成为自身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转化为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从这一角度看,农村职业学校既通过转化和吸收外部资本与资源,积聚学校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同时,在帮扶的过程中,通过进入帮扶主体的内外部社会关系网络,拓展自身的社会资本获取渠道。

三是“对口帮扶”行动扩展了双方社会网络,促进双方社会资本积累,提升影响力。两校的合作由“校校对接”发展为“校县合作”,即GM职业学院与TD县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对口帮扶行动升格为高职院校与县委县政府层面的行为,县主要领导高度关心对口帮扶行动并多次参与相关活动。此外,由于对口帮扶行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该“结对子”得到了H省教育厅的关注与肯定,分管职业教育副厅长认为这一对口帮扶试点“探索了创造具有示范性、可复制的工作经验和模式”。得到上级部门的关注对于TD县职中与GM职业学院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也是提升学校在社会网络中地位的重要方式,并能有效地转化为学校发展所需的各种关键资源。

四、讨论与结论

社会资本的生产性特征将使学校获得发展所需要的重要资源,这也是我们强调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分析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发展路径选择的重要原因,因而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社会资本获得的行动过程与特点具有普遍性意义。从TD职中的实践看,首先,“嵌入”经济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建设为学校在区域社会中获得较高的系统结构位置,从而为学校获取与分享各类社会资源,积聚社会资本创造条件。这既是学校获得外部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如政府的关注与支持,也是重要的组织内部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内部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组织内部行动主体的信任、规范以及合作,学校办学质量提高、地位提升等能有力地提升学校内部人员尊严感和幸福感,由此激发工作

积极性和事业热情,这是学校发展的关键性资源,是学校在能力建设过程中所积累的重要的社会资本。

其次,对口帮扶则是通过外部资源获取的方式,通过精准扶贫这一特定的政策契机与特困地区的弱势身份,利用“帮扶”所结成的特殊网络关系与行动模式,将相关资源转化为自我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与社会资本。不难看出的是,同样是对口帮扶,不同的行动者、不同的社会位置,在资源汲取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最后,学校社会资本的汲取随着外部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对口帮扶”在某一时期可能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汲取渠道,但是随着政策条件的变化,这一方式可能就不再奏效。但是学校自身能力建设是学校社会网络位置和社会资本汲取的基础,这一点在任何学校、任何地区、任何时期都是相同的。

此外,通过分析发现,农村职业学校应善于汲取关键资源,提高社会资本的契合度。判断一项资源的重要程度,主要从学校对这类资源的需要程度、资源的稀缺程度、资源的可利用程度、资源投入与产出的效率等方面进行识别。要通过提高学校关键资源的识别能力,精准定位不同时期和阶段对学校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资源。因此,学校发展过程中要厘清关键利益相关者(如当地政府、家长与学生以及企业等),他们的利益诉求通过何种方式得以表达。在学校发展的关键期,需要调整自己对关键资源的定位,密切关注影响学校发展速度与前景的资源,提高社会资本与学校发展的契合度。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政策条件下,农村职业学校的发展面临着不同的资源获取渠道和社会资本积聚途径。学校所依赖的关键资源随外部发展环境变化而变化,因此,学校要积极关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资源的动态变化,根据情况调整对关键资源的认知与依赖。如改变经费需求的“等、靠、要”,如对国家的有关政策保持敏感等。学校发展过程中,既拓展关键资源获取渠道,提高社会资本的依赖性,同时保持与其他边缘性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因为对于学校发展而言,关键资源来源可能在特殊的政策条件下发生变化,边缘性利益相关者也有可能成为关键利益相关者。

参 考 文 献

- [1] 课题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观点[J]. 教育发展研究, 2009, (23): 8-9.
- [2] 黄斌, 高蒙蒙, 查晨婷. 中国农村地区教育收益与收入差

异[J].中国农村经济,2014,(11):28-38.

[3] 詹姆斯·S.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M]. 邓方,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79.

[4] 边燕杰,丘海雄. 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 中国社会科学,2000,(2):87-100.

[5] 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3-35.

[6] 通道县 201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huaihua.gov.cn/zwgk/fzfxgkml/tjsj/tjgb/54788.htm>.

[7] Lin , Nan.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J]. Connections, 1999,22(1): 28-51.

[8]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481-510.

[9] Leana, C. R. and H. J. Van Buren III, 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 and Employment Practic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9,24(3):538-55.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Poverty-stricken Area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ouble Loss of Capital and Capability: Taking an Example of a Rural Vocational School from H Province

Zhibin Tang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410081*)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case of a rural vocational school in poor rural area, based on the basic strategy of the strengthen of national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poverty-stricken area and the reality of the double loss of capital and capability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under the current anti-poverty national strategy. The study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path choice of rural vocational school development. Under the dual function of embedded development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capacity building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social resources absorption through counterpart aid, the school continues to accumulate their own development needs of all types of capital, and enters into the st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different channels and ways of resource dipping under different econom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 and the school should choose appropriate ways through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key resources and self-capability building.

Key words: Capital and Capability Loss; Embedded Development; Counterpart Aid;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 叶庆娜

(上接第 80 页)

Rural Educ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Western China: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4 Poor Villages in Gansu Province

Jianping Liu, Weibing Liu

(*School of Busines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China, 730070*)

Abstract: By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14 poor villages in Gansu province and based on the semi-logarithmic model and the Logit model,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peasant labor force's education years and educational levels on their incomes and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poverty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asant labor force's education years have significantly impact on their incomes, when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labor force increased, the education rate of return increased as well; farmer labor force's education level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poverty reduction, which means farmer labor force's education level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poverty in rural households, especially f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including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where the reduction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above,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ing actual western rural poverty.

Key words: The Western Rural Area;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Empirical Analysis

责任编辑 叶庆娜

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的逻辑与机制

唐智彬¹,石伟平²

(1.湖南师范大学 职业教育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81;

2.华东师范大学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上海,200062)

摘要: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多部门、多主体的共同参与,产学研合作是基本要素。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培养技能型创新人才和转变企业技术创新模式要求构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机制。从开放科学视角看,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行动是基于主体创新能力异质性这一基本内在逻辑而展开的。基于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要围绕建立产学研多元主体共同愿景、校企微观主体共同利益基础和协同创新框架系统序参量,构建校企多元主体协同、价值整合、利益整合、资源整合以及协同实施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

中图分类号: 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870(2015)04-0003-05

一、产教协同创新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与产业进步的现实选择

囿于成本控制考虑,在企业战略能力和竞争优势仍然主要体现为成本控制和营销网络构建的时候,企业缺乏对校企合作进行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现实需求,^[1]这是长期以来制约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尤其是在工业4.0方兴未艾的背景下,一方面,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能完成指定工作任务的技能型人才,更需要在具备基本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基础上的创新型人才,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并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世界。显然,这种人才的培养学校和企业单独都无法完成,而是要依赖职业院校、企业两个基本主体投入各自优势资源和能力,在政府、行业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的支持下,共同开展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活动。另一方面,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形势下,企业单一主体的技术创新已

经不是最佳模式。作为来自不同性质的部门,在技术创新问题上,高等职业院校和企业拥有各自的优势。利用职业院校的智力支持优势和技能人才优势,针对企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引导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服务,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因而,高等职业教育与企业协同推进技术创新将成为未来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模式。通过建立一批企业与职业院校紧密合作的技术技能积累创新平台,职业院校逐步进入企业创新体系;通过强化产教协同创新,在技术发展进步的同时,实现劳动力素质的同步提升,将有效改进技术创新模式,提升全民族的技术创新能力。

职业教育本质上就与产业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进步以及职业教育变迁,二者之间的关系也逐步由简单的职业教育为产业提供人才、产业参与人才培养为主要形式的校企合作发展为产教深度融合、互动合作的协同创新,并成为现代职

收稿日期:2015-02-08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研究”(项目编号:10JZD0040)和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唐智彬,湖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讲师、博士,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研究人员;石伟平,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业教育与产业合作的主流形式。但是,现代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如何超越传统校企合作中所存在的意愿、价值共享、利益分配、可持续发展机制等方面的障碍,扬弃传统校企合作的依赖关系,形成基于校企协同的基本模式,实现上述提高创新型技能人才培养水平与产业发展创新服务能力为核心内容的发展目标,成为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和各地探索与实践的关注重点。

二、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的内在逻辑

哈耶克认为,在市场和社会活动中,每个人的知识都是分散和分立的,每个市场参与者可能都“掌握着可能极具助益且独一无二的信息”。因此,只有当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是由每个人做出的或者是经由他的积极合作而做出的时候,这种信息才能得以运用。^[2]经济中存在一个与劳动分工相类似的基本知识分工问题,生产者知识结构的专业化需要知识空间的互补,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知识生产者之间的依存程度。从这一角度看,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属于异质性的知识共同体,各方在各自边界内遵循特定的规则,产学研的合作是经济系统运行的基础。大学与产业的合作是社会契约和制度选择的必然结果。^[3]基于这一特征,产学研协同创新被视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创新模式,知识与技术在企业、高校以及研究机构这样的异质性组织之间实现流动,进而改变以往单向的、被动的流动方式。^[4]正是基于异质性创新主体之间合作的这一内在逻辑,高校、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才有协同创新的原动力,才可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与创新机制。

从异质性创新主体这一角度看,在区域经济社会和创新体系中,现代产业部门和高等职业教育部门属于完全不同性质的组织,从事不同的社会分工,异质性生产能力决定了各自在区域经济社会体系中的不同功能。职业院校作为教育部门,其主要职能是进行技能人才的培养,没有具体的商业目标和营利目的。此外,职业院校也进行技术开发工作,虽然技术开发会附生经济利益,但更多地指向社会公共福利的增进。产业部门则是区域经济体系的直接支持力量,其存在的逻辑起点就是盈利,创造经济利益,有明确的商业目标。产业部门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如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等。产业部门雇佣高等职业教育部门所培养的技能人才,并创造价值,在人力资本成为企业发展

的核心的今天,技能人才的质量成为影响企业获得经济利益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因此,企业也应承担与使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成果相应的社会责任,投入资源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技能创新型人才培养工作。

与传统技术创新路径迥异的是,当今的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和技术人才、技能人才培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要求产业部门与高等职业教育部门形成长期、频繁的互动,以满足其智力支持需求。正如相关技术的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和企业技术专家个人经验转换为课程内容与专业教学标准的过程,是一种典型不同知识体系下知识内容的信息交换与沟通,职业教育专业学科知识与职业院校专家个人知识参与到产业与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也将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与企业专家不同的思路与解决路径,从而影响技能改进与技术创新进程。高等职业教育部门和产业部门这两类异质性组织按照一定的社会分工模式和生产能力分工参与到区域的发展中,从而促使高职院校和企业之间协同创新成为职业教育部门与产业部门合作的重要发展趋势。

三、一个案例:湘绣设计与工艺专业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探索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是全国4所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之一,该校湘绣专业构建了“人才培养、技艺传承、文化研究、创新研发、传播推广”五位一体的非遗传承创新模式,通过搭建湘绣工艺开发与人才培养产教协同创新平台,引领湘绣产业发展,促进了专业建设,提升了学院发展水平。^①通过对该校湘绣专业的观察与研究,笔者分析并总结了高等职业院校探索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的方式与路径。

(一)基本情况

针对湘绣行业人才断层、技术老化、产业滞后、市场萎缩的状况,2006年,湖南省委、省政府作出“抢救保护和改造提升湘绣”的决策,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瞄准这一战略机遇,设置了湘绣设计与工艺专业,并开办湘绣艺术学院,下设湘绣设计研发中心、刘爱云(湘绣名家)大师工作室、弘云湘绣研究所等机构,联合省内多家湘绣研究机构和湘绣企业,搭建了一批产教协同创新平台,并取得实际成效:一是该专业湘绣产品与工艺传承、研发、设计、制作等均达到业界一流水平;二是人才培养方面,该院基于湘绣专业办学与人才培养探索

①湖南工艺美院.学院简介[EB/OL].<http://www.hnmeida.com.cn/xygk/xyjj.html>,2015-3-19。

获得2014年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三是湘绣专业成为湖南省职业教育示范性特色专业,影响力扩大。目前,湘绣“最先进的技术、最精致的工艺在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已成业内共识,同时,企业评价“人才培养达到传统模式培养的绣女十年都难达到的水平”,初步形成了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培养技能型创新人才,引领产业、提升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格局。

(二)校企协同开发培养标准,探索产教协同培养机制

传统湘绣人才成长慢、技艺传承效率低。湘绣艺术学院通过与工艺大师以及企业、行业专家共同研究分析,制定融传统的“师徒制”与现代职业教育为一体协同培养机制。通过设立人才培养产教协同培养中心,开发技能创新型湘绣人才的培养目标到培养模式,构建湘绣高端技能型人才产教协同培养体系与培养标准。

为解决传统“师徒制”湘绣人才培养模式缺乏统一标准、培养周期长、过程与质量缺乏标准的难题,产教协同培养中心专家共同开发基于现代职业教育理念的湘绣人才培养方案与专业教学标准,将人才培养标准衔接湘绣行业标准及岗位职责,并转化为《湘绣技法》、《绣品制作》等系列技能类核心课程;结合教育专家意见和艺术类人才培养特点,合作开发《湘绣艺术鉴赏》、《艺术史》等课程,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与创新素质。实现途径上,合作企业将市场项目引入学校专业工作室,按照产品的低端、中端、高端分类,培养全过程“教学与生产合一,作品与产品合一,学生与员工合一,教师与企业专家合一”,形成了湘绣人才培养标准体系。传统的工艺、技法融入教育教学,教育教学需求又不断地倒逼传承机制和行业标准改革创新。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形成了有效互动与协同推进,形成了产学协同创新培养标准。从人才培养效果看,学生作品屡获国家大奖,作品的艺术性与创新性得到了业内的肯定。

(三)搭建产教协同技术传承与工艺创新平台,引领产业升级发展

为改变湘绣产品艺术形式与内容相对单一的状况,该院依托产品开发协同创新平台,面向社会设立湘绣创新研发基金,成立企业、行业和学校专家共同组成创新评价小组,每两年评选一次“湘绣创新研发突出贡献奖”。同时,依托产教协同创新平台,该院在产品创新上推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校企协同开发新产品,利用艺术专业人才优势,拓展产品题材和艺术形

式,将漆画、版画、壁画等艺术形式创造性融入产品中,推出富有现代审美情趣的“新湘绣”;开发名家名作系列精品,推出了齐白石名画系列等高端绣品及大尺幅湘绣作品。二是校企协同推动工艺创新,研发了米字针法、蚁字针法、绳股针法等,努力实现湘绣针法与原作风格的最佳结合。组织研究力量,校企协同探索采用新材料,研发了发绣、麻布绣等。三是校企协同扩大湘绣应用创新,研发了湘绣产品在服饰设计、工业设计结合开发产品等过程中的应用。在产品开发过程中,采用画家授权方式引入原创绣稿,对高端精品引进电子防伪技术等,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湘绣的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应用创新均是在专业与产业的协同开发、共同推进中完成的,不但实现了技术传承与艺术创新,也取得了较大的商业成功,湘绣的市场困境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四)案例讨论

湘绣设计与工艺专业利用职业院校与产业各方优势资源,有机融合产业与职业院校在人才、技术、工艺、课程、科研等各方力量,通过构建协同机制,设立一批产教合作工作室、产教协同中心等,搭建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创新平台。依托上述实体性平台,该专业的人才培养、产品研发、工艺开发等工作避免了以往校企合作中缺少实体性平台而导致工作无法开展的问题。因此,从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的特征看,实体性平台是基础。

与传统校企合作存在根本性差异的是,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创新平台成为将学校与企业的双方资源进行有机整合的实体性机构。案例学校中,在湘绣艺术学院董事会的领导下,三家实体性机构均由校企共同建设,各方按照各自优势进行资金、人力以及其他资源投入。在功能定位上,实体性机构主要承担湘绣产业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同时,根据企业需求和产业发展趋势,通过确定开发项目,校企合作组成协同创新开发团队,进行湘绣绣稿设计研发、湘绣装裱形式创新、湘绣材料研究等与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研发工作,因而实现了“项目引领”机制下的校企协同创新人才培养与产品开发有平台、有依托。在人才培养成本分摊上,企业通过投入专业人员作为兼职教师、提供真实项目供学生学习、设立奖学金等多种方式,承担了部分人才培养成本。同时为营造鼓励创新氛围,学校设立的产学协同创新奖励基金,学校与企业的相关专业人员都可以参与申报基金,推动全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产教协同创新的价值认知与认同。

不难看出,该校湘绣专业校企协同创新取得一定成果且形成了可持续的发展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校企协同创新有合作基础与合作条件,双方由于各自事业发展,存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与合作意愿。二是形成了校企协同创新机制与平台。机制中包含了合作关系发展、利益分配、责任分摊等,既强化了校企联系,信息在双方得到有效交流与沟通,也化解了合作中的各种冲突。三是校企双方对协同创新形成了高度认同与价值共享,突破了简单校企合作模式因为观念认同与价值冲突而造成的合作“可持续性”限制。学校和企业对氛围的营造也将促进校企协同创新的发展。

四、构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机制

(一)构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机制的基础

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发展的协同创新,关键在于逐步形成和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活动系统优化与整合,通过均衡各方利益,形成校企深度合作、产学研紧密沟通的协同发展格局。我们可以从上述案例在人才协同培养创新机制与产教协同技术传承与工艺创新平台方面获得一些有益启示,同时,借鉴系统科学和协同学的相关理论,^[6]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创新机制的基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产学研多元主体分享共同的协同创新意愿。任何协同系统都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协同意愿、共同目标和信息沟通。^[6]从产学研协同创新这一问题来看,其中,协同意愿是决定异质性的协同主体——校、企之间实现有机协作的关键;共同目标是校、企产生协同意愿的基础和前提;信息沟通则保证了协同意愿与共同目标之间的联系与交换,从而促进形成动态协同过程。因此,校、企双方要对职业教育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共同认识,通过分享协同创新愿景,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行动。

二是产学研协同微观主体形成共同的利益基础。也就是说,个体企业和职业院校能够真正产生协同行为,必须要有共同的利益包括双方短期收益和长期利益。通过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对于企业来说,获得充足的、合格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持续的技术创新以及因此而附带的经济利益是其最直接、最显著的利益。同时,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所带来的其他隐形利益(如企业的社会声誉提高)也是同样重要的。职业院校在产学研协同发展过程中获得了自身需求的利益,主要表现

在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办学水平以及院校声誉,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共同利益基础就是产学研双方都能从协同发展行为中实现自我的发展,同时也能实现社会公共福利的增进。

三是以系统序参量为主要依据构建协同机制。影响和支配产学研协同的效果的主要序参量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校企双方在协同创新目标上的一致性程度,二是利益的分配状况,三是信息共享的水平。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协同创新机制就是要根据序参量的特点来确定协同机制,从而理清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各个子系统之间本质联系,明确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

四是差异协同原理。职业教育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基础就是职业院校与企业本质上的异质性,唯有这种异质性方可凸显人才培养和创新能力上的互补性,也是协同创新的基础与意义所在。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的教育性取向与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功利性需求应该合理平衡,因此,产学研协同创新中,既要防止各方在协同目标上的过度分歧,又要避免过分趋同。应突出不同协同主体的特质和价值取向,充分发挥企业在人才培养、职业院校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与长处,形成“和而不同”产学研协同创新格局。

(二)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机制的内容

协同创新的基本特征是开放、合作、共享,核心是要在制度、组织和管理三个维度开展多主体的协同创新,有效整合创新要素,促进创新资源在系统内有序、无障碍流动。^[7]推动高职院校与区域产业协同创新,必须以现代治理理念,从顶层设计到制度安排,从利益分配机制与办学模式创新,完善协同创新组织相关的制度、组织和管理。构建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过程中,需要从总体互惠信息共享、资源优化配置,到协同创新主体行动最优同步、最终形成协同创新共同体的系统合理匹配。有研究者讨论社会治理协同创新机制时,认为主要包括“多元主体复合的协同创新机制”、“公众参与‘多中心协同治理’机制”等8个方面的内容。^[5]这对我们分析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有较多启发。构建高职教育与区域产业协同创新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合作的政校企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从社会契约的角度看,职业院校和企业和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以及技能人才培养中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分工,并期冀通过长期合作形成了固定的

社会契约关系。因此,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要序参量,建立校企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推动职业院校和企业围绕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共同目标,形成政府顶层设计、校企协同行动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格局。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在产学研协同过程中的职能,推动形成职业院校和企业形成整体制度安排、协同宏观政策环境和微观产学研协同机制,为职业院校、企业参与协同创新过程搭建平台,规范职能,培育创新主体的协同能力。职业院校和企业由政府搭建的协同创新框架内,发挥各自在人才培育和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协调关系,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

二是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合作的价值整合协同机制。分属于不同部门的职业院校与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持有异质性的价值取向。职业教育服务的“公共产品”取向与企业的“经济利益至上”取向存在着天然的冲突,因此,不同价值取向的主体要实现共同的价值目标,其关键在于推动价值整合。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进程中,共同的价值目标是培养优秀人才和技术创新,且重在人才培养。传统的观念中,人才培养是职业院校的工作,而企业是使用人才的;同时,由于参与人才培养必然存在相应的成本,也并无刚性的法律规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企业有可能倾向于规避人才培养的责任。因此,产学研协同过程中的价值整合重在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形成共同的价值共识。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通过相应的法律和政策,促进企业认同参与发展职业教育是企业应然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价值。

三是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合作的利益整合协同机制。各方利益将成为影响和制约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要序参量,目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困局也主要是由于利益协调困难,因而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可持续的稳定系统利益格局是决定产学研协同行为的关键。通过政府在顶层制度层面明确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机制,利用税收、奖励及约束等方面的重要政策杠杆,形成稳定的保障职业院校、企业各自收益机制,逐步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稳定利益分配机制和补偿机制,并根据产学研协同创新不同阶段、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变化,不断调整完善利益整合协同机制。

四是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合作的资源整合协同机

制。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及技术创新资源有限的状况下,如何最大程度地激活有关社会资源,将对企业和职业院校最大程度发挥资源优势推动协同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通过建立产学研协同资源整合机制,将企业的人力资源、硬件与设备资源、软件资源(技术标准、专利等)和职业院校的智力资源、知识和技术创新资源等在产学研协同的总体框架下进行优化配置与整合,不断满足技术技能积累、技能人才培养以及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资源需求。

五是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合作的协同实施机制。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通过整合校企协同信息,推动产学研协同中的职业院校系统和产业系统实现全面协同,协调职业院校和企业各主体的协同行为和协同创新目标。充分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手段,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信息共享与沟通,避免协同合作中的信息不畅与沟通障碍。管理部门制定推动职业教育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引导性评价方案,出台科学合理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奖惩机制,引导职业院校、企业共同进入区域性、行业性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体,激励和推动创新主体根据自身优势,参与到协同创新的总体行动框架中来,逐步形成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的长效机制。

参 考 文 献

- [1] 贺俊,黄阳华,沈云昌.校企合作研发的最优制度安排[J].中国工业经济,2011,(2):151-160.
- [2] 韦森.哈耶克式自发制度生成论的博弈论诠释[J].中国社会科学,2003,(6):43-57.
- [3] 张学文.开放科学视角下的产学研协同创新[J].科学学研究,2013,(4):617-622.
- [4] 涂振洲,顾新.基于知识流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3,(9):1381-1389.
- [5] 范如国.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2014,(4):98-120.
- [6] 许国志.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29.
- [7] 李建求,卿中全.协同创新与高职教育发展[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3,(5):118-122.

(下转第29页)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mployment between Graduates and Young Migrant Workers

WU Keming¹, YU Jing¹, LU Tongqing²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2.School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assess the proposition “Whether higher education can change the fate of the peasant stratum”, we need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employment between graduates and young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mployment rate, wage, work timework environment, and career prospect.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though the employment rate of graduates is slightly lower than that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they have higher wages and bigger chances to enter into major labor market and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so they have better career prospect, while the work time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is longer, and the work environment is much wors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employment of graduates is much better than that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which shows that higher education can to some extent promote the upward social mobility of the peasant stratum. Therefore, the peasant stratum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long-term benefits, don't rashly give up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effort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of graduates and the rate of return to higher education, and to strengthen skills training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graduates; young migrant workers; comparison of employment

责任编辑 景 风

(上接第7页)

On the Logic and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ANG Zhibin¹, SHI Weiping²

(1.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2.Institute of Vocational and Adult Education Researc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needs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departments and multi-subjects, while the education-industry cooperation is the esse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ird Industry Revolution, to construct a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y is a response to foster innovational skilled talents and transference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models. The heterogeneity of subject innovation ability is the inner logic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n science. Based on the theory study and case analysi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hould be built on shared vision of multi-subjects of the education-industry, common interest of individual body and order parameters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ramework, and the subject collabo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cooperations, the integration of value, interest and resource may lea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 term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ctiviti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ducation-industry cooper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责任编辑 叶庆娜

推进中国式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建设

唐智彬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国家政策、重大项目与地方探索的“组合拳”,推动职业教育成为我国教育体系中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组成部分。在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宏大探索亟待理论的积极阐释,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需要理论成果的有效回应,未来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同样期待理论研究的科学引领。因此,推动体现中国特色、突出中国风格、彰显中国气派的职业教育学科建设意义重大,构建职业教育学科的“三大体系”显得尤为迫切。

构建中国式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应立足中国职教探索,夯实学术话语的实践根基。科学、准确、充分、成熟的学科话语体系是职业教育学科发达的重要表现。我国职业教育的创新实践与伟大成就是职业教育学科建设的底气,而学术话语体系建设需要立足中国实践,客观呈现我国职业教育事实,深入研究我国职业教育问题,准确判断我国职业教育价值。通过揭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运用规律性的认识指导职业教育实践,形成一整套科学表达体系,强化学术话语作为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的载体功能,以话语形塑观念,凸显职业教育学科特色,完善职业教育学科的理论架构与知识体系,提升学科话语传播水平,扩散学科多方面影响。

构建中国式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应不断创新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方法论,突破西方理论范式局限。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无论是实践发展还是理论建设都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响,形成实践层面模仿偏多、理论层面亦步亦趋的局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型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形态越来越丰富。一方面,西方职业教育经验在我国落地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实践与经验方面越来越显得“削足适履”。因此,要不断提升中国式职业教育学科知识的自主性,既要关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事实”,更要体现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价值”,牢固树立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自主与理论自信。

构建中国式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应提炼标识性学术概念,形成自主性理论范畴。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学科发展的一大成就是形成了一些特色鲜明的学术概念,如“岗课赛证”融通、技能型社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及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构建中国式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关键在于推进类似提法的概念化与理论化,奠定自主性理论的基石。因此,一是要准确辨析相关理论概念的边界,明确内涵与外延,实现从特殊到普遍的价值追求;二是要拓展相关概念研究的范畴,从理论基础、逻辑结构、现象特质与内在机制等多个层次和维度形成概念的理论命题;三是要将相关概念放在整个学术话语体系中进行理解和对接,避免自说自话。

构建中国式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应不断强化多学科交叉,注重多学科融合。通过寻求劳动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与职业教育学科的有效融合,在不同类型学科知识的碰撞中实现知识体系创新;通过立足本土实践、历史资源和国际视野,推进学术体系的有机创新;并通过与国际学术话语体系高度接轨的本土化表达来不断增强中国式职业教育学科体系的国际影响与中国特色。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教育科学职业教育研究基地研究人员)

论技能型乡村建设

唐智彬 周梦娇 杨儒雅

摘要 乡村是技能存在的重要场域,技能型乡村是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在于实现农民现代化,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高质量就业。从社会心态、社会条件以及制度保障等方面来理解,技能型乡村建设涵盖开发机制、机构、课程、资源、实施模式以及评价等多个维度。在技能型乡村建设与运作过程中,应建立动力、整合、协调、激励与保障等多方机制,通过推动县域职业教育现代化,奠定技能型乡村建设基础,以新型职业农民为重点,强化技能在乡村人才培养与评价等工作的中心地位,促进技能型乡村建设嵌入农业农村现代化全过程。

关键词 技能型乡村;技能型社会;乡村社会转型;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22-0065-08

我国有源远流长的技能传统,乡村是各类技能萌发、存在、传承与扩散的重要场域。乡村社会中以各种形态存在的技能,既是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底色。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乡村人才外流、传统产业凋敝和乡村现代产业发展滞后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乡村技能和乡村技能型人才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外界所关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背景下,2022年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八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作的指导意见》直面乡村工匠老龄化,部分传统手工艺面临失传风险等问题,围绕乡村工匠培养,通过挖掘资源、构建培育机制、实施培育工程、支持创办特色企业、打造品牌以及完善评价体系等重点工作,培养高水平乡村工匠队伍建设。与此同时,2018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技能人才开发的政策措施,通过《“技

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等文件,围绕健全“技能中国”政策制度体系和实施“技能提升”“技能强企”“技能激励”“技能合作”等具体举措^[1],以期到2035年基本建成“政府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享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推动乡村技能型人才和乡村工匠培养,构建技能型乡村,既是我国技能型人才培养和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回应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技能人才短缺这一关键难题。当前,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需求层面,技能在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进程中的研究与讨论成为一个重要命题,显得尤为迫切。具体来看,技能与乡村产业发展、技能型乡村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等命题密切相关。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国技能型乡村内涵分析,探

作者简介

唐智彬(1980-),男,湖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首席专家,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基本理论(长沙,410081)周梦娇(1998-),女,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管理;杨儒雅,南京师范大学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乡村治理视域下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研究”(21YJA880058);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基金基地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技能形成体系研究”(XJK22ZD41),主持人:唐智彬

讨我国技能型乡村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一、技能型乡村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建设技能型乡村是实现农业产业现代化的关键基础

当前我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具备人口规模庞大、农民利益中心、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以及重视农业强国建设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等基本特征。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要完善联农带农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城乡融合和协调发展、涉农产业组织创新中农民合作社建设以及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2],其中农村人口素质是基础,也是根本。通过在乡村推动技能型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农业产业技能传递、科学观念传播以及农业新技术扩散等,从而提升农业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通过推动技能型乡村建设逐步带动农村非农产业,推动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逐步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二) 建设技能型乡村是优化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

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3]。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村庄的利益复杂性、差异性、诉求多元性,尤其是村庄空心化问题严重引发治理力量不足,农村经济结构变迁引发村庄利益共同体趋于解体,社会关系网络变迁引发农村社会信任缺失,村庄秩序重建引发归属感的弱化等问题^[4],增加了乡村社会治理的难度。建设“人人学技能、人人有技能”的技能型乡村,有利于推进技能赋能农村人口,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随着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推进,技能培训活动广泛开展,营造出“学技能、强技能”的乡村社会氛围,实现以技能促发展,以技能促致富,提升乡村人口发展能力,奠定乡村社会治理的观念基础、社会氛围以及发展基础。

(三) 建设技能型乡村是提升乡村文化的有效方式

乡村文化是乡村居民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中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集合体,包含了价值观念、传统知识、社会制度等多个方面。在城镇化、网络化以及娱乐化的全方

位影响下,乡土文化存续遭遇困境,村民文化需求难以满足,文化变迁与缺失造成乡村道德失范现象^[5],作为中国文明底色与精神家园的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技能型乡村建设将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创新。乡村文化中,传统手工艺、农业技术、林业技术是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乡村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的智慧结晶。乡村工匠培养和技能型社会建设正是着眼于保护、传承与发展乡村技能文化,避免文化断层,奠定乡村振兴的文化基础。与此同时,在推进技能培训、促进技能型社会建设过程中,不断激发农民的创造性和创新性,促进乡村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帮助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文化能人等各类人才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从而助推乡土人才队伍建设^[6],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形成与城市文化并行并重的优秀乡村文化根基。

(四) 建设技能型乡村社会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下,我国对农业农村发展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投入不断增多,资源要素向乡村集聚,这些措施在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的同时,也提出了如何培育乡村内生动力、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推动技能型乡村建设,可以为乡村产业现代化奠定基础,以现代技能和技术扩散引导村民因地制宜确定发展方向,优化生产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积极对接上级有关扶持政策,利用现代化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在实现乡村主体产业发展的同时,带动其他产业领域,如农村旅游、传统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以技能带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奠定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基础。同时,技能型乡村建设促成了包容性乡村社会发展,在增加低技能劳动者和弱势群体受教育机会与就业机会的过程中,缩小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保障了乡村各个不同人群的培训、就业和创业机会,以包容性发展强化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二、技能型乡村的基本框架与结构

(一) 技能型乡村的内涵

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首次提出“技能型社会”的概念,并将其描述为“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新型社会样态,“技能”是这一概念的基础与核心。学界从不同角度对技能型

社会进行了相应的界定。根据相关学者的总结,在经济学术域下,“技能意味着经济收益”^[7],“技能对国家经济增长绩效具有绝对核心作用”^[8],“技能和生产力之间存在密切关系”^[9],明确表达了技能与经济以及国家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社会学视域下,“技能是个体社会存在的重要方式”^[10],“技能既是劳动者的一种个体能力,同时还带有强烈的社会公共产品色彩,是劳动者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获得的载体”^[11]。由于技能本身内涵丰富,技能型乡村建设过程中的“技能”既是一种乡村劳动者个体能力,又是一种发生在农村层面的、集体意义上的能力,依附农民而生,在农村不断得到发展;它既是劳动者谋生的工具,也是劳动者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获得的手段;作为一种国家层面的、集体意义上的社会能力^[12],更是乡村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国家底层竞争优势达成的核心要素之一。

正是因为技能具有个体能力、集体能力、公益物品、经济引擎等多重属性,技能型乡村社会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从乡村社会心态层面形成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氛围与文化;二是乡村社会具备劳动者学习技能、使用技能的条件;三是从制度建设层面出台保障乡村技能形成与治理的相关制度^[13]。技能型乡村社会是一个系统性概念,内涵丰富,涉及面广,是我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技能型乡村的特征

1. 技能型乡村本质上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技能型社会的重要基石

在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落后农村社会向现代乡村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乡村产业现代化是基础,现代技术与技能是产业的根本。构建技能型乡村,现代产业技能通过适应乡村、适合农民的方式在农村广泛传播,帮助农民普遍掌握现代产业与生活技能。“人人有技能”的乡村社会将满足农业农村现代化对产业技能的需求,并以此为基础,拓展到其他乡村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时,我国乡村所覆盖人群之广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乡村人口的技能水平直接影响到我国技能型社会的建设成就。换句话说,没有技能型乡村也就没有技能型社会。

2. 以实现农民现代化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技能型乡村建设的关键目标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在于农民现代化,在于促进农民适应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协同推进,这就需要农民从观念、技能以及素质方面都适应发展趋势与要求,尤其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为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也对农民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13]。技能型乡村建设的核心目标就是在农民形成现代产业技能的过程中,促进思想观念、科学思维、产业技能、文化素质、创新创业能力等方面的发展,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要求。

3. “政校企农”互动是技能型乡村建设的主要模式

在推动技能型乡村建设进程中,政府引导和推动是基础,要通过财政投入,发挥财政的引导职能,布局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点与方向,保障资源建设与培训能力发展。企业与社会参与是关键,通过“资本下乡”、乡村产业布局等多种方式,推动现代产业技能“下乡”。各类职业院校应发挥相应人才培养、技术推广与技能培训的职能,围绕农民的现代产业技能需求提供培训服务。多方主体共同推动农村劳动力技能形成、乡村传统技能传承与创新以及乡村技能文化影响力提升,协同互动促进技能型乡村的形成。

4. 关注特色乡村技能传承是技能型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与城市产业发展不同的是,乡村产业既包括了各类新兴数字化、智能化现代产业,又涉及到大量传统技术工艺工业或者传统手工业,这些都是乡村技能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培养方向。2022年,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八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旨在培养县域内从事传统工艺和乡村手工业,能够扎根农村,传承发展传统技艺、转化应用传统技艺的乡村工匠。培养一大批适应乡村振兴需求的乡村工匠,关注特色产业与特色技能,在技能型乡村建设进程中促进乡村特色产业传承与壮大,是技能型乡村建设的重要目标。

5. 技能型乡村建设的关键作用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高质量就业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的技能转型》报告表明,中国需要重新探索学习以实现劳动力技能转型目标,并使之能够适应后工业经济时代对创新和数字化的需求。不管是劳动者还是雇主都需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认识到提高劳动者技能的重要性,促进建设技能广泛提升的终身学习文化。乡村是我国劳动力的重要“蓄水池”,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既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改进乡村社会治理、缩小城乡差距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推动技能型乡村建设,旨在推动农村劳动力人口适应现代产业发展要求,提升充分就业、体面就业的能力。

(三) 技能型乡村建设的内容框架

紧扣乡村振兴战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结合《“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和发展规划,本文初步提出了技能型乡村建设的内容框架,见表1。

表1 技能型乡村建设内容框架

基本维度	具体定义	主要内容
乡村技能开发机制	指乡村技能开发涉及的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的开发与设计	包括乡村技能需求、乡村职业类型、乡村技能与培训标准、乡村技能开发组织与机构、乡村技能开发本土化资源等
乡村技能开发机构	指负责乡村技能开发的实施主体,如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社会组织等	包括乡村技能开发机构的身份定位、准入门槛、服务质量等
乡村技能课程	指为乡村技能教授者和学习者共同学习而开发的整体课程计划,对相关教学环境和教育活动进行设计与安排	包括乡村相关产业发展所需的整个技能类课程计划的建设,涉及相关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的设计,如课程项目的设置、各类课程的排序、各类课程的标准等
乡村技能开发资源	指一切可以为农村人口技能提升活动开展所利用的条件和因素的总和	包括场地、师资、教材、设备、资金等资源
乡村技能开发实施模式	指乡村技能开发机构所遵从的关于技能型乡村人才培养活动的实践规范和操作样式	包括以乡村发展为基础,以农村人口技能养成、提升和积累为目标,以农村人口技能学习为主要内容,以技能成果导向为主要评价方式
乡村技能开发评价	在系统地、科学地和全面地搜集、整理、处理和分析乡村技能信息的基础上,对乡村技能开发的价值作出判断的过程,目的在于保障乡村技能开发成果质量,提高乡村人口技能水平	包括对技能开发理念、技能开发机构、技能开发内容、技能开发实施过程、技能开发成果等的评价

在技能型乡村建设的内容框架中,涉及到制度与机制、机构与课程、资源与模式等多方面要素,组成技能型乡村建设的结构性力量。从各个维度看,在制度作为基本保障的条件下,机制是运作过程,开发机构是依托,课程与其他资源建设是核心,而实施模式则是根据对象与内容需求的择优选择,评价则是推动力。

三、技能型乡村建设的运作机制

运作机制是指基于一定的制度安排,复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促进、维持、协调、制约等功能,要素之间的组织形式、调节律动很大程度上影响运行机制的效率与结果^[15]。推进技能型乡村建设必须有健全的实施机制。

(一) 动力机制

动力机制旨在为技能型乡村建设与运行提供适当的动力,包含两个方面:目标动力与政策动力。目标动力是指依据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诉求,在同一目标的动力驱使下,相关主体积极参与行动的驱动力。目标动力的前提是明晰参与主体的利益需求,确定达成乡村社会共同利益的“聚焦点”,以建设“人人有技能、人人学技能、人人用技能”为途径,以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与乡村富裕为目标,同时满足政府、企业、农民、返乡人员的诸多利益诉求,为实现参与者的相互依赖奠定基础^[16]。在技能型乡村建设过程中,首先要满足农民利益诉求,集中体现在农民适应现代产业发展需

求、实现充分就业、改善收入水平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政策动力是指通过颁布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提高技能在改进农民生产能力与生活质量中的关键地位。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等文件提出要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加强政府引导激励;对就业重点群体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主要是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城乡未继续升学初高中毕业生等,持续实施农民工“春潮行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和返乡创业培训计划以及劳动预备培训、就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等专项培训,以政策保障技能型乡村建设的短期动力与可持续发展。

(二) 整合机制

整合机制是指相关组织与部门发挥调整或协调职能,消除技能型社会建设过程中不同因素和部分存在的分离状态,促进各方面力量与资源融合统一。技能型乡村建设与运行的整合机制重点关注资源整合,包括整合多方人才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为民赋能。技能型乡村应以培养新型农民工、农技工和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特色产业为依托,通过结合市场需求、结合产业特色、结合品牌效应,大力开发创业实训基地,整合乡村社会培训资源。为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农村产业发展人才、乡村公共服务人才、乡村治理人才、农业农村科技人才“五类人才”培养培育和农民职业化进程,创新推动农民全脱产职业化证书式技能培训,如云南省凤庆县每年有针对性地组织乡村人才振兴技能培训2000人以上,把县域人口劣势转化为人才优势,为全县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17]

(三) 协调机制

技能型乡村社会的形成与运转,涉及到宏观产业政策、劳动关系、社会保护机制、薪酬机制以及技能认证与荣誉机制的协同配合和共同推进,需要各方形成有效协调。协调机制重在促进技能型乡村建设过程中各种关系与利益的塑造与调整。一是技能型乡村建设与乡村发展的协调。进入“十四五”时期后,部分县特别是经济强县、财政大县,已经着手计划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技能型乡村的规划发展应充分结合当前乡村产业发展与就业需求以及乡村实际情况,合理制定发展规划。技能培训与发展既要考虑与当地传统产业特色相结合,同时积极适应乡村产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调整和创新技能培训需求。如2022年7月底,黑龙江省依安县为了打造“生态县、有机粮,建设高端食材供应大厨房”,通过举办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培训了

一支适应乡村发展的技能型人才队伍^[18]。二是技能型乡村建设与相关工作的协调。当前,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布局下,推动了一系列相关工程与项目的建设,如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升行动、数字乡村建设等。技能型乡村建设与相关项目协同推进,通过建立各个部门与项目间的协调机制,平衡各方利益与关系。协调机制应根据不同项目与工程的特征与需求,遵循项目推进和建设的内在规律,统筹各类项目的协同推进,避免项目推进过程中资源与要素分配不均,实现乡村建设各类项目在整体战略中合理定位。

(四) 激励机制

实现技能型乡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经济回报、荣誉鼓励等手段,引导乡村各个群体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动乡村社会形成理解技能、发展技能与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构建技能工作得到全面尊重的运行机制。面向乡村社会不同群体,以促进技能文化在乡村扩散与技能型社会理念在乡村形成为基本目标,以具体的激励措施,凸显技能型乡村建设的总体目标与乡村居民个人发展目标的统一,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重,实现促进农民技能形成与技能乡村社会构建的制度供给与乡村产业发展及农民自身发展需求相统一,不同地区应结合自身实际选择相应的激励方式,提高激励机制的影响覆盖面与激励效能。如有的地方政府按照不同经营管理型培训班、专业生产型、技能服务型培训班、脱贫短训班以及农民教育培训师资和管理人员培训进行专项补贴,以激励农民参与培训;有的地区则按照农民参与培训后获得不同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技能等级证书进行奖励,取得了不错的激励效果。

(五) 保障机制

技能型乡村社会运行中应积极发挥政府的主体职能,建立技能治理保障机制。重点对不同主体的技能人才培养过程和环境进行科学营造、合理监管,强化技能型乡村建设相关制度执行、监管、评价与改进,及时调整、修正制度缺陷与漏洞。考虑到乡村总体技能水平本身不高,而技能型社会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应建立经费投入保障机制,政府应切实履行财政投入与保障责任。建立弱势群体享受教育与培训机会的资源保障机制。技能型乡村建设应以农民需求为中心,其中最重要的是关注到乡村社会中部分技能学习机会短缺、资源获取困难等特殊群体的技能学习需求,如残疾人士、优抚对象、边缘人群等。例如,2017年河南鲁山县下汤镇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引进了电子元件组装项目^[17]。从某种意义上说,能保障弱势群体的技能学习

需求,也就形成了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底线保护。

四、技能型乡村建设的现实路径

技能型乡村建设要充分关注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目标,将乡村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技能竞赛等工作有机衔接、系统推进,形成全链条、多维度、高水平、可持续的乡村发展人才支持系统,以技能型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 以县域职业教育现代化作为推动技能型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发展、“工业立县、产业强县”战略实施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加快,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尤其对县域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即通过实现自身现代化,成为支撑技能型乡村建设的关键力量。

首先,明确以推动技能型乡村建设为目标,强化县域职业教育发展的系统设计。县域职业教育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底层结构,决定了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水平与现实高度,但是县域职业教育发展也面临着定位不清、发展方向不明确以及支撑能力偏弱等难题,其发展水平往往取决于举办主体的财政供给能力和投入水平,因此县域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非常突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着围绕“五大振兴”提供全方位支持的现实使命,因此县域职业教育要重新定位自身功能,强化服务县域经济社会以及乡村发展的现实功能,以支持构建技能型乡村为基本目标,定位县域职业教育的功能结构与能力塑造重点。在这一过程中,县域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专业布局与课程结构、教育手段与培训模式都应该与技能型乡村建设目标相衔接,以县域职业教育现代化为旨归,整体设计县域职业教育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的系统目标,逐步形成支撑技能型乡村建设的县域职业教育体系。

其次,探索适切于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职业教育模式。技能型社会建设不只是一种理念,更需要具体的载体和行动中得以实现。为了充分推动县域职业教育资源总体提升和资源结构重组,一方面,通过搭建“县校合作”平台,畅通城市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传输到县域的渠道和方式,促进城市高职院校与县域之间的深度合作,形成“城市支持农村、高职支持中职”的基本格局,有效改变当前县域中等职业教育资源供给总量不足、资源内容单一、供给水平总体偏低的状态,为构建技能型乡村奠定职业教育资源供给基础。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已有的覆盖“乡镇—县—市”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盘活现有资源渠道与实施方式,促进技能下乡,不断提高乡村劳动者就业能力、工作能力、职业转换能力以及创业能力。

再次,以构建技能型乡村为目标重构县域职业教育体系,推动县域职业教育发展多元化和服务功能多样化,形成县域职业教育培养成果多重输出的格局。通过不断强化作为教育类型的职业教育在县域经济社会格局中的地位,提升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功能,促进县域职业教育在升学、就业、培训、技术推广、知识普及等多方面功能逐步扩展的过程中,改变民众对县域职业教育的一些刻板印象,重建民众对职业教育的信心,实现技能型社会建设与职业教育发展的互促互进。

(二)以新型职业农民为重点推动技能型乡村建设

推动技能型社会建设,其实质上就是通过技能型社会建设全方位提升人的素质,从思想到文化,从知识到技能,从素质到行动能力,实现全面现代化。在推动技能型乡村建设进程中,推动农民现代化,全面提升乡村人群现代化水平,重点在于培养具备现代能力与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

首先,建立以技能为中心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框架。培养、提升乡村人口技能并使其利用技能进行生产生活是技能型乡村建设的重点目标,新型职业农民是技能型乡村建设的重要主体,围绕技能来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框架,也就是明确技能型乡村建设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内容的问题。要坚持综合开发的原则,全方位提升新型职业农民技能素养与水平。一方面,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科学思维与观念,同时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挑选、叙述“大国工匠”的案例和事迹,增强技能素养培养^[20]。另一方面,要基于乡村产业现代化发展方向与要求,结合乡村特色与传统,以技能为中心,综合开发与设计技能培养课程,为技能型乡村建设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养与提升提供充足的途径与机会。可以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现代产业技能,如数字技能等;可以促进新型职业农民传承与发展传统特色产业技能,培养一大批适应乡村振兴需求的乡村技能者、乡村工匠;可以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创新创业技能,帮助农民学员进行乡村创业、参与乡村振兴,实现自我可持续发展^[21]。

其次,创新以农民技能形成为重点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手段。在社会分工与技术应用广泛的现代社会,农民技能形成是技能型乡村建设的重要表征,值得进一步以农民技

能形成为重点来探索创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手段。技能形成具有多主体协同性和群体特殊性。新型职业农民的技能形成涉及政府、学校、企业的积极参与,其中学校和企业是其技能形成过程中最直接的参与主体,二者技能形成价值观的差异性决定了其培训手段选择的多样性。同时,新型职业农民在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工作经历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对技能形成路径、人力资本投资内容上的选择差异^[22]。因此,总体来看,不同类型的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具有不同的培训需求,需要提供多元化的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养与提升模式,包括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内部技能形成模式、外部技能形成模式、新技术应用模式等。

在以职业学校为实施主体的农民技能形成模式中,职业学校要基于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形成需求,积极发挥协调组织功能,坚定优化协同原则,致力于解决技能型乡村建设的技能供需结构性不平衡问题。通过设立专门团队负责与地方政府、高等院校、农业企业的沟通与合作,特别是依托基层党员和干部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搭建与地方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基层产业组织的合作平台,满足乡村现代产业发展对技能的需求与要求,并在地方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政策、生源、目标、内容、师资、实训基地、稳定就业等方面与各参与主体达成长期合作,加强联合培育,统筹协调各类资源,促进乡村产业技能需求及新型职业农民技能供给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职业学校应从学校长远目标出发,不仅要在农业政策、机械使用及经营管理等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方面有所拓展,还应不断创新作物栽培等农业类专业办学定位,满足现代农业发展对技能的需求^[23]。

以农业企业为实施主体的技能形成模式中,不仅能满足在职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提升需求,也为新型职业农民高质量技能形成提供新途径。一方面,要通过政策激励措施与手段,强化乡村企业主导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形成过程的需求,为现代学徒制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创造合适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现代农业企业在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形成过程中的主体作用,通过项目式任务,采取农学结合、生产一线教学等形式,促进学徒技能经验的积累、工匠精神 and 技能素养的习得,精准对接农业产业一线需求和社会发展趋势,促进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形成^[24]。

培训手段上应充分依靠现代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打破时空限制,实现数字化追踪服务,为新型职业农民不同发展阶段的技能需求及时提供培训资源与服务^[25]。采取“线上+线下”技能培训相结合方式,利用智慧职教等

线上学习资源中心与服务载体,面向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开发合适的生产生活技能培训微课,实现技能的集中学习、分散在线学习及终身学习。

新型职业农民的评价方式上,应强化以技能水平为重点。以评价改进培训效果,保障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水平符合技能型乡村建设需求。一要坚持多元主体评价。教师、企业、新型职业农民是感知技能获得与作用发挥的主体,实施职业学校教师、乡村产业企业和新型职业农民评价,以发现技能培训、技能学习、技能使用中的问题,总结经验与教训,提高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质量,助力乡村技能形成。二要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技能评价维度与标准。通过不断开发、更新与完善国家资历框架体系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为新型职业农民技能素养和技能水平测评提供依据与标准。三要坚持成果导向与过程导向相结合的评价方式。通过构建技能使用情境与任务,以新型职业农民技能规范使用与技能成果质量体现其技能获得水平。

(三) 将技能型乡村建设嵌入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从结构特征和建设进程来看,技能型社会建设应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协同推进。随着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拓展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目标,既涵盖了农业产业从生产、经营到管理以及组织的现代化,又关注了农业、农村以及农民的全方位综合发展,形成经济、社会以及人的全面现代化。

一是将技能型社会建设定位于促进乡村产业内生发展的根本力量。长期以来,乡村产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使其成为典型风险产业。培育乡村产业韧劲,促进乡村产业避免过度依赖外在支持,实现内生发展,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资源内生、组织认同、本地参与是乡村产业内生发展的三大要素^[26],从本质上说,三者具有共通性与共同基础,无论是乡村资源,还是有效推动乡村产业组织认同,抑或是本土参与,均需要凸显农民主体地位,而技能是凸显农民主体地位的关键变量,决定了农民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参与能力,也决定了三大要素的协同水平。将技能型社会建设工作嵌入到乡村产业发展进程,围绕重点产业,开发面向地方的定向产业技能培训课程,逐步构建基层的现代乡村产业技能培训体系,在不断满足农民传统产业技能培训、传承与创新的同时,促进现代产业技能在农民间的扩散,尤其要培养农民感知市场、面向市场、研究市场和利用市场的新技能,全方位提升农民的现代技能水平。通过技能为乡村产业赋能,促进乡村产业扩大规模、凸显差异、提升品

质,并在技能型乡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协调乡村产业发展过程重点利益分配机制,协调要素分配,从而有效触发乡村产业资源内生,提升乡村组织认同,持续参与乡村产业发展与振兴。

二是以技能型社会建设促成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一种自致性的能力,在我国推动技能型社会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等多重背景下,技能是个体最便捷、最全面、最充分获得的资源;对农民而言,这可能是一种最公平的发展机会。因此,在为农民赋予相应可行能力的同时,推动技能型乡村建设可能改变农民一些传统、落后观念提供重要契机,进而奠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人心”和“能力”基础。从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要求推动和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秩序二者并重^[27]。技能型社会建设既关乎乡村发展,更关乎乡村秩序。在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优化治理目标、措施以及手段等,实现乡村治理合法、有效而公正,既需要国家有效的制度供给,又需要切合农民利益需求的治理手段,还需要一种嵌入农民工作与生活的治理方式,寻求乡村社会治理各个主体之间的契合点和联接点,明确更为科学的治理措施、手段、范围以及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技能型乡村社会建设是最理想的调动乡村社会主体能动性,形塑政府、市场和乡村社会间的协作与整合机制。随着现代产业技能在乡村逐步扩散,农民的现代技能水平整体提升,技能型乡村逐步形成,农民将更顺利地获得现代化生产要素与发展资源,乡村产业和农民得到更多高质量发展机会^[28],促使乡村均衡而充分的发展,实现农民体面就业、乡村和谐稳定。

三是以技能型乡村建设助推乡村功能定位多元化。党对我国乡村发展功能的认知从单一的经济性功能扩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注重多功能开发和综合发展^[29]。从功能角度看,乡村功能主要体现在:一是承载我国农业生产关键能力,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二是承担着为整个国家(包括城市和乡村)提供生态屏障和生态产品的功能;三是传承国家、民族和地域的优秀传统文化^[30]。技能型乡村建设应该重点围绕乡村在新发展历史阶段的多元功能,在适应“互联网+现代农业”“智慧农业”等农业新形态,促进现代农业技能扩散、农民技能更新以及农业技能总体提升的基础上,围绕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目标,通过培训和推广可持续发展的生产与生活技能,从理念和实践层面满足乡村适应功能扩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 [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21-06-30)[2022-03-23].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nr/zcfg/gfxwj/rcrs/202107/t20210705_417746.html.
- [2]姜长云,王一杰,李俊茹.科学把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策寓意和政策导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12.
- [3]闫书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J].行政论坛,2022(1):52-57.
- [4]张军.新乡贤的嵌入与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基于两个村庄的比较分析[J].社会发展研究,2023(1):191-206+245-246.
- [5]雷明,于莎莎.乡村振兴的多重路径选择——基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22(9):1-14.
- [6]张波,丁晓洋.文化产业何以助推乡村振兴:一个分析框架[J].求实,2023(3):82-94+112.
- [7]凯瑟琳·西伦.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M].王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
- [8]BOOTH A L, SNOWER D J. Acquiring skills: Market failures, their symptoms and policy response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9]ACEMOGLU D, PISCHKE J S. Why do firms train? Theory and evidence[R].Cambridg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6.
- [10][13]唐智彬,杨儒雅.论我国技能型社会的结构与运行机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6):11-21.
- [11]王星.走向技能社会:国家技能形成体系与产业工人技能形成[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
- [12]李玉珠,弓秀云,张秋月.技能社会的核心、载体与共同体逻辑[J].职教论坛,2022(1):42-50.
- [14]刘梅珍.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文化诉求及其实现[J].求实,2012(6):83-85.
- [15]刘琼莲.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运行机制[J].改革,2020(11):147-159.
- [16]赵彦彬,桑路娟.社会互赖理论视域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运行机制及路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124-131.
- [17]沧州市农业农村局.凤庆县加快农民职业化进程[EB/OL].(2022-08-30)[2023-01-05].<http://www.lincang.gov.cn/info/1410/75897.htm>.
- [18]齐齐哈尔人才网.加强农技人才教育培训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队伍——依安县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育培训正式开班[EB/OL].(2022-08-09)[2023-01-05].http://www.qqhercw.gov.cn/yian_dtxx/20220805/740253345171636224.html.
- [19]网易.鲁山:技能培训助力特殊人群就业[EB/OL].(2022-07-14)[2023-01-05].<https://www.163.com/dy/article/HC7U4RSJ051998G8.html>.
- [20]王扬,乐晶.技能资本: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行动逻辑[J].中国电化教育,2022(5):66-74.
- [21]杨儒雅,唐智彬.高职院校实施有效农民培训的问题与对策[J].江苏教育,2021(29):14-18+41.
- [22]张学英,耿旭,宋良杰,等.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形成:高等职业教育的回应[J].教育发展研究,2022(17):52-58.
- [23]杨儒雅,唐智彬.职业院校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实逻辑与发展路径[J].职教论坛,2022(6):101-108.
- [24]马新星,朱德全.现代学徒制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逻辑框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9):87-95.
- [25]田昕加.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策研究[J].学习与探索,2020(11):137-142.
- [26]张文明,章志敏.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2018(11):75-85.
- [27]陆益龙,李光达.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J].江苏社会科学,2023(2):78-86+242.
- [28]陆益龙.乡村振兴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48-56.
- [29]吕捷,赵丽茹,李红艳.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三农”理论发展与创新[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1):115-124.
- [30]陈锡文.乡村振兴要发挥乡村特有的功能[J].乡村振兴,2021(1):26-27.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kill-oriented Countryside

Tang Zhibin, Zhou Mengjiao, Yang Ruya

Abstract Rural areas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domain for the presence of skills. Skill-oriented countryside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kill-based society. The central objective of skill-oriented countryside is to achieve the modernization of farmers and to promote full and high-quality employment for rural labo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attitudes, social conditions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skill-oriented countryside encompasses various dimensions including development mechanisms, institutions, curricular, resources, implementation models and evalu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nd operating skill-oriented countryside, it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mechanisms for motivation, integration, coordination, incentives, and guarantees. By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the foundation of skill-oriented countryside can be laid. With a focus on cultivating a new type of vocational farmer, the pivotal role of skills in tasks such as rural tal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an be reinforced, which will facilitate the integration of skill-oriented countryside development into the entir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skill-based countryside; skill-based society; r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uthor Tang Zhibin, professor of Research Institut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Zhou Mengjiao, master candidat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Yang Ruya,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新工科背景下 工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路径探析 ——基于湖南师范大学探索的案例分析

张建军, 林海军, 汪鲁才

(湖南师范大学 工程与设计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面对新工科所提出的人才培养要求,需要在培养理念上重塑,由制器走向育人;要在体系上更新,从封闭转至融合;要在模式上变革,以创新替代守旧。如何培养新工科背景下工程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工程技术人才,湖南师范大学电子信息类专业提出的“创新活动学分认定驱动”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具体说来,需要以学生创新能力发展为培养理念,以多主体协同配合为突破口,以资源充分供给为基本保障,培养高质量的电子信息类技术人才。

关键词: 新工科; 电子信息类人才; 创新能力培养; 人才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 G7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53(2023)05-0065-06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1]。自2016年开始,教育部组织各高校先后形成了“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北京指南”,以全面推动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新经济背景下工程教育改革,以新思维与新方式推动新工科建设^[2]。2018年,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 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意味着新工科正式落地。除此之外,欧美等国的技术封锁以及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阻碍。面对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通过培养工程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工程技术人才,冲破西方的重重限制,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湖南师范大学电子信息类专业提出的“创新活动学分认定驱动”

人才培养模式极具参考价值,可为新工科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一、新工科背景下电子信息类人才培养的逻辑变化

(一)理念重塑:由制器走向育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3]而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前提是育人理念的重塑。面对万物互联、大数据处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新兴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时候从实用主义走向新人文主义了,需要以更加包容、更为多元、更具关怀的理念培养未来的工程技术人才。按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加强创新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比重”^[4]的目标,以及从年轻一代人的特性上来看,

收稿日期: 2022-05-12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湖南省教育厅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产出导向的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20190147);2020湖南省教育厅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电子技术基础课程‘金课’建设与应用研究”(HNJG-2020-0159)

作者简介: 张建军(1974—),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数据科学。

“他们极具探索性和创新性,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信息技术的融入能力。”^[5]故而不能以就业为导向。如此说来,第一,基于学生已有的好奇心和兴趣,让学生通过积极主动的社会参与,加强学生同社会各界的联系,并且以学生满足感的获得和反思思维的训练来推动学生自身素养的提升。第二,围绕实际的社会生活和学习活动,适当凸显新工科的实用性,为学生解决问题提供思考依据,让学生在实践中推陈出新,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三,克服社会的刻板印象,敢于发出质疑,让学生实现自我知识体系和理解能力的转变,进而使其利用更为周密的综合视角,进行全面的分析,完善自我,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体系更新:从封闭转向融合

从当前的科学发展来看,所面临的问题会越来越复杂,难以用单一学科的知识予以解答,尤其是在处理“卡脖子”等技术难题上,这就要求人才培养体系随之更新。原因在于,一方面,这是国家谋求高质量发展、突破技术封锁的战略之需。“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所以,它要以国家的意识来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6]以往国家依据科学发展的不同领域将其划分成不同的学科,然后据此培养相关的人才,以快速使某一领域的技术趋于成熟。不过,随着科学技术日渐整合,这就需要培养多学科交叉的人才来“促进科学整体性发展、推动人类知识更新、变革思维方式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7]。另一方面,这是个人面向终身发展的必由之路。高校培养学生不应该给学生封闭的基本知识,而应该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促进学生由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知识创造者。所以,高校在培养新时代电子信息类人才时要有意识地破除人为建制所形成的固有的学科建制,应以更融合、更协调、更大跨度、容纳更多内容的方式实现学科间的整合,同时旨在扭转对现有技术过度依赖的状态,转向对新技术、新思维、创新发展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的不懈追求。总之,在新工科背景下,人才培养体系需要从封闭的方式转至融合培养模式。

(三)模式变革:以创新替代守旧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攻坚期,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

蓬勃兴起。”^[8]面对全新的发展机遇期,以往电子信息类专业传统教学模式的问题逐渐暴露了出来。一方面,传统教学模式只重视理论知识学习,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只注重基本知识与相关理论的传授,而轻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即使开设实验课程也多是验证性实验,具备“高阶性、创新性与挑战性”特征的实验较少。另一方面,课堂教学也大都采用“满堂灌”模式,教师单向传输知识,缺乏师生互动与研讨,学生被动接收知识,缺乏学习主动性与主动思考,逐渐丧失学习兴趣。除此之外,实验教学基本上都是采用“先示范后操作”的方式,教师按设计好的方案(步骤)先操作一次,学生再根据教师的示范自己动手实验一遍,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缺乏主动思考、反复设计等环节,只是“比葫芦画瓢”,被动地验证已有方案,对实验目的及实验与理论的联系,缺少分析理解。这就造成了学生创新兴趣不足、创新意识不浓、创新能力不强,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人才需求。而在新工科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下,需要以学生为中心,推进现有课程教学模式的变革^[9]。并且积极探索电子信息类人才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新模式,以培养满足新工科要求的人才。

二、新工科背景下电子信息类人才培养的模式构建

针对新工科背景下电子信息类人才培养的逻辑变化,湖南师范大学依托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实施了全新的培养模式,构建了基于创新学分认定的电子信息类专业实践育人机制(如图1所示)并进行了实践。该模式坚持“理实一体、实践为先”,开设“课外研学创新”课程与创新学分认定,构建创新实践活动载体,建设创新创业基地,打造协同育人师资队伍,改革创新活动评价方式,持续激发学生创新兴趣、启迪创新思维、培养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将“校企合作、产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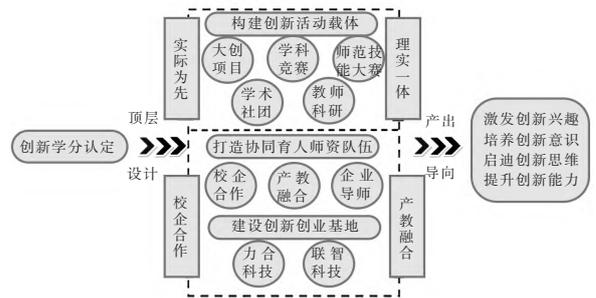


图1 基于创新学分认定的实践育人机制

融合”的育人理念与“基于 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的实践”育人模式落到了实处。

(一)优化培养方案,设立创新活动学分认定机制

2017年2月18日,综合性高校工程教育发展策略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会议为湖南师范大学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加快建设和发展新工科提供了坚实基础^[10]。湖南师范大学依据国家新工科相关会议提出的建设内涵与建设要求,进一步修订人才培养目标、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调整教学计划,在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培养方案中增加机器人等工程实践课程,强化工程实践学时,注重对学生创新思维与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进而不断提升其创新能力与综合素养。

通过邀请校内外教育专家与行业、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等相关利益方,并经过多方论证,湖南师范大学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实施了“三融合、一重点”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即融合“知识、能力、素质”为一体的人才培养理念;融合“专业能力、人文素养与工匠精神”为一体的培养内容;融合“课堂教学、校园文化活动与社会实践”为一体的全方位育人方式;持续优化专业培养方案,增设“课外研学创新与职业资格考证”课程,将创新课程作为必修课程引入人才培养方案,以增强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增加参加创新创业活动的兴趣。学生可以通过参加学科竞赛、大学生创新项目、教师科研项目,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发表学术论文等形式获得学分,并且在大学四年内修完即可,对其没有具体的学习时长限制,从制度上对学生实践动手与创新能力培养提供保障。

(二)构建创新能力培养载体,激发学生创新兴趣与创新活力

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创新能力培养要在创新活动中进行,如果创新活动缺乏载体,则创新能力培养就没有抓手,会导致学生创新创业兴趣不高、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不强。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员和课本不能成为学生唯一的导师”“从做中学”是教学的基本原则和最有效方法^[11]。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创造条件,为学生的创新实践活动提供载体,积极倡导学生“做中学”与“学中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助力学生创新意识培养与创新能力提升。一是以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教师科研项目为创新活动载体,

通过参与创新实验项目与科研项目,不断提升学生创新能力。近几年以来,湖南师范大学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共主持国家级、省级与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实验计划项目 80 多项,120 多人参与教师科研项目,获专利与软件著作权 20 多项。学生们在项目研究、实践过程中,不仅提升了实践能力,也切实收获了成就感。二是以“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电子大赛”“大学生智能车竞赛”“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师范技能大赛”等学科竞赛为创新活动载体,让学生通过参加各项赛事,培养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团队协作精神。湖南师范大学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近年来共支持学生 310 余人次参加省级及以上竞赛,获国家级、省级奖励 60 多项。特别是 2019 年获得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全国一等奖 3 项,成为学校创新能力培养的一面旗帜。三是以“创智社”“电子家电维修”等学术社团为创新活动载体,通过义务家电维修、创意设计创作等活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激发学生创新灵感。湖南师范大学各社团现有学生会员 210 余人,每年举办义务家电维修、创意设计创作活动近 30 场。学生们在为他人服务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认可。

(三)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打造协同育人师资队伍

校企合作是高校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模式^[12]。对于高校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而言,通过校企合作,建立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基地(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方式、优化校外实践教学模式,是高校实施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重要形式与有效手段^[13]。为此,湖南师范大学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通过建设湖南师范大学一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普通高院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电子信息类专业湖南省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结合“智能移动机器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电子信息类‘人民双创’创新创业资源库建设实践”等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的实施,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并且聘请一批行业、企业专家与校友中的创新创业精英,让其作为校外兼职导师,参与生产实习与毕业设计指导。以校企联合制定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和实训实习基地,不断优化教学团队结构,让合作企业参与到人才培

养与教育教学的各环节及全过程,打造一批校内校外相结合、产业与行业相结合、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校企协同育人师资队伍,不断提升多维度育人水平,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切实提升学生创新能力。

(四)改革教学评价模式,探索多元化教学评价方式

新时代新形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13]。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并指出,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坚决克服重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素质等片面办学行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14]。

为了更好地鼓励学生进行创新活动,提升学生创新能力,湖南师范大学在“课外研学创新与职业资格考证”课程考核评价时,一改传统课程教学评价方式——结果性考核,代以过程性评价、表现性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多元化考核评价。虽然课程学分在认定时依据的是学生是否发表学术论文,是否取得相应的专利(软件著作权)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学科竞赛获奖证书、等级水平证书等。但实际操作时,即使学生最终没有发表论文,也没有取得相应证书,但是只要在创新活动的过程中,学生认真去做实验、做研究,并且其在研究过程中的表现也得到了指导教师的肯定,学生也能获得相应的学分认定,以此对学生进行鼓励,激发其今后的创新活动开展,进而提升其创新能力。

三、新工科背景下电子信息类人才培养的路径探析

为了解决好新工科背景下电子信息类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湖南师范大学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重新修订培养方案、设定必修课“创新学分与职业资格考证”,创新学分认定机制,利用顶层设计进行制度保障;贯彻“实践为先、理实一体、行动导向”等教育理念,构建“大创项目、学科

竞赛、师范技能大赛、学术社团、教师科研项目”等创新活动载体,不断深化校企合作、持续推进产教融合,建设创新创业基地,打造由校内教育专家、行业专家与创新创业精英共同组成的协同育人师资队伍,践行专业认证倡导的“学生中心、产出导向”理念,切实激发学生创新兴趣、培养创新意识、启迪创新思维、提升创新能力。由此可见,湖南师范大学在推进新工科背景下电子信息类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可为同类型高校推进相关人才培养提供路径借鉴。

(一)以学生创新能力发展为培养理念

我们培养的是面向未来的、可以助推国家发展的新型工程技术人才,因而“创新”是核心要义。那么,在具体的人才培养方案及实施过程中,需要时刻以学生为中心,尊重每一个学生的存在,引导每一个学生成长,充分发掘学生潜力,从而发展个性,成就个体^[15]。一是要在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上,将学生的创新能力发展放在首位,一切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方法、课程编排、课程资源等都要围绕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来设计。二是为学生创新能力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为此需要破旧立新,“打通融合渠道,实现资源共享、平台共建,促进跨学院、跨学科的交叉融合、互动发展。”^[16]三是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创新实践活动。根据湖南师范大学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的探索,需要大力支持学生参与“大学生电子大赛”“大学生智能车竞赛”“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等赛事,将学生所学与所用相结合,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提高创新能力。四是转变“唯分数”的评价模式,给予学生更多的灵活性以及更多的时间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在探索中实现突破。

(二)以多主体协同配合为突破口

对新工科而言,开放办学尤为重要。我们培养的是后继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所以要从制度或组织层面进行转变,摒弃单一的、封闭式的模式。根据专业特色,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实现多主体的协同配合是新工科背景下电子信息类人才培养的突破口。一是在培养方案的设定上,高校要与行业、企业专家进行对接,了解需求侧需要哪类人才,相应地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二是在培养环节中,构建“双导师”制,加强校内与校外导师的配合,促进学生知识与技能学习双向共进。三是在教学评价方面,引进校外行业、企业专家等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注重对学生实际创新能

力的培养。换言之,“通过产教融合建设新工科,实现区域政府、高校、行业、企业人才流通,通过共同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共同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实现校企协同双向育人。”^[17]唯有建立起多元主体参与的人才培养机制,才能实现多方配合,实现校内与校外衔接,共同关注工程技术前沿,抢占行业发展先机,占据学科发展制高点。

(三)以资源充分供给为基本保障

推进新工科背景下电子信息类人才的培养需要一定的资源支撑,而高质量的发展,则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一是经费投入,这涉及人才培养方案能否落实以及各种教学活动是否可以正常开展。任何新的改革的行进,经费均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需要各方主体基于共同的目标,不断加大经费投入,以保证培养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二是资源平台的建设。“双导师”制、联合聘任制以及产教融合项目等均需要使其制度化,而资源平台的落实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关键。资源平台的建设可以有效促进各项人才培养活动有制度可循、有资源可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证各方的合法权益。三是建立丰富的学习资源项目库。对电子信息类人才而言,需要在真实的任务中进行学习,而资源库的建立能够有效缓解学生知识与技能分离的问题。四是提升教学硬件设施建设,建立虚拟仿真实验室,帮助学生真实掌握技能,在试错中得到进步。五是加强教师群体的能力。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教师自身的能力也需要切实提高。总之,在一切有利资源的投入下,定会培养出高质量的、符合新工科建设目标的电子信息类人才。

参考文献:

- [1] 新华社. 政府工作报告(全文)[EB/OL]. (2015-03-16)[2022-05-05]. 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5-03/16/content_2835101.htm.
- [2] 钟登华. 新工科建设的内涵与行动[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7(3): 1-6.
- [3] 新华社.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10-25)[2023-05-05].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4] 新华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EB/OL]. (2019-02-23)[2022-05-06].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
- [5] 修南. 面向新文科建设的教学改革研究[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2(3): 50-53.
- [6] 华勒斯坦. 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 刘锋,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28.
- [7] 潘懋元,陈斌. 论作为交叉学科的高等教育学[J]. 高等教育研究, 2021(4): 56-60.
- [8] 陆国栋,李拓宇. 新工科建设与发展的路径思考[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7(3): 20-26.
- [9] 陈建,朱鲁闯,王杰,等. 新工科背景下工程训练创新实践课程体系研究[J]. 实验科学与技术, 2021(6): 84-88.
- [10] 姜晓萍. 一流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两个维度[J]. 中国高等教育, 2018(1): 41-42.
- [11] 唐未兵,温辉,彭建平. “产教融合”理念下的协同育人机制建设[J]. 中国高等教育, 2018(8): 14-16.
- [12] 姚利花,张占东. 综合性高校在实践教学培养新工科创新型人才的研究[J]. 教育现代化, 2018(12): 1-2.
- [13] 新华社. 习近平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18-09-10)[2022-05-05]. https://www.gov.cn/xinwen/2018-09/10/content_5320835.htm?tdsourcetag=s_pctim_aiomsg.
- [14] 新华社.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EB/OL]. (2020-10-13)[2022-05-05].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54488.htm.
- [15] 唐智彬,刘佳威. 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文化视域下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思路[J]. 职教论坛, 2021(1): 56-61.
- [16] 张大良. 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理实融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三个着力点[EB/OL]. (2019-12-16)[2022-05-07]. <http://edu.people.com.cn/n1/2019/12/16/c367001-31508340.html>.
- [17] 胡敏强. 产教融合新工科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J]. 中国大学教学, 2019(6): 7-11.

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Path of Innov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in Engineer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 Jianjun, LIN Haijun, WANG Lucai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Desig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put forward by the “new engineering”, it is necessary to reshape the cultivation concept from making tools to cultivating people, to update the system from closure to integration, to change the mode by replacing the stereotypes with innovation. How to cultivate engineering talents with strong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y and high comprehensive quality in the context of “new engineering”, the “innovation activity credit-driven” talent training mode proposed b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jors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Specifically, by following the concept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aking the cooper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as a breakthrough and the adequate supply of resources as a basic guarantee, it can cultivate high-quality technical talents in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Keywords: new engineering;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alents; innovation ability cultiv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责任编辑:姜聪瑞)

(上接第 64 页)

Research on the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GUO Jinlong

(Hun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Railway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6, China)

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is a key link of labor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labor education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can timely diagnose problems in school labor education, guide school labor education to move forward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promote school labor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ere are still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absence and distortion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e broad and differentiated evaluation indicators, the outdated and single evaluation form, and the unbalanced structure of the evaluation team. In the new era,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do a good job in labor education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by improving labor education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s, refining labor education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optimizing labor education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methods, and cultivating labor education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talents. The school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undertakings through precise policies.

Keywords: vocational colleges; labor education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value implication; practical approach

(责任编辑:姜聪瑞)

线上线下一体式教学模式的应用探讨

——以“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课程为例

兰浩 汪鲁才

（湖南师范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系，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 该文以“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课程为例，采用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模式，以网络云课堂等虚拟学习环境和教室实验室等实境学习为教学载体，通过线上通识了解和线下重点讲解，兼顾学生学习自由度和教学互动，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关键词 线上线下；一体式教学；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

中图分类号 G7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8X（2020）02-0065-05

DOI:10.13947/j.cnki.yzyxb.2020.02.015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

——Taking the Course "Fundamentals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Digital)" as an Example

LAN Hao WANG Lu-cai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Design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6）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fundamen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digital)" course is taken as a example,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l that applied by network cloud classroom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laboratory classroom reality, will make students learn freely and interact with teacher, which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eaching and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Keywords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ed teaching; fundamentals electronic technology (digital)

“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以下简称“数电”）课程是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含电气类、电子类）等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对于电子技术专业的学生来说，深入扎实理解和掌握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是后续学习的基础^[1]。目前，传统面对面的讲授使学生缺乏积极性和参与度，常常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课堂效率不高，学生实际掌握状况和课余学习程度也很难收集。单向的“填鸭式”教学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适合高等教育。2016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建设互联网教育关键技术及应用创新平台，实现优质教学内容线上线下对接，高沉浸感多模态互动远程教育，优质灵活个性化教育服务模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提升和学生个性化发展^[2]。由此可见，在线课程教育的建立完善已成为未来教育的重要趋势。目前，借助互联网进行高校资源设计、课程实施、搭建平台等的种类繁多，课程虽多但缺乏针对性，平台单方面输出而无反馈互动，学生管理力度弱等问题有

收稿日期：2020-03-05

基金项目：2017年湖南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在线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湘教通〔2017〕452号NO.182）。

作者简介：兰浩（1974-），男，湖南长沙人，高级实验师，机械电子工程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传感器检测技术以及磨损数学模型。

待解决。基于此,本文充分结合线上和线下各自优势,实施线上线下一体式教学模式,探讨其在“数电”课程中的应用,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1 线上线下一体式教育模式

根据“布鲁姆”认知历程向度^[3],将认知目标历程分解为知识、理解、应用、综合、评估等层面,同时适应教育信息化的改革方向,笔者针对学生学习“数电”课程的过程,设计了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模式方框图(如图1所示)。

根据教育现状获知目前学生特征,进而调整教学内容、教学策略和教学系统的设计,创造最优化的教学模式^[4]。线上线下一体化教育模式分

别以网络云课堂等虚拟学习环境和教室实验室等实境学习为教育载体。从整体上分为探究型学习和理实一体化学习两部分(如图1所示)。知识点精讲、作业以及论坛讨论均属于探究型学习,主体在线上完成。知识点精讲建立了知识点关系树的理论体系,便于学生针对性学习,如图2所示。线上测评、作业和论坛讨论则以在线发布试题的形式达到基础问题独立思考和复杂问题多人同步讨论的进阶型学习的目的。

理实一体化学习则更具工科特色,针对需动手实践的“数电”课程,课程将提前准备并以视频或文档资料的形式上传到网上,如图2中五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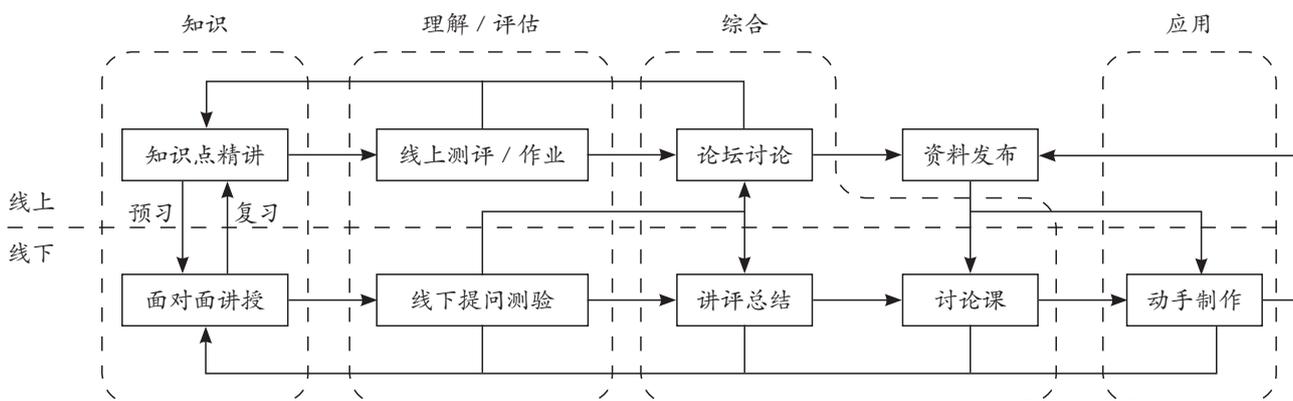


图1 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模式方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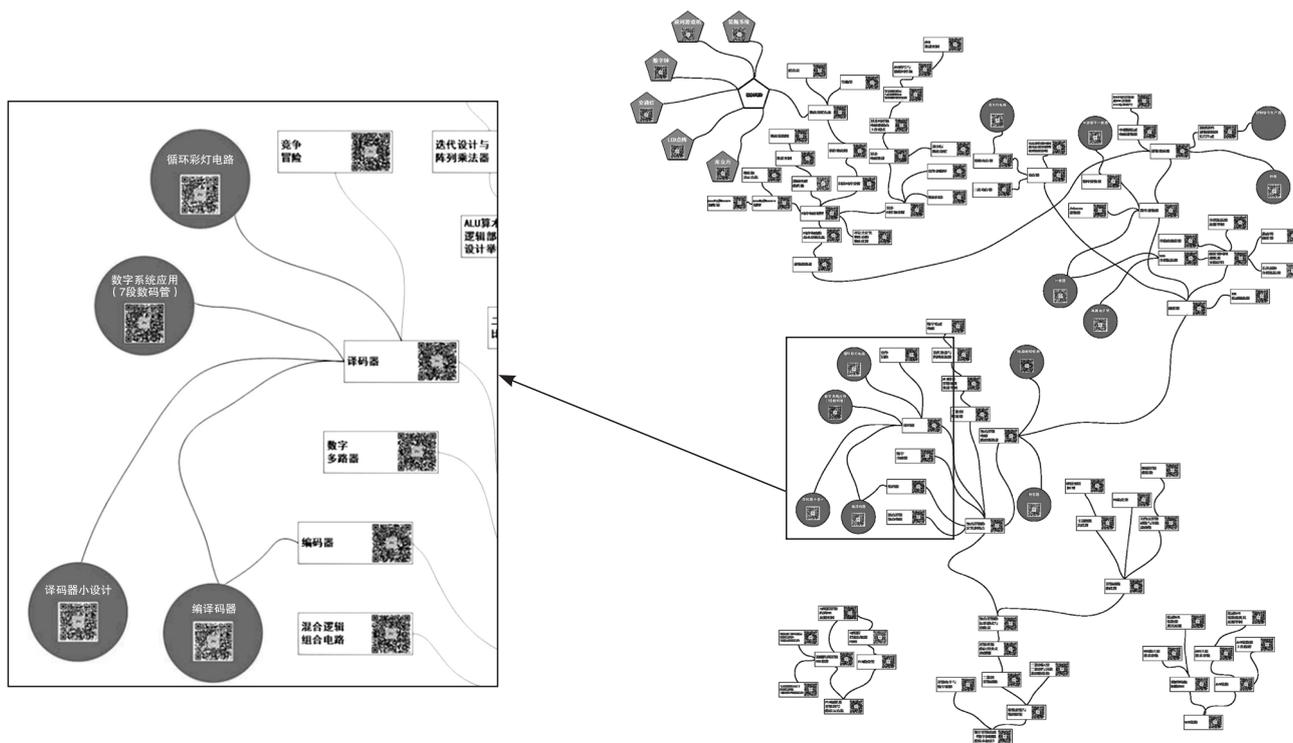


图2 “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课程知识点关系树

形、圆圈和长方形分别为设计作品、实践作品和微课小视频链接。这些视频为线下学生动手和教师指导的讨论课和动手制作做铺垫，考察了学生对前期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也是对理论知识的内化和深入体会。

探究型学习与理实一体化学习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辅相成。1) 线上的知识点精讲可为线下的面对面授课提供预习和复习的资料，使学生对课程内容和进度更有把握，线下向教师提问探讨亦可使学生对知识点精讲内容有更深入的理解。2) 线上线下的作业测验中存在的难题以及论坛讨论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均可由师生线下共同讲评总结，再上传至云课堂，便于学生学习查阅和思考建议，实现线上线下的交互融合。3) 线上资料随时更新发布辅助指导动手制作，动手制作的成果上传至云课堂供学生欣赏学习。

教育技术所要求的管理包括对所有学习资源和学习全过程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对师生之间的关系图谱有较高要求。线上线下一体化教育模式中师生之间的全方位紧密联系（如图3所示），不仅使互动形式多样及时，反馈呈现系统性，同时学生之间的关系展示了部分师生角色互换的过程，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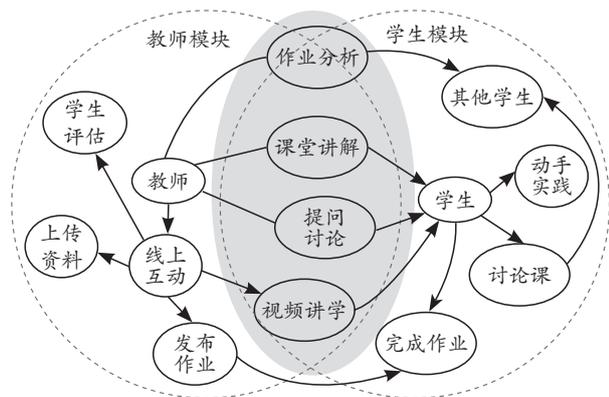


图3 线上线下一体化教育模式中师生关系图谱

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是各有分工又交互融合的，与线上线下关系的理念一致。教师需独自准备课程内容，发布作业，完成对学生的评估。学生则要相对独立地完成作业、准备和展示讨论课，完成动手实践。图3中师生模块交错的阴影部分则是师生交流密集的教学板块，包括课堂讲

解、视频讲学、提问讨论、作业分析以及讨论课和动手实践中的指导讨论部分，集中反映了现代教学过程中更需要的自主空间和师生互动，学生和教师均应有着自我调整、独立思考的空间，同时亦需要更紧密及时、高效多样的互动。

2 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实例

2.1 网络云课堂

网络云课堂是一个体系完整的在线课程平台，承载了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模式中知识点精讲、作业、论坛讨论和资料发布的实现。图4是从图3中分离出的关于网络云课堂的师生关系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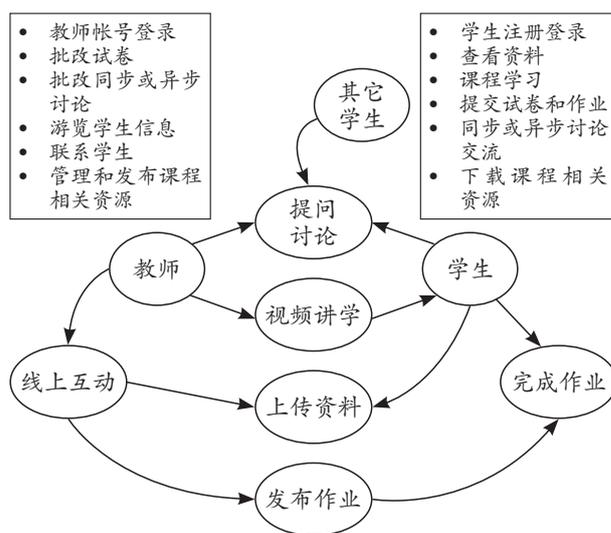


图4 网络云课堂的师生关系图谱

根据设计目标，整个平台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分为教师模块和学生模块。教师模块包括教师帐号登录、批改试卷、教师与学生进行同步或异步讨论、浏览学生信息和联系学生、管理和发布课程相关资源等一系列功能。学生模块包括学生注册登录查看资料、课程学习、提交试卷和作业、与教师及同学同步或异步讨论交流、下载课程相关资源等一系列功能^[5]。

课程平台以学生为设计主体、高效便捷为设计目标。如：资料发布，其主要形式有PPT图片、Word文档、短视频等。针对不同学习需要课程复习、课程预习、文献及相关资料查询等，学生可以选择合适的资料形式。

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认为，评价反馈活动是与学生成绩紧密相连的一种教学行为，强调教师能够理解学生需要学习何种知识信

息,并提供给学生应有的矫正性程序才是有效的教学活动^[6]。利用“互联网+”的思维模式^[7],可以有效地对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进行大数据统计和分析,如:成绩分布、错误集中点等,以此改进和优化课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将批阅结果反馈给学生,使其更清晰地了解包含自己的小范围群体的易错点,便于讨论改正。

2.2 讨论课

讨论课是一种集自主性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为一体的学习方式,充分体现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的独立性得到充分发挥,使学生在掌握科学知识基础上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创造,实现更高层次的学习^[8]。图5详细展示了讨论课学习中的师生角色互换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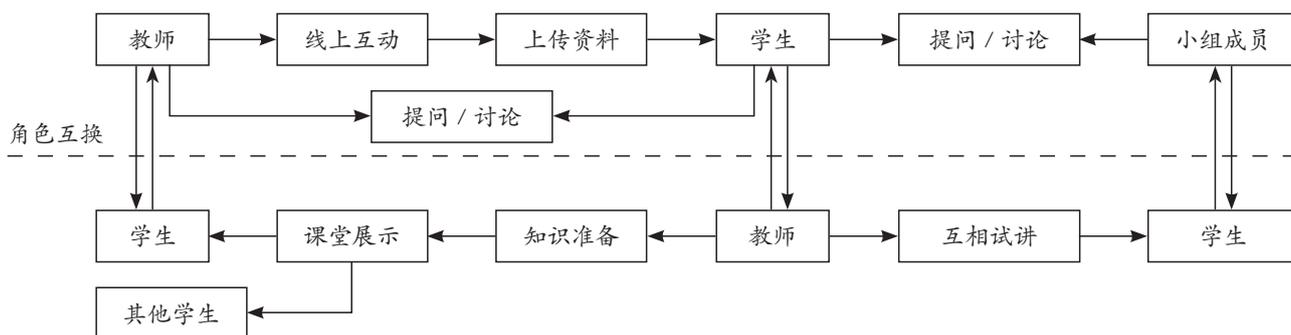


图5 讨论课学习中的师生角色互换过程关系图

教师通过网络云课堂发布教学资料和探究思考题,小组成员通过自主学习和讨论交流基本掌握知识要点,然后向教师提问知识难点并讨论对探究思考题的想法心得,教师给予肯定和指导。如:小组在讨论数电课题“MEV卡诺图化简”时,首先通过云课堂了解主要内容和对应题目,进行学习后与小组成员讨论是否有优化方案或提出更简单的化简方法,再由教师指导并讨论出更切实可行、严谨的方案,同时教师亦应提供几种新思路,发散思维。通过这种研学形式,学生最终可以较深层次地理解掌握知识点,培养探究思考能力。完成课题讨论后,小组成员将知识内容及探究结果以PPT等形式讲解分享给其他同学,教师现场进行点评建议,修改后课程资料将上传至网络云课堂供日后查阅学习。另外,讨论课锻炼了学生的课堂表达能力。学生不仅要理解学习知识,而且能将知识逻辑清晰、简单明了地讲授给他人。这不仅考验了学生对知识体系理解是否清晰,而且锻炼了学生交际表达能力,对以后的学习交流以及演讲等有很大帮助。

2.3 动手制作

对于实验指导部分,教师将做整体讲解,亦会通过网络云课堂上传详细视频,学生可以在线进行学习、提问和讨论。实验操作部分主要在实

验室完成,教师随时对学生实验中的问题进行纠正引导,但应在不影响实验进度的情况下保证学生足够的独立思考空间。图6详细展示了动手实践中多方位的师生交流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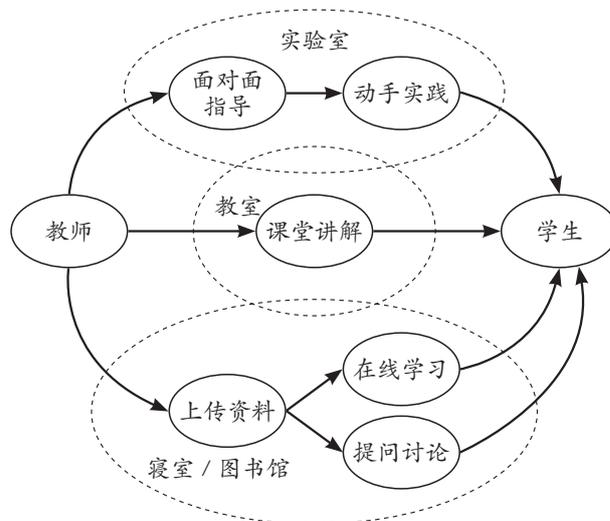


图6 动手实践中的师生空间关系

动手实践是极富工科色彩的教学内容,是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实现的重要过程。将实验教学内容改革纳入教学体系之中,在不断提高验证性、基础性实验教学效果的基础上,多开展综合性、

(下转第76页)

阔的发展前景。通过引种进行大面积的推广养殖,还可以有效地促进龙山县的畜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造特色的生态农业,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脱贫的一条重要途径。藏香猪的养殖技术体系、加工配送与销售、“合作社”或者企业化运作体系等模式研发,将进一步提高龙山县藏香猪养殖数量,帮助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提升地方经济收益,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5 参考文献

- [1] 顾为望,曾昭智,刘运忠,等.F1代西藏小型猪早期生长发育特点[J].中国实验动物学报,2006,14(4):307-310.
- [2] 龚建军,吕学斌,李正确,等.藏猪繁殖性能研究[J].西南农业学报,2009,22(3):807-810.
- [3] 闫小兰,王志有,侯生,等.藏香猪母猪泌乳期日粮不

同精粗比对仔猪增重及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J].饲料工业,2020,41(3):40.

- [4] 宋社果,安小鹏,赵海波,等.藏香猪屠宰特性及肉品质的分析[J].西北农业学报,2011,20(12):26-32.
- [5] 刘庆雨,张琪,李娜,等.藏香猪胴体性能及肉质品质测定[J].养猪,2019(6):54-56.
- [6] 安小鹏,白龙,孙晓梅,等.藏香猪母猪部分繁殖性能的测定[J].西北农业学报,2011(11):12-13.
- [7] 李国云,杨东,赵立三,等.迪庆藏香猪的饲养管理[J].养殖与饲料,2013(1):26-27.
- [8] 向胜超.制约湘西山村生态养猪产业发展的因素及思考——以龙山县为例[J].湖北畜牧兽医,2019(6):36-37.

(责任编辑:马余平)

(上接第68页)

创新性实验,以利于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培养^[9]。如:光立方、LED点阵、交通灯、数字钟等。学生不仅对本学期的学习内容再次回顾,建立起系统的思考模式,亦可通过实验探索新的知识,提高知识层面,扩大知识范围。

3 结束语

通过“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的应用探讨,教师可以体会到线上线下的结合无处不在。时代在发展,世界是连通的。线上线下的多元一体化将渗透于教育教学。从传统的面对面讲授,到在线学习与研学式教学的普及,教育的改革始终朝着为学生高效接受知识而前进。

4 参考文献

- [1] 刘亚明.浅谈实验在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教学中的运用[J].职业技术,2010(01):43.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的行动计划(2015-2018年)[J].功能材料信息,2016,13(6):17-23.
- [3] 刘世斌.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视角看有效教学的实施[J].中小学教学研究,2013(5):3-5.

- [4] 张伯邑.现代教育技术应用[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 [5] 杨超辉.在线网络教育系统设计与实现[J].信息通信,2015(6):120-121.
- [6] Benjamin Bloom,B. Human Characteristics and Student Learning[M].New York: GcGraw-Hill, 1976: 64-67.
- [7] 徐小辉,郭心毅.基于“互联网+”的高校在线课程建设及优化[J].教育现代化,2018,5(24):100-102.
- [8] 柴军应.学生学习自主性发展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6.
- [9] 高大新.深化创新型实验教学改革提升工科类大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以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为例[A].Singapore Management and Sports Science Institute, Singapore、Academic Conference Institute, USA. Proceedings of 2017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Research (EER 2017) [C]. Singapore Management and Sports Science Institute, Singapore、Academic Conference Institute, USA: 智能信息技术应用学会,2017:5.

(责任编辑:李进)

电子类课程“以赛带练”教学模式的设计

兰 浩,汪 鲁 才,陈 俊 名

摘 要:利用竞赛资源作为电子类课程改革的突破口,在电子类课程推行“以赛带练”教学模式,不仅能在教学内容上引入竞赛的知识点,也能采用竞赛的方式展开成绩评定。经过4年的教学实践,该教学模式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电子类课程;教学改革;以赛带练

作者简介:兰浩,男,湖南师范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电子技术。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5)30-0051-02

大学生的各类科技竞赛已成为衡量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而深受各高校的重视。通过各项赛事的举办,不仅检验了各高校学生在各自学科领域内的创新能力,更进一步地促进了对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培养和培育。各类科技竞赛的学科涵盖面相当广泛,如:挑战杯、全国大学生“飞思卡尔”杯智能汽车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等。然而,各高校如何利用好竞赛资源培养学生,是教学改革的突破口之一。

一、传统教学的现状与不足

通过对学生平时学习、组织学生参加各类竞赛以及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发现了在传统教学模式培养下存在学生实际设计能力不足的问题。这种现象更多的体现在高校毕业生进入公司、企业后,往往需要经历一段比预期时间更长的岗前培训和实习适应期,实际上是企业需求和高校培养培育目标不能重合的体现,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生就业问题的产生。

传统教学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学内容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二是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的联系不紧密。^[1]传统的理论教学为了保证其准确性和基础性,往往缺少当前主流的技术和主流工艺的教学内容。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联系不紧密是各高校教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从表象上看,实践教学所用的课时少,学分所占的比重低,教师和学生普遍对实践相对轻视。从原因上分析,实践教学的

考核难度大,国内的考核评判标准以评分为主。实践是一个具体性、整体性和操作性很强的活动,相比于理论学习,对实践学习的考核往往没有合理的、具体的、细化的评判依据,最后以教师的印象和到课情况评分,学生和老师不免会产生走过场的思想。无法公平合理地评价学生实践学习的质量与实践教学课时少、学分低的相互影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二、“以赛带练”教学模式的设计

“以赛带练”的教学模式,即通过各类科技竞赛等方式带动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训练和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学生专业知识水平和实践动手能力、培养综合型人才的目标。

“以赛带练”教学模式将科技竞赛融入到教学的多个环节,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通过竞赛带动实践教学。通过“以赛带练”的教学模式,提高全体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加强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识,使全体学生进一步了解所学专业的实际工程应用,提高部分学生的项目开发和产品研发能力。^[2]教师也通过“以赛带练”教学模式相应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一)将“以赛带练”引入到理论教学中

科技竞赛的内容往往具有很强的时代性,能准确地把握住电子技术发展的前沿特征。将往届的科技竞赛所涉及到的专业知识融入到理论教学内容中,授课时也采用竞赛的形式展开对某个知识点的理论分析和实际操作。例如:在自动控制教学过程中,引入03年的液位点滴控制题目作为

专题分析,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以小组形式展开对控制算法的最优分析,在课堂上,通过实物验证各种算法的特点,这样有利于在教学过程中比对各类控制算法的性质、特点以及所适应的控制对象。例如:在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教学过程中,提供07年的开关电源的简化模型和实物,让学生以小组形式展开对电源和MOS管的学习,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设计出提高电源工作效率的作品,这样让实际的设计案例融入到教学中。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对实际电路的分析和测量作为理论教学内容补充,使学生将更为直观。例如:07年的音频信号分析仪、飞思卡尔智能车中的电磁检测等部分,可以引入传感器技术教学中;电脑鼠竞赛中对赛道信息的存储和调用的过程,可以融入到数据结构的教学中。

(二)将“以赛带练”引入到实验教学中

实验是通过实践来验证理论知识,同时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竞赛是专业知识的具体应用,将竞赛的部分内容加入到实验教学中,可以极大的丰富实验内容,也可以采用竞赛式的实验评定方法。^[3]例如:飞思卡尔智能车竞赛中的电磁检测电路部分作为模电实验的内容,将所用检测电路的参数作为实验需要达到的目标,待实验完成后学生将实验作品装配到飞思卡尔电磁车构成一个整体,在竞赛赛道上进行试跑,以试跑成绩作为学生实验成绩的评定标准。对于信号处理课程,竞赛过程中所测量的参数还可以为实验提供数据素材,例如:12年飞思卡尔智能车竞赛的电磁组倒立摆模型可以为滤波器的设计提供数据;12年湖南省电子竞技的温度控制可以为设计自动控制器提供数据。

将“以赛带练”引入到实验教学,不仅仅是将科技竞赛的内容引入到实验教学内容中,而且要充分发挥各类竞赛的培训作用,作为对实验教学的补充。赛前培训是学生参与竞赛前对学生的集中培训,培训的内容充实,实际应用性高,针对性也较强。组织还没有积累足够的知识参加竞赛的学生参加赛前培训的讲课环节,并鼓励学生参与赛前培训,协助参赛队员完成赛前的训练。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仅能感受到专业学科的综合实际运用,还能学到很多必要的技能和技巧,如PCB板的绘制、运放的选择、阻抗匹配、常用的经典电路等等,极大的催化了学生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

的转化过程,同时也促进了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的经验交流和学习。

(三)将“以赛带练”引入到课程设计中

课程设计是对对应课程以及之前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根据竞赛的形式和内容,融入部分竞赛内容作为课程设计题目。^[4]例如:飞思卡尔智能车竞赛和全国大学生电脑鼠竞赛,可以设计并制作出一个简易电脑鼠硬件或者一台智能循迹小车,亦可以将已搭建好硬件和底层软件系统提供给学生,要求学生在此基础上完成设计控制策略和算法的优化。

三、“以赛带练”的教学评价

随着“以赛带练”融入到教学中,在鼓励和引导学生参与竞赛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兴趣。“以赛带练”应该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有力补充,而不能让理论和实践教学让路于竞赛。在教学评价方案的设计中,应该根据不同科技竞赛的性质和特点,确定合理的评价方案。在教学评价方案的设计中,除了对学生理论和动手能力提高有指标性的要求,还要考察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能力。学生对教学的评价要进行跟踪,学生经过不断学习和实践,对专业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对教学的评价会更为全面和客观。

自2009年开始施行这类型的教学改革以来,笔者所在学校在部分课程中加入了竞赛的内容。从目前的实验改革结果来看,接受改进后的毕业生,较未改进的对口就业的比例提高了15%—20%,读研的比例提高了近10%。在对口就业的毕业生中,都能够轻松的接受和理解岗位培训的内容。其中经过选拔在实验室参与项目的学生全部具备直接参与研发的能力,在别人还在进行岗位培训的时候,他们已经融入了相应的部门。

参考文献:

- [1]廉小亲,韩力群.信息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研究[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08(4):33—35.
- [2]谢勇,胡学龙,蔡钧,等.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建设与改革的实践[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05(4):27—29.
- [3]刘亚杰.“以做带学、以赛带练”电子商务实践教学模块的创建[J].电子商务,2010(12):55—56.
- [4]佟天宇,柴敬安.“以赛带训”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及实践[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6):55—57.

[责任编辑 陈国平]